

贺子珍

郭 晨 裘之倬



2

中华文学丛书

K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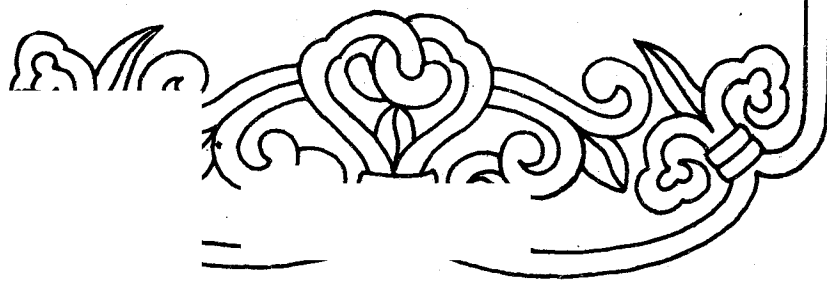


中华文学丛书

贺子珍

郭晨 裘之倬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贺子珍

郭 晨 裘之倬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山西日报社印刷厂 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 发行

787×1092毫米1/32 5印张 100千字

1984年10月第一版 1984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书号: 10267·22 定价: 0.65元

目 录

引子.....	(1)
一、纪念堂前的纪念.....	(3)
二、贺氏三兄妹.....	(6)
三、永新城小试锋芒.....	(12)
四、县妇女部长的日日夜夜.....	(16)
五、勇敢挡逆流.....	(20)
六、独挡一面守县城.....	(23)
七、老百姓是再生父母.....	(26)
八、迎接毛委员上井冈山.....	(28)
九、三进永新.....	(33)
十、“双枪女将”的传说.....	(36)
十一、井冈山的灯光.....	(39)
十二、抢精神食粮.....	(44)
十三、正规部队里的游击生活.....	(48)
十四、遇险化夷.....	(54)
十五、让大老粗变秀才.....	(58)
十六、好秘书好管家.....	(63)

十七、瑞金的朝朝暮暮·····	(67)
十八、调查研究·····	(73)
十九、母子挖井·····	(76)
二十、长汀漫步·····	(81)
二十一、母子离情·····	(85)
二十二、踏上二万五千里征途·····	(92)
二十三、克己为人热心肠·····	(94)
二十四、光荣负伤·····	(97)
二十五、红绸背心暖人心·····	(103)
二十六、心头伤疤·····	(106)
二十七、新的起点·····	(111)
二十八、延安托女·····	(116)
二十九、坎坷的异国生活·····	(119)
三十、悲喜交集进国门·····	(126)
三十一、仍有豪情似旧时·····	(128)
三十二、与国与民同忧戚·····	(131)
三十三、质本洁来还洁去·····	(134)
后记·····	(138)
附录：《访问贺子珍》·····	(140)

引 子

贺子珍与世长辞了。

1984年4月25日，新华社向全国发了一条电讯，26日，全国各地报纸，均在显著地位刊登了这条消息。

消息的标题是：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消息不长，抄录于下：

“新华社上海4月25日电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贺子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逝世，终年七十五岁。今天上午，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了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今天布置得隆重、庄严、肃穆。大厅两侧摆放着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杨尚昆、杨得志、宋任穷、陈丕显、胡启立、乔石、郝建秀、王首道、蔡畅、康克清同志送的花圈，白栋材、王芳、陈国栋、胡立教、杨堤、汪道涵、阮崇武、李坚真、曾志、陈琼英、刘英、彭儒、钱希钧、孔从洲等同志也送了花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政协办公厅以及上海市、江西省、湖南省、福建省、浙江省、陕西省、贵州省、江西吉安地区、永新县的党和政府送的花圈也安放在大厅两侧。贺子珍的遗体放在大厅中央，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簇拥着常青树和鲜花。遗体前摆着她的亲属贺敏学、李立英、李敏、孔令华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

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杨堤、汪道涵、阮崇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岭安，以及贺子珍同志的亲属和她在上海的生前友好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人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在贺子珍同志的遗体前默哀、鞠躬，瞻仰她安详的遗容，并缓缓地绕遗体一周，向这位长征老干部告别。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之一、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吉安党委妇委、妇女协会组织部长。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上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工作。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和学习，1947年8月回国。解放后在浙江省杭州市妇联工作。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在长期患病期间，她关心国家大事，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领导同志一直关心贺子珍同志的病情。她病重期间，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曾前往医院探望。贺子珍同志的遗体已在今天下午火化。她的骨灰盒将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各报在刊登消息的同时，发表了贺子珍的照片。这一天的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抢购一空。读者阅读了消息，端详了照片，纷纷议论。有的说：“贺子珍是个巾帼英雄。”有的说：“贺子珍是传奇人物。”

是的，贺子珍的的确确是个巾帼英雄，她七十五年的经历，如实记录下来，堪称传奇。

一、纪念堂前的纪念

一辆红旗牌轿车沐浴着金色的秋阳，向毛主席纪念堂驰来。车缓缓停稳了，打开车门，从里面推出一个轮椅，上面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神情肃穆的老人，她那双昏花的眼睛直楞楞地注视着纪念堂前的金色大字。

这是一个多么不平常的时刻呀——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对于她来说，除了一九五九年在庐山的一次匆匆会面外，她与毛泽东同志已整整分离四十二年了。她急着想马上进去，可是轮车并没有立刻推进瞻仰厅，而是被医护人员推着，在天安门广场绕着转圈。老人并没意识到这是一种悉心的安排，她非常着急。

粉碎“四人帮”后，她急着要到北京来，治病还在其次，主要是想会会长征老战友，瞻仰毛主席遗容。当她乘飞机抵达首都机场时，当年在井冈山一起战斗的老朋友康克清、曾志、彭儒、钱希钧等同志到机场迎接她。她们见面时互相拥抱，亲切握手，说说笑笑，这种感情是难于言表的。她在医院住下后，有更多的老战友来探望她，使她感到同志友情的温暖。可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还没有机会去瞻仰毛主席遗容，她心里一直盼望着能早日遂愿。

机会终于盼来了。前一天晚上，人们还瞒着她，可是她从护士的片言只语和神秘的举止中已经预感到这一天的来到。在漆黑的病房里，她睁大眼睛，一晚没有睡好，天亮了，她突然乐呵呵起来。医务人员并不乐观：她们担心老人的身子，能否经得住这种兴奋和刺激。巧嘴姑娘只好亲热地

叫“姨妈”不要伤心，千万不能哭。老人连连点头，她只是要护士给她准备好两块手帕。

一块粉红色颜色的手帕递了上来。这是一个不能原谅的疏忽。老人严肃地说：“这个不好，这块不能用！”

现在，直立在她面前的毛泽东大理石雕像神态安祥，似乎要开口说话了。在毛泽东坐像底下，安放着她送的花圈。上面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轮椅由女儿、女婿扶着，被推向遗容陈列室。她伸手要过了一块手帕。轮椅慢慢地、慢慢地围着毛主席灵寝转了两周。她凝视着安眠着的老战友，嘴巴翕动着，可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她寂寥悲切，仿佛觉得这世界上连空气都凝结住了。

“不要难过，不要哭。”大厅里不断响着轻轻的叮咛声。老人紧紧攥住女儿的手，终于眼泪扑扑簌簌地滴了下来……。

能不悲伤吗？老人是第一次进北京城，她有多少话要对他讲呀，可他听不见了。人如能死而复生，他们现在定是能倾心相谈了。

贺子珍沉默着。她也许是在回忆，也许是在思考。

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贺子珍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创建，然后又随毛泽东同志和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中央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月离开瑞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受伤流血，历尽艰险，跟随毛泽东一起到达陕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之间结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中间虽隔断了二十多年未曾见面，一九五九年庐山匆匆一面即

成永诀，但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十分真挚的友谊。

贺子珍仍在沉默着。

不能再让老人停留在此了。轮椅被推进了休息室。墙上挂的《长征》诗，铁画银钩，使她蓦地想起长征途中的炮火硝烟。她又动了感情，机灵的护士又附耳叮咛，这位老红军战士才抑制住内心翻腾的感情波澜。

轿车驰进了中山公园，老人没有下车。她不愿让任何东西来干扰心绪，一直回到病房里，她还痴痴坐着。护士找话问她：“姨妈，主席脸这边有颗痣吗（指左脸颊）？”

老人望了一眼护士，立即纠正说：“不是，在这边（指右颊）！”

护士又说，毛主席很胖呀。老人这才露出笑容，关切地说：“是吗？现在不能吃东西了，怎么会胖？在井冈山可瘦啦。”

老人的话多了起来。……

隔了些日子，又去参观人民大会堂。宏伟的人民大会堂逗得她兴致勃勃，看了宴会厅、大会场，她又点着要去北京、上海、江西、湖南四个厅。此后，她被引进一间休息室。这不大的屋里摆着张床，一只写字台，一张藤椅，一只床头柜，两对沙发。她坐下来喝着茶，让摄影师照相。陪同的人告诉她，这就是毛主席在人大会堂活动时的休息室，那藤椅就是毛主席坐过的。听到这句话，她情绪大变，面容顿时敛紧了。万感交集，悲从中来，她的眼泪串串落下。恸哭了好几分钟时间。聪明的姑娘也无法上前劝慰，她们知道此时此刻，不劝是对的，这样一个受尽磨难的老人，就让她放声大哭吧。不然，压抑的心绪怎么承受得住那么沉重的感情负荷呀？！

在纪念堂前，贺子珍怀着复杂而深切的思绪，纪念着故人毛泽东。如今，贺子珍也成了一位故人。党和人民对她作了公正的评价，她在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中占得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她也是一位值得纪念的故人。

二、贺氏三兄妹

宛宛禾川绿绕城，
东风吹得晚云腥。
休将铁笛吹山月，
怕有蛟龙听得惊。

明朝的学士、诗人解缙，站在东华山上，眺望永新县城，吟诗赞美永新县城的山光水色，颇为伤感地怀念古代英雄。

永新县城，即禾川镇，位于禾水河的洲湾里。水绕山环，风景秀丽。

永新历史悠久，东汉设县，县城傍着禾水，城南有小山叫南屏山，城西北有凤凰山，城东有东华山。东华山为永新名胜，林溪幽美，登临其上，可鸟瞰全城。城西逆禾水上行三四里，禾水两岸，左有皂旗山，右有双乳峰。两山之间，有一碧绿深潭，名叫“忠义潭”。潭侧有一座忠义堂，人们修建忠义堂，是为了纪念几百年前的一群忠勇义士。

解缙悲凉的诗，就是悼念这些英雄的名句。

史载，南宋末年，元兵入侵，从吉安杀到永新，文天祥组织义军抵抗，他在兴国兵败后，他的侄妹夫彭震龙率领

永新八姓子弟，英勇顽强地抗击着元兵。不幸出了叛将刘盘。这家伙诈开城门，引元兵蜂拥而入。元兵入城，屠杀三日，血流成河。

彭震龙被捉，“骂贼而死”。义军逐巷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追逐到皂旗山下。

三千义士在张履翁、颜思理、肖敬夫等豪杰率领下，退至袍溪潭（即忠义潭）时，元兵追到，被团团围困。三千义士无一投敌，纷纷跳进深潭，壮烈殉节。

后人在烈士殉难的地方，盖起了忠义堂，堂壁上书写着文天祥的一首五言诗：《挽彭司令震龙》

堂上会亲戚，可怜马上郎。

呻吟更流血，干戈浩茫茫。

解缙诗中的“休将铁笛吹山月，怕有蛟龙听得惊”中的“蛟龙”，就是指这些民族忠魂。

禾水悠悠流淌，抗暴爱国传统源远流长。

一九一〇年八月中秋节，浩浩流淌的禾水，又听到一声婴儿的有力啼哭。皎月映照下的永新南门禾川镇的一家店铺里，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生命小名“桂圆”。正当桂子飘香，圆月当空的时辰，她向人世报到了。等到长大一点，要正式取名，一些文人雅士见她生得皮肤白嫩，面目娟秀，便赞美她有如桂花之香，圆月之白，简言之名曰“桂圆”。上学之后，她不喜欢这个软绵绵女性气十足的名字，便改为子珍。

贺子珍的老家在永新南乡黄竹岭，祖辈是破产地主，到父辈一亩地也没有了，便携家迁到永新县城南门的一个店铺里，经营小杂货，字号叫“海天春”。这是一间典型的南国小店铺，滨临禾水，房屋低矮，屋檐下有两根柱子，撑着

一个突出街面的骑楼。前后两小幢，前半幢卖烟酒茶水和油果糕点，后半幢接待住客。生意不很大，生活还富裕，是个小康之家。这样一个家庭虽有点剥削，但更多的是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欺榨。贺子珍父亲为人老实厚道，只知道埋头做事，家里是母亲当政。她父母因为受军阀官僚、地主劣绅的敲诈勒索，对黑暗的旧社会心存不平，便结识四方豪杰，鼓励儿女们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受子女的影响，也参加了革命工作。贺子珍的父亲一九二七年在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油印科做过事。这一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她家的动产和不动产全部被没收。反动派七次洗劫了黄竹岭贺家故居，没收了她家的土地和房产，并将永新县城贺家店铺捣毁一空，这更坚定了两位老人的革命决心。一九二八年，她父亲是吉安县委的秘书长，母亲在县委刻钢板。一九二九年她父亲担任江西特委文书，母亲仍在特委刻钢板。有一段时间因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当地有的领导人嫌他们成份不好，属于不可靠分子，被撤销了职务。红军北上之后，她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母亲在地下党的保护下，长途跋涉，来到延安，得到毛泽东同志很好的照顾，后因病在延安去世。

贺子珍本有四兄妹。最小的弟弟，一九二七年参加永新暴动，为赤卫军送信时，中途遇到敌人，不幸牺牲了，不为人所知。所以，现在一般是讲“贺氏三兄妹”。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他们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各自都有一些传奇性的遭遇和故事。

贺敏学很强悍，武高艺大，粗眉毛，暴脾气，学了三年徒，还学了点“打”，富有反抗精神。学徒的时候，师傅不让他坐在一条板凳上吃饭，他一气之下，把碗都打掉了。大

革命前，他是永新禾川中学的学生领袖，带领一部分进步学生跟禾川中学的国民党右派斗，各占据一个山头，摆开阵势搞械斗。斗争失败，他离开永新到吉安阳明中学读书，后来在妹妹贺子珍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一九二六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七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走上了曲折的革命道路。

妹妹贺怡，个子不高，活泼好动，精明泼辣，很会做群众工作，跟什么人都谈得拢，是一位女闯将。一九二七年入党，国共合作时，是永新县党部妇女协会委员，兼任小组长。一九二七年七月，吉安事变，永新县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大屠杀。当时城门紧闭，岗哨林立，只许进不许出。贺怡来不及逃进城去，在大搜查中，她出主意叫姑母到元亨利杂货店借了一匹白布。她把白布缠在腰上，乘着浓黑的夜色，悄悄摸到城墙的僻静处，敏捷地爬上城墙，用那匹白布从城堞上吊下去，机智地死里逃生了。

一九三〇年，她与毛泽东同志的弟弟毛泽覃同志结婚。毛泽覃当时任永吉泰特委书记兼独立第五师政委，贺怡为特委妇女部长、肃反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三三年七月，王明路线大反邓毛谢古。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毛泽覃挨斗，贺怡受连累，被调到中央党校受训，是被斗争对象之一。这时她正好生孩子，产后带病也不让休息，继续被残酷斗争了一个月。她只能偷偷地抱着孩子送给挨斗的毛泽覃看，这个孩子后来被沸水烫伤夭折了。她被指控为“帮助小组织的形成与参加反党小组织”，差一点被开除党籍，幸得中央党校副校长董必武同志竭力保护，才以口头警告的处分下放基层锻炼。那时光毛泽东受排挤，对这些事是无可奈何的。红军北上后，她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

争，被派往赣县任县委书记，备受艰难。国共第二次合作后，贺怡任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副主任，兼任统战部副部长，一九三九年调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一九四〇年六月三十一日在韶关被国民党逮捕，为了保存党的机密和经费，“不让一个铜板落到敌人手里，”她吞吃金戒指，准备死掉，没有自杀成，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一九五〇年任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在前往赣南寻找贺子珍的爱子小毛的途中，经过泰和到吉安之间的一座木桥附近，出车祸不幸牺牲。

贺氏三兄妹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贺子珍。

她长得象母亲，皮肤白皙，身材苗条，面目秀丽，心灵手巧，绣花、打毛线，种种女活都做得细致象样。她的脾气虽然有时急躁，执拗，自尊心强，但比起兄妹来，要显得温柔、沉着、稳重、有心计，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在家里的威望最高。她是小家闺秀，但又有一股巾帼之气。

贺子珍自幼有一副怜贫厌富的心肠。她有一个表姐嫁给了一个豪富人家。每逢她表姐来她家做客，她总是不理不睬，甚至出门去玩，避而不见。同学好友龙灵问她为什么冷淡表姐，她皱起眉头说：“我讨厌她那副少奶奶的派头。”

对孤苦的穷人，贺子珍极为同情。有一次，一个讨饭的老婆婆拄着拐，颤巍巍地来到她家门口，枯瘦的手捧起了讨饭碗。贺子珍立即盛了一碗雪白的大米饭，夹满了菜，笑眯眯地捧给老婆婆吃。

龙灵见此情景，很是纳闷，问她：“你认识那个老婆婆吗？”

她摇摇头回答：“不认识，她是一个可怜的人，我们应该怜悯她！”

她生长在民族忧患的时代，爱国的激情在她幼小的心

灵里翻荡着。她喜欢到东华山去游玩，瞻仰忠义堂的英烈，在呜咽的禾水潭畔，吟哦文天祥的爱国诗词。

一九二五年，十五岁的贺子珍在永新福音堂读中学。那年月，孙中山逝世，政府号召全国各地举行追悼会，悼念这位民族英雄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贺子珍和一些进步同学积极筹办着举行追悼会，但永新福音堂的几个外籍教师，不准她们召开和参加追悼会。贺子珍挺身而出，气愤地对同学们说：“我们是中国人，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推翻了清朝政府，打倒军阀，建立民国，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举国痛悼，我们也要悼念他，这个会我们非参加不可！”

受了贺子珍的鼓动，当时有十八个学生起来向学校当局抗议。

这个造反举动，无异是向福音堂这泓平静的死水里扔下了一块大石头，激溅得上帝的使者——牧师们惊恐不安。一个晚上，康教士怒气冲冲地跑到学生们住的楼上来，勒令十八个闹事的学生跪到地板上。她严厉地宣告：“你们得罪了上帝，我替你们祷告，向上帝求饶，忏悔吧，可怜的迷途羔羊！”

贺子珍站了出来，拦住了正要下跪的同学，大声地说：“我们没有罪，谁也不要跪！”

年纪更小的贺怡调皮地说：“叫她自己跪吧，她膝头盖痒痒了，我们下楼去玩！”

大家一哄而散。把板着脸孔的康教士晾在一边，气得那个女“洋鬼子”嘟嘟囔囔地下楼去了。

贺子珍又把同学们喊拢来，提议每人做一套白衣白裙，准备参加追悼会。

举行追悼会的那天早上，一队穿着白衣白裙的小学生，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出福音堂的校门。贺子珍走在队列的前头，她向学校的窗口瞥了一眼。那几个洋教士正扶着窗栏看着她们，无可奈何地摇着头。

学生们来到城南门的龙家祠，向会场正中的孙中山遗像默哀，向民主革命的领袖奉献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

斗争的胜利鼓舞着贺子珍，过了几天她又提议到银匠铺打十八块小国旗，国旗上一块金属横牌镌着“爱国英雄”四个字。每到礼拜日，这十八个爱国小英豪就把小国旗挂在胸前，昂首挺胸地走进教堂去做礼拜。他们哪里是做礼拜呀，分明是示威，那几个教士都以惊奇而厌恶的目光盯着这些亵渎上帝的“罪人”。可是贺子珍和小伙伴们不理睬这种不友善的目光，旁若无人地说笑着。

笑声宣告了贺子珍跟上帝的告别。从此，她踏进了人生的一条曲折途径。

三、小试锋芒

随着年龄的增长，贺子珍在小名“桂圆”之外，又增添了一个绰号“石灰佬”。是因为她长得象石灰一样白，人们送她这样一个绰号吗？不。她喜爱吟哦《咏石灰》这首古诗：

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留得青白在人间。

这首诗的意思多好啊！她立志要学石灰的品格，千锤百炼，清白正直，为人民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但是，这也不是她的绰号“石灰佬”的主要来历。

“石灰佬”，在永新那一带是个贬义词，是外乡人对永新人的轻蔑称呼。这有个典故。永新人在宋代出了个宰相，名叫刘沆，传说他当了一年半宰相，萌发了野心，企图篡宋仁宗的位，被宋仁宗发觉，龙颜大怒，把他杀了。

永新人把他的尸体载回安葬。脑袋已经没有了，便用石灰给他塑了一个脑袋。据查考，史无此事。刘沆死后，宋仁宗对他很怀念，还写诗刻碑，名曰“思贤之碑”，留传至今。后世据传说骂永新人为“石灰佬”，意思就是说永新人喜欢“造反”。

“石灰佬”加到贺子珍头上，就隐含着这层意思。贺子珍对这个绰号并不反感，也正是欣赏这层意思。

在那个时代，“造反”是很吓人的名词，只有革命者不惧怕它。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没有一批仁人志士起来造反，人民大众哪有出头之日？

一九二六年，天晴气朗的一天，永新县城体育场的大操坪上，万头攒动。人们仰起脑壳，正津津有味地听着贺子珍的演说，她个子高挑，面目俏丽，新剪的短发，煞是精神，穿着遮到脚杆的黑色长裙，合身的左腋下开扣大襟上衣。她在讲台上挥舞着小拳头，显得又活泼又神气。清脆圆润的声音，响彻着整个大操坪。静寂的人群中，不时传出几声赞叹：

“这个女子有胆，嘴巴真会讲呀，句句话都有新道理！”

“呱呱叫呀，这是哪家闺秀？”

“城南贺老板的大女嘛，永新县城头一号女秀才，你都不晓得？”

被人们赞美着的贺子珍，在永新县城头一次亮开了“造反”的姿态，吸引千万人的注视。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民主、自由的冲击波，冲激着她心灵的闸门，她的目光从古诗词中抬了起来，转向轰动一时的革命刊物。这时她早已从福音堂走出来，考入县立女子中学，她和同学们开展革命活动时，认识了当时中共永新县委的创始人欧阳洛和刘珍等同志，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难得的进步书刊《新青年》和《湘江评论》。她贪婪地阅读着上面的每一篇文章，陈独秀、李大钊、毛润芝的一篇篇犀利透彻的政论，打开了她心灵的窗户，给她吹进了真理的春风。她如饥似渴、囫圇吞枣地接受这些真理，一颗求解放、争自由的心跳动得更猛烈了。

她的情绪被鼓动了起来，勇敢地走出学校，冲破礼教的束缚，大胆地走进社会，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她剪短了头发，穿起了朴素的服装，一边在学校参加革命活动。一边跟着永新县早期的革命者走到工农当中去，宣传革命。这时候，她对民族的危难，百姓的疾苦，特别是妇女的深重苦难，有了切身的感受。她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和妇女解放的运动中去，决心做一个冲决封建罗网的女战士。

贺子珍在学校是高才生，尤其喜欢诗词歌赋，她能背诵许多古诗和古文，从中得到文学的熏陶和艺术的修养。她最喜欢很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诗人文天祥的一首诗，每当吟到其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她激动不已。有一段时间，她陶醉在这些慷慨激昂的诗词里，涌起一腔忠心报国的激情。

十六岁的贺子珍在永新县城体育场的讲演台上，当着上千听众的面，用她清脆高昂的声调，慷慨流利的言词，勇敢

地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宣战。这时候她已经不光是一个只会颂念诗词歌赋的文弱的女学生，而是一个受过一点社会风雨吹打的女战士了。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其中由阎罗天子，城隍庙主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构成的神权，对农民的精神奴役更为深重。因此，热情而幼稚的革命者贺子珍演说的锋芒，首先指向了神权。

她向农民们宣传不要信菩萨，菩萨是泥胎木头雕的，什么事也不管。农民们不相信，因为这与他们头脑里长期形成的观念相冲突。贺子珍转向中小学去寻找听众。

一天，她来到秀水小学，向学校的儿童团热诚宣讲起来：我们是无神论者，是不信鬼神，不信菩萨的。菩萨会不会显灵呢？不会！你别看他穿袍挂衫，张牙舞爪的好神气，他骨子里是泥巴做的，木头雕的，跟一团泥巴、一段木头没有什么两样。不信，你们跟我到城隍庙去打菩萨，一看就明白了。

天真无邪的小学生们是很容易鼓动起来的。“走呀，打菩萨去啊！”他们大声嚷嚷，一窝蜂似的簇拥着大姐姐贺子珍向城隍庙走去。城隍庙就在秀水小学前边，他们奔进庙去，一声“呵喏”，把那些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的菩萨掀翻在地，一顿乱打。菩萨们果然现出了原形，露出了一截截已经枯朽的木头，学生们还从菩萨的背部掏出了一团泥巴。他们把菩萨拖到庙外，放一把火烧了。有的大人威吓他们说，触犯了菩萨是要肚子痛的。可是，他们把菩萨烧了，也没有一个喊肚子痛。菩萨果真不灵！

从此，菩萨显灵的神话破产了，禁迷信、打菩萨的风盛来行起，随着农民运动的兴起，根深蒂固的神权摇摇欲坠了。

在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小试锋芒的贺子珍，革命信念越来越坚定起来。一九二六年，十六岁的贺子珍由欧阳洛、刘珍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里一名优秀的女战士。

四、县妇女部长的日日夜夜

一九二六年，国共合作后永新县党部增设一个妇女部，挑选年仅十六岁却经过考验的贺子珍当妇女部长。她的妹妹贺怡和同窗好友龙灵等人，跟随贺子珍到妇女部工作。她们白天在校读书，傍晚走向社会，到县城附近街道和乡村召集妇女开会，启发妇女觉悟。她们满腔热情地宣传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号召剪发放足，不穿耳朵，反对带童养媳，反对打人骂人、虐待妇女。

在贺子珍一班女学生的带动下，秀水小学的几个男同学也跟着妇女部的女同志到处去宣讲，组织农民协会、少年团，男女同学之间亲密合作，配合默契。

当时的妇女比男子受的压迫更为深重，她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几乎没有什么自由和权利。当地有句俗话：“妇女四尺布满胸（蓝裙），不晓得世界重不重。”这就是说天下大事妇女不得过问，因为她们不知世事轻重。还有一句更作贱妇女的俗语：“妇娘人撒的尿能当油，要卖也得男人去卖。”妇女没有任何经济权利，终年没有一个钱过手。妇女写字契都不算数，“只有男子中状元，哪有妇女中秀才。”妇女

没有资格上学堂，被剥夺了中“秀才”的权利。永新县的宗族祠堂里，每到清明冬至做公堂，吃酒席，或分丁（男丁）字肉，男子不管老少都有一份，妇女连肉骨头也分不到一块，因而说：“十个插花女，当不得一个拐子仔。”就是说十个美丽漂亮的姑娘，其价值也比不上一个瘸男子。祝贺亲戚朋友办喜事，妇女不能写自己的名字，当家的寡妇也只能写个××氏。妇女的行动没有自由，不准她们看采茶戏，不能随便串门，说什么：“好男子不食茶渣，好女子不过三家。”当地妇女当童养媳的很多。贫穷人家生多了养不起，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女孩生多了的人家虽然生活不很苦，但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支配，也要送给人家做童养媳。童养媳受婆家全家人的欺侮，公公、婆婆、哥哥、嫂子、姐姐、弟弟、未婚夫，人人都是她的“上帝”。到了七、八岁的年纪就得承担繁重的家务担子。吃剩饭、穿破衣，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吃饭只能坐在灶前，上不得桌子，童养媳成了“人下人”。寡妇不准改嫁或强迫改嫁。寡妇嫁人时不能白天上轿，说什么“寡妇上轿的地方，草都不会长”。抬寡妇的轿叫夜轿，夜轿的轿杠子碰到了屋，屋也会倒。男人如果遇上夜轿，还要当场解个小便，以冲邪气。给寡妇写完婚字的笔砚也要丢掉，不然会倒运的。妇女从政治到经济都处在十八层地狱里，抬不得头，动不得身。

深重的压迫，屈辱的地位，早已激起妇女的强烈不满，她们迫切要求解放。最先觉醒的贺子珍等同志，便到处去点火。她首先大声疾呼地宣传剪发放足的好处。她对自己的同胞姐妹风趣地说：“姐妹们，你们还不剪发等待何时？剪了发又省时间又卫生，有钱人的脑壳上佩金戴银，我们穷人没有金银戴，有的连发网子都买不起，拖个发髻在后面，有什

么好看呢？三根头发朝上，四根头发朝下，忙得梳头的时间都没有，索性不梳它，象我这样一把剪刀下去多利索呀！姐妹们，行动起来，剪头发吧！”

姐妹们仰起脑壳，听得津津有味。经过她这样一宣传，永新县城的妇女们纷纷拿起了剪子，剪短自己的头发，也帮助别人剪头发，一下子掀起了一个剪头发的运动。剪掉头发的妇女们，抬头挺胸，精神焕发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剪头发，这在当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它标志着妇女最初的觉醒和解放。

在贺子珍等同志的发动和带领下，永新的妇女解放运动迅猛兴起。到一九二六年冬、二七年春，永新县的乡、村都成立了妇女协会。开始时，在村里召开妇女群众会，每十至十五个妇女选一个代表，然后在乡里召开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报告组织起来的意义，然后选出委员和妇女主任、妇女指导员。主任由妇女部长兼任。贺子珍是永新县妇女部长，她带着火一样的激情，有声有色地把妇女工作开展起来了。

她组织了一个妇女宣传队，许多剪了头发的年轻姑娘，从社会的底层冲了出来，雄赳赳地列队上街，手挽手地唱起歌来：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妇女在“齐奋斗”的歌声中，昂然挺立，成立了自己的各级组织。每个村都成立了妇女协会，有个女会长，三至五个委员，由妇女推选出来。参加协会的妇女各个阶层的都有，她们斗争坚决，不贪生怕死。各地妇女协会在扩大红军，慰劳红军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妇女还参加了农民协会，并发了会章，晚上打土豪，妇女也跟着去分地主的浮财，抗租抗

债，十分踊跃。再不是“妇女四尺布满胸，不晓得世界重不重”，她们也象男人们一样管起大事来。妇女们有大事情就找农会，小事情就找妇女协会。有贺子珍这个女秀才的榜样在那里，她们再也不相信什么“只有男子中状元，哪有妇女中秀才”的鬼话。三十岁以下的妇女多数都到贫民夜校去上学了，有谁不去的，大家就拥进门去，七嘴八舌地“围攻”。如有公婆阻挠，先进行宣传教育，教育几次还顽固，就捉去戴高帽子。这样做以后，原先一盘散沙的农村，上学、开会只要一打锣，妇女们全都来了。妇女们在夜校里读书识字学道理，觉悟提高得很快，出来参加革命的很多。童养媳参加革命的最多，她们表现也最坚决，不少成了党和红军干部队伍的骨干。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各地农民举行暴动，暴动前经过一个时期的秘密工作。妇女们在妇女协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掩护革命同志、烧茶做饭、站岗放哨、送信做侦察、缝制红旗红袖章等各项工作。不少妇女还参加了暴动队，打土豪时，一起去挑东西，并扛起梭标，打起绑腿，戴上八角帽，和男子一样站岗放哨。值日时，贺子珍挂个红缎带子，显得格格外英俊潇洒。

一九二九年第八次攻打吉安时，贺子珍派贺怡、周淑女先去侦察。她们从一个泥水匠的老婆口里知道永新的土豪劣绅都躲在永新会馆的夹墙里，红军指挥员派人去抓，一下抓到三十几个土豪，通过审问，了解到其他土豪劣绅的去向，又扩大战果，一共抓到一百五十多个土豪。对于这次出乎意料的胜利，农民们都很高兴，称赞贺子珍率领的娘子军“真耕（行）”！

五、勇挡逆流

贺子珍在县党部妇女部紧张地忙碌着。

窗外忽然飘进一阵吵骂声。贺子珍正欲出门去看个究竟，两个年轻妇女撕扯着已到门槛边。妇女部的几个年幼学生都目瞪口呆，不知如何解劝。只见贺子珍从容不迫，潇潇洒洒地跨出门槛，笑嘻嘻地一手拉着一个，把两个冤家对头拉进屋来。她招呼她们坐下，倒了两碗山茶递到她俩手上。争吵不休的妯娌俩暂时休战了，端着个茶碗，谁也不说话。气氛稍微平静之后，贺子珍开口了，把她们吵架的事按下不提，亲热地拉起家常来。聊她们的身世，问她们的寒暖，话题由远及近，不露声色地扯到她们吵嘴的事，让她们各自叙述争吵的事由。妯娌俩各自诉说自己的委曲，指责对方不通情理。贺子珍不忙评定她俩的是非曲直，从大处着手开导她们：一个家庭应和睦相处，互助互让，互敬互爱，才能快活地过下去。象你们今天打打闹闹，磕磕碰碰，心里多难过呀！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是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男人不尊重我们，我们妇女自己也不争气，为些小小不言的事吵吵闹闹，怄气斗嘴。妇女要解放，男女要平等，妇女首先要克服自己的弱点，做些男人佩服我们的事情。象你们今天撕扯过街，难怪男人会说我们“妇女四尺布满胸，不晓得世界重不重……”。

这一篇受用的大道理，变成了一把开心锁。妯娌俩听得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个说：“哪个叫她先骂我，她不骂我，我也不会骂她。”另一个说：“今后你好我也好嘛！”

赌气的话里有和解的因素，贺子珍一听有门，笑着说：“好，今后别吵嘴了，现在你们俩个当我的面相对笑一笑，好吗？笑！笑！”

“噗哧”一声，妯娌俩果真笑了，引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一场家庭纠纷在笑声中冰化雪消。

但是，革命队伍里的分歧，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分裂与对抗，却不象家庭纠纷那样好解决。初出茅庐的贺子珍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国共合作时期，已经加入共产党的贺子珍，被党指派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长，又是共产党永新县妇委书记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冰炭不同盆。一九二六年冬，县党部内部产生了思想分歧，开会和闲谈时往往发生争执，越来越厉害。妇女部有个叫贺其兰的，总是跟贺子珍作对，有时大吵起来，内部讨论的事情也经常走漏风声。贺子珍请示党组织之后，把妇女部的工作转入半秘密状态，有时在贺子珍家里开，有时到她家后面的一栋大屋子里去开，有时干脆躲到东门盛家坪的果树林去商议事情。外部的风声愈紧，内部的裂痕愈大，贺子珍密切注意右派人物的动向，指定一些同志去注意他们的言行，每次秘密会议上都要汇报，及时向党组织提供情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形势逆转，永新县的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喊出了“打倒蒋介石”口号的左派，积极领导开展反蒋运动。贺子珍是左派的先锋。

阴霾密布，天色阴沉，永新县城隐伏着杀机。愤怒的人们聚集在体育场的大操坪上，义愤填膺地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平时文质彬彬的贺子珍，挥着有力的拳头登上了

讲台，用她那响亮尖锐的声音发表着激烈的演说。她说明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的真相，历数了蒋介石屠杀人民的罪行，大声疾呼要打倒蒋介石。她声色俱厉地说：“蒋介石举起屠刀，砍落了多少革命者的头颅。血债要用血来还！”

贺子珍慷慨悲壮的演说，深深地激发了人民群众仇恨的怒火，他们同仇敌忾地表示要与蒋介石斗争到底。

枪声撕破了黎明前的纱幕，永新县城街上人心惶惶，奔走逃窜，刚刚卸下门板的店铺又慌忙上好门板，关紧门窗。开过声讨蒋介石誓师大会不久的端午节，逃到城外的右派头子李正连带枪打进城来，发动了“永新事变”，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党的永新县委的负责人刘作述、刘珍、欧阳洛、王怀等同志正在县党部开会，听见枪声立即逃出了县党部。右派头子们大捉、大杀、大抢，疯狂地向永新人民发动了进攻。贺子珍一家首当其冲，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她哥哥贺敏学和几个叔伯兄弟姐妹。贺敏亮、贺敏克、贺敏文和嫂子李四莲、杨兰英在这次事变中被杀害。贺子珍这时在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工作，她父母和妹妹也在办事处油印科做事，幸免遇难。

一九二七年六月，由刘珍、王怀、刘作述、贺子珍等同志领导莲花、永新、安福三县的农民自卫军，攻克永新县城，杀了一些血债累累的反动分子，砸破了牢门，救了贺敏学、吴正宇等三十八个我党同志。

一九二七年七月，吉安的国民党右派也发动了政变，杀害了许多优秀的革命者。吉安事变的第二天，永新又遭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大屠杀，农民自卫军的武装全部被缴械。

但是，站起来的人是不会再回到奴隶地位上去的，真正的革命者没有被吓倒，在危难时节，刘珍、刘作述、贺敏

学、贺子珍等同志挺身而出，收集到两支半破枪，一排子弹，几把大刀和一些木棍，用这简陋的武器武装群众，坚持斗争。刘珍、刘作述、贺敏学等同志率领农民赤卫队，主动撤出永新县城，向井冈山挺进，与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会合。这是一支最早走上井冈山的小型农民革命武装。

六、独挡一面守县城

刘珍、王怀、刘作述、贺子珍等同志领导莲花、永新、安福三县的农民赤卫军举行暴动，夺取了永新县城，打垮了反动武装，解放了被捕同志。

湖南反动派闻讯大惊，立即派了一个营的军队向永新扑来。为了把这股反动武装消灭在中途，领导暴动的几个负责人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开会，研究对策，他们拟就了一个虚张声势坚守空城、半路伏击敌人的作战计划。计划要求农民赤卫军撤出城外，埋伏在山路险要地段，伺机伏击敌人。让农民梭标队守住空城，主要是禾川门，不让被赤卫军伏击的溃逃之敌窜进城来。

守城的任务由谁领头执行呢？贺子珍摩拳擦掌，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她。

贺子珍不久前调到吉安地区任妇女部长，暴动之前，她指挥妇女侦察敌情、做军鞋，慰劳赤卫军，做了大量组织和发动群众工作。暴动之后，她急急忙忙从吉安赶回永新，参加保卫和扩大我军的战斗。

农民赤卫军主力必须拉出城去伏击敌人，只有几杆破枪留下来守城。带着由城里居民临时组织起来的梭标队守城。

是个艰巨任务。大家相信经过斗争考验，崭露头角的贺子珍能够独挡一面担起这个重任。

贺子珍渴望着战斗。她不顾旅途的疲劳和任务的艰巨，毅然接受了守城任务。她把农民赤卫军送出城去之后，马上着手组织守城力量。哪些人把守城门，哪些人站在城墙上巡逻，哪些人供应茶水，遇到敌人如何对付，各方面的工作怎样策应、协调，她都有章有法地作了仔细交代，守城准备工作做得井井有条。贺子珍背着一杆步枪，在城门和城墙各处巡逻着。她当时虽只有十七岁，但是早已闻名全县城。这些比她年纪大得多的梭标队员，都在大操场上听过她的讲演，对她很敬重，乐于服从她的指挥。

傍晚时分，从湖南方向来的敌军分两路逼近永新南门和西门。他们还没有走进城门，就受到早已埋伏好的农民赤卫军的袭击，短兵相接地打起来了。战斗进行到第二天的拂晓，农民赤卫军把一营敌军击溃了，缴获了一百多支枪。

溃逃之敌企图窜进永新城内，固守待援。但是，他们走近城门，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城墙上露出步枪和梭标，杀声四起，严阵以待。城楼上露出贺子珍肩挎步枪的半截身影，飒爽英姿，镇定从容。犹如惊弓之鸟的敌人不知城内虚实，赶紧丢盔弃甲，掉过头来四散逃窜。贺子珍率领的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梭标队，居然吓退了全副武装的敌兵，农民赤卫军都很佩服贺子珍的智慧和胆略。

战斗结束之后，考虑到敌众我寡，县城难守，农民赤卫军按预定计划撤离永新。

这时，农民赤卫军早已派人与井冈山的王佐、袁文才取得联系，与他们合作成立了宁（冈）、永（新）革命委员会。撤离永新县城的农民赤卫军，向井冈山行进，去与袁文

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会合。

在走出永新城门之后，贺子珍回头注视着巍然矗立的城楼，涌起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曾几何时，她还带领一批梭标队员日夜站立在城楼上，威风凛凛地把守着城池，今天却要跟它告别，让敌人的兽蹄重新蹂躏这刚刚伸直腰背的县城，她内心是悲愤的。

已是初秋天气，井冈山暑气未退，太阳仍是热得烤人。羊肠山径，崎岖难走。这支农民队伍都是刚参军的作田佬，没有经过什么严格训练。走过一段路之后，个个感到口干舌燥，没精打彩。队伍稀稀拉拉，松松垮垮，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

贺子珍也没有走过这么长的山路，腿肚子发酸了。但是，她以坚强的意志克服疲劳，给赤卫队员们讲故事、说笑话、打山歌，热情地做着宣传鼓动工作，振作他们的精神，使他们忘记炎热和疲劳。她帮助掉队的同志背枪和行李，催促他们赶上队伍。赤卫队员们看到一个年青嫩弱的女子，情绪这样饱满，意志这样坚强，受到感染，也提起了劲头，大踏步地行走在陡峭的山路上。

部队经过龙源口桥，爬上七溪岭到达望月亭，作短暂休息。赤卫队员们看到贺子珍白净的脸上闪着晶莹的汗珠，衣服也被汗水湿透，象从水里捞起来的一样，都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她吃得苦，并关心地请她坐下来歇一会。有的人开玩笑地对她说：“石灰老，走苦了！”

贺子珍瞥了眼田里插着的吓鸟的稻草人，开玩笑地说：“干革命不吃苦还行，看你们这些稻草人，太经不起拖了！”

这虽说是玩笑，但却激励了赤卫队员的吃苦耐劳精神。

他们谁也不愿做稻草人，休息后继续行军时，一个个昂首挺胸，队伍整齐多了，行军速度也快得多了，很快翻过了七溪岭，朝着宁冈砦市大踏步前进。

七、老百姓是再生父母

一九二八年夏初的一天，死神第一次降临到贺子珍头上。

一九二八年一月，在吉安永吉办事处已经改为吉安县委，由永安中心县委领导，王怀为书记，在吉安与永丰之间活动，配合农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地方工作。贺子珍是开展地方工作的活跃分子，她经常穿着普通妇女的服装，从这个村庄走到那个屋场，侦察敌情，宣传和组织群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乡村政权。

一九二八年夏初，红军准备攻打永新县城。贺子珍听说要解放自己的家乡，兴奋鼓舞，自告奋勇要求到永新南乡山田山区去开展工作，了解敌情。她化装成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串东家走西家，扎扎实实地发动群众。不料他们的行动被敌探发现，跟踪而来。正当她同几个干部在这个山村研究工作时，敌人已经悄悄包围了山村。同志们发现偷袭的敌人后，立即突围四散奔跑。为了掩护战友，贺子珍最后离开，她正要撒腿逃走的时候，却被一位乡村妇女拦住了。

这位妇女眼看敌人已经逼上门来，贺子珍目标明显，很难逃出敌人魔掌，她便当机立断地把贺子珍拉进里屋去。可是四壁空空，藏在哪里呢？

“大嫂，我还是走吧，莫连累你。”贺子珍过意不去，

挣脱那位大嫂的手，想跑出门去。

“出去送死呀！”大嫂生气了，把贺子珍的手拉得更紧。

敌人的吆喝和砸门声越来越响，大嫂急得头上冒汗。她目光四下瞅着，忽然在那顶黄黑陈旧的蚊帐上停住了。她灵机一动，急忙把贺子珍推进帐子里。

“快，快，你装病躺到床上去！”她对年轻的儿媳妇吩咐道。

机灵的儿媳妇立即用锅灰涂青了脸，装作将死的病人，有气无力地呻吟着，与贺子珍躺在床上。大嫂又让小儿子隔着蚊帐坐在贺子珍的身上，冲床里号啕大哭。

这一幕戏演得很逼真，一家三口都为掩护自己尊敬的红军大姐成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敌人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反来复去地搜查着，弄得鸡飞狗跳。他们闯进这间正在哭丧的屋子，觉得晦气，打眼一瞧，黑糊糊的帐子里看不见人，只听到细微的喘息。他们没有仔细搜索，就赶紧骂骂咧咧地退了出去。敌人以为“女土匪”一定早已冲出村外，于是吆喝着朝村外追去。

“噗哧”一乐，儿媳妇停止了呻吟，咯咯地笑着说：“这班炮子鬼，真把我憋死了！”

大嫂连忙摆摆手，制止儿媳的大声说话，生怕敌人再寻回来。

好一阵没有动静，贺子珍道了谢，正要走，大嫂又把她拉住，做了一顿饭让贺子珍吃饱，才依依不舍地把她送出门去。

贺子珍安全脱险，回到自己同志的身边。大家正为她的安全捏一把汗，见她无恙回来，格外高兴，都夸奖她机智勇

敢，临危不乱。贺子珍把那位妇女一家三口掩护她的情形说了一遍，最后感慨地说道：“群众的机智和勇敢才使我脱了险，要不是那位大嫂，我这条命早丢了。我的生命是人民给的，老百姓是我的再生父母！”

八、迎接毛委员上井冈山

天朗云清，秋风送爽。毛泽东行走在山径小道上，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抄小路，翻高山，涉溪水，从湖南浏阳文家市出发，经过萍乡、莲花，向井冈山进军。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薄暮时分来到了永新三湾。

三湾是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位于永新、宁冈、茶陵交界的九龙山区，只有五十多户人家。部队进村时，正是油茶采摘时节，村里的青壮年在山上摘木梓，老年人听说兵来了，纷纷上山藏躲。因为他们过去饱尝了兵变浩劫之苦，见到“兵古佬”就害怕。

毛泽东指示部队在老百姓没有回村以前不要进民房，同时派人四处喊话，宣传新式军队的宗旨。战士们住进祠堂庙宇，宣传队的同志手提石灰桶，在墙壁上刷写标语：“暴动，打倒国民党！”“暴动，打倒蒋介石！”“暴动，打倒土豪劣绅！”“暴动，土地革命！”“中国工农革命军是穷人的子弟兵！”

兵进村半天不见骚动，一些老人壮起胆子溜回村来观望，看见的景象使他们大为惊异：自己家里居然没有住进军队，家具什物也没有动，士兵说话和气，不少人还穿着农民老俵的衣服，正在帮助挑水打柴、舂米推磨。他们心中暗暗

高兴：这些“兵古佬”硬是不同，称得上秋毫无犯，和国民党兵完全是两路啊！老人们当了宣传员，奔走相告：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回来了！人们纷纷从山上跑回村来。

这时，跟随袁文才及农民自卫军在宁冈砦市一带活动的贺子珍，听说自己家乡来了上千人的军队，不知底细，便和袁文才、贺敏学等同志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大家凑了一下听来的消息，隐隐约约，前后矛盾，头脑敏快的贺子珍说：

“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防备。三湾离砦市才四五十里路，走得快，半天就可以到。我们赶紧把农民自卫军撤到茅坪一带去打埋伏吧，同时连夜派人到三湾去探明情况。”

袁文才是江西宁冈县人，中学生，早年参加过“绿林”的马刀队，反对地主的压迫，大革命时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任赣西南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马日事变”后，他同“老庚”王佐，凭着井冈山的有利地形，各保存了六十多支枪。坚持和豪绅地主作斗争。如今，贺敏学、贺子珍等同志领导的农民赤卫军与他会合后，不但增加了力量，也增长了他的见识。机灵的袁文才听了贺子珍要连夜派人去三湾探听情况的话，觉得很有道理，连忙集合部队，沿山路向茅坪撤退。行前，派了两个亲信去三湾调查。

袁文才和贺敏学、贺子珍、陈慕平等同志撤回茅坪后，连夜在象山庵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情况，研究下一步战斗行动。蹲在地上仔细听完每个人发言的贺子珍站起来说：“三湾这支部队如果是国民党反动派，肯定要来茅坪吃掉我们。那么，我们就要利用山险和他们兜圈子，寻找机会把他们打下山去。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就欢迎它上井冈山，壮大我们的力量。”

正在抽烟思索的袁文才，喷出一口浓烟，点点头说：

“子珍同志不愧为懂得文墨的人，有见识。”

贺敏学也说：“子珍妹讲的这两种可能性都会有，我们还是准备对待最坏的可能吧。注意加强岗哨，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说完，贺敏学和袁文才、陈慕平，踏着月色来到了茅坪河边，对岗哨一一进行了检查，叮嘱他们加强防范。

第二天的黎明，东方刚刚撕开一条亮边，茅坪河水波光粼粼，山上山下雾气腾腾，露水浸湿了农民自卫军的衣服。从浓雾中钻出两个自卫军战士，匆匆爬上了象山庵农民军指挥部。他们兴奋地向袁文才、贺敏学汇报从三湾探听来的情况。

贺子珍一边听汇报，一边认真思索。她说：“这么好的队伍，不杀人，不放火，不抢农民的东西，反而向农民宣传秋收暴动的道理，莫不是润芝同志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来了？两名调查回来的农民赤卫军战士说：“我们不认识润芝，不知道哪个是他。只听说有一个叫毛委员的，好高的个子，好长的头发，穿的是土布衣，跟士兵是一样的打扮，讲的话实实在在，多是我们农民老俵爱听的道理。”

贺子珍很有兴趣地听完，又问：“他们写在墙上的标语，你们都看清楚了吗？”

自卫军战士说：“看清了，没有错！我们虽然认不全，意思都懂了，讲的都是农民暴动的事。”

细心的贺子珍又问：“为什么不撕下两张来看一看呢？”

自卫军战士摸摸颈脖子，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没有想到，不晓得要撕回两张来大家看。”

一直在认真听这场对话的袁文才点点头说：“子珍的意见好，撕下几张来看看，我们心里才踏实。”说完双目炯炯

地注视着大家，征询意见。贺敏学、陈慕平都同意再派人去撕标语，可是派谁去呢？

贺子珍拍了拍衣襟，理了理短发，恳切地对哥哥贺敏学说：“哥哥，派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吧？”

贺敏学犹豫地说：“路途危险，你又是女同志，诸多不便啊！”袁文才也劝阻说：“子珍同志，你去歇着罢，我另派两个老练的同志去。”

贺子珍眉毛一挑，执拗地说：“不！三湾情况我熟悉，还是我去好。”她把妹妹贺怡交给袁文才的爱人谢梅娇，说：“梅姐，你帮助我照顾阿妹吧。”

贺怡撅起嘴：“不，姐姐，我不留下，你带我也去嘛！”

贺子珍看着顽皮的妹妹已经跑出门去，只好摇摇头同意带她去了。袁文才不放心，加派了两名自卫军战士和她们同行。

贺子珍挽起头发髻，身穿士林蓝，化装成农民媳妇，暗插手枪，沿着山间小道，向三湾急速走去。到达三湾时，已是黎明时分，贺子珍姐妹刚要进村时，在路旁碰到了李立同志的叔叔。贺子珍急切地问：“李大爷，你到哪里去？”

李大爷拍拍衣兜，得意地：“毛委员要我给袁文才送信去！”李大爷讲到这里，捋捋胡须，自豪地提高了声调：“毛委员的军队可好哩，分粮给穷人，给老头、老太婆砍柴、挑水、打扫卫生，什么事都做，还说到井冈山不走了，和我们一起打土豪分田地……”

贺子珍听后十分高兴，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但也不忘此行的任务，随即吩咐随来的自卫军战士进村，趁人不注意把工农革命军贴在墙上的标语一连撕下了五张，然后连忙陪同

李大爷赶回茅坪。在半路上，遇到了前来接应的袁文才、贺敏学、陈慕平和二十多位农民自卫军战士。

贺敏学老远就高兴得跳起来：“子珍妹回来了！”

大家围坐在一棵大树下，贺子珍迫不及待地报告说：“一点不错，就是毛润芝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她把标语拿出来给大家看：“看这就是他们的标语！跟我们的主张一模一样啊！”贺子珍说完，又把毛委员托李大爷带给袁文才的信念了一遍信，中提到要亲自会见袁文才、王佐，与农民自卫军一起共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袁文才翘起大拇指表扬贺子珍，又把毛委员的信亲自拜读了一遍，决定和毛委员会见。

袁文才的秘书陈慕平更为兴奋，他说：“毛委员来了，井冈山大有希望啊！毛委员在武汉农讲所时，听过他的报告，他是我的好老师，我愿步子珍的后尘，去三湾拜望毛委员。袁文才认为陈慕平去最合适，立即点头同意了，并叮嘱陈慕平向毛委员详细谈谈井冈山的情况，欢迎毛委员早日上山来。

陈慕平受命兴冲冲直奔三湾去了。他走进协盛和杂货铺的后房，找到了他的老师，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陈慕平要告辞了，毛泽东笑着站起身来，握着陈慕平的手说：“你回去问候袁文才同志，我很快就会去看望他。让我们合起手来，共同战斗吧！”

过了几天，毛泽东亲自到距宁冈古城十五华里的东沅大仓村，会见袁文才。袁文才同贺敏学、贺子珍等人在大仓村桥头佇立等候。当袁文才远远望见从烟尘中跑出五匹马，毛泽东轻骑简从，他赶快走上前去迎接。毛泽东老远下了马，与赶上来的袁文才等人亲切握手。这几个农民自卫军的领导

人，看见毛泽东同志魁伟的身材，头上蓄着二、三寸长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棉袄，打着绑腿，穿着草鞋，态度和蔼，脸上含着温和的笑容，感到很亲切，一下子围了上去，簇拥着毛泽东边走边谈，走进了大仓村。毛泽东给袁文才等人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还主动赠送了一百条枪给他们，鼓励他们扩大武装，共同革命。袁文才深深地受到感动，当场表示愿意积极帮助工农革命军筹粮和安置伤病员，并满口答应去做王佐的工作。

中午，袁文才以崇敬的心情宴请毛泽东一行。在席间宾主频频举杯，融洽交谈。贺子珍为毛泽东雄辩的口才和透彻的道理所吸引，全神贯注倾听着他的每一句话。她学生时代读过他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夹雷带电的政论文章，入党之后又读过他论述精辟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早就渴慕见到这位她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今天她终于见了面，又亲耳聆听了她清雅的谈吐，更增加了她对毛泽东的敬重。

农民自卫军迎接毛泽东的部队来到宁冈，他的住处恰好同贺子珍在一个院内，朝夕见面。毛泽东经常兴致勃勃地向贺子珍打听有关永新、吉安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贺子珍也常向毛泽东请教有关革命斗争的问题。堂屋里或洋桥湖的田埂上，留下他们倾心交谈的身影。

九、三 进 永 新

永新，是井岗山区的门户。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地形复杂，山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永新县城水陆两便，是通往宁冈、莲花、吉安等地的交通要隘。要巩固和扩

大井冈山根据地，必须夺回敌人占领着的永新县城。毛泽东为解放永新曾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做了充分的准备。贺子珍是永新县人，更关心家乡的解放，她积极奔走，提供了重要情报。

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旬，红军第一次攻下永新县城。这一天下午五点钟，贺子珍率领几个妇女和青年，挑了两担蔬菜和一担猪肉，兴高彩烈地慰劳红军。

在井冈山的毛泽东，连续接到前线部队击溃了金汉鼎部，占领了永新，进占酃县的湘军已往安仁撤退的情报，高兴极了，便于第二天带了一连兵来到永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建立革命政权。毛泽东住在伪县政府内，永新的地方同志都去拜望他，向他汇报地方工作。那天晚上，贺子珍提着两只鸡，两瓶酒，代表妇女协会也去慰劳毛泽东和他的一行人。

通过在宁冈的一段接触，毛泽东对这位活泼可爱、谈吐清雅的女同志印象很深，这次便邀请她一起吃晚饭。在晚餐桌上，贺子珍向他劝酒，他给贺子珍夹菜，两人谈得融洽。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召开永新县党团会议，商讨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和发展党团组织等问题。贺子珍在会上作了系统周详的发言，一双晶莹的眼睛顾盼自如，神情落落大方，讲话很有条理，款款道来，娓娓动听，而且谈锋犀利，颇有见解。会开到深夜十一点时才散，毛泽东又把贺子珍留下，向她询问了一些情况，交换了一些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意见。第二天一早，贺子珍又来到毛泽东的住处，给他起草文件提供情况，帮助誊写文稿。

红军曾经三次打进永新县城，第一次和第二次都在城里

隆重召开了军民联欢祝捷大会。坐在会场前面的是兴高彩烈的群众队伍，有妇女会、儿童团、自卫队、工商联。坐在会场后面的是威武的工农红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三十一团。部队和群众互相拉着唱歌，一片欢乐的气氛。

两次祝捷大会上，贺子珍都作为地方和妇女的代表讲了话。每次讲话都给战士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她的第二次讲演，当时听过的人现在也还能绘声绘色地回忆给你听。

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作司仪，毛泽东、朱德、陈毅讲话之后，就是群众代表发言。

只见贺子珍穿着一身朴素的蓝布衣服，身佩短枪，腰束皮带，目光灼灼地扫视着会场，激动地说：“同志们，兄弟姐妹们，革命烈火烧到我们永新来了！我们永新盼到了光明，人民得到了解放。请问大家，是谁领导我们得到解放的？”台下立刻爆发出响亮的回答：“红军！”“共产党！”

她又继续鼓动性地发问：“对！是红军、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可是军阀、地主、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还想欺压我们，不让我们翻身解放，这又怎么办？”象往滚油锅里撒了一把盐一样，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怒吼：“同他们打！”“消灭他们！”怒吼平静下去后，她又有条不紊，慢声细语地讲着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当她愤怒历数敌人的残暴和阴险时，台下又响起震天撼地的口号声：“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当她满腔热情地赞扬妇女老幼和各界人士支援红军，送郎、送子当红军的模范事迹时，全场军民都报以会心的微笑和热烈的掌声。

坐在主席台上的何长工、王怀等同志，不停地在那里悄悄耳语，评论着贺子珍的讲话：抑扬顿挫，刚柔相济，口齿流畅，措词准确，富于鼓动性，贺子珍真是妇女中一流人物。毛泽东也冲着贺子珍微笑，并且情不自禁地称赞道：“讲得好啊！讲得好啊！”

的确是讲得好啊！解放后杨得志同志碰到贺子珍，还记忆犹新地提起那次讲演，他说道：“贺大姐，你还记得吗？从井冈山下来时，在永新县城大操场上开群众大会，你在会上讲了话，毛主席也在会上讲了话。我就是那次认识你的，讲得真生动啊！”

十、“双枪女将”的传说

贺子珍是“双枪女将”。这个传说，在井冈山地区流传甚广。传说，是一种民间的口头文学形式。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根据对人物的爱憎，进行褒贬和加工，添枝或加叶，难免有夸大或走样的地方，但每个传说一般都是有根据的，至少是有影子的。

一九二八年夏秋之交，毛泽东同朱德深入敌区观测地形，了解敌情。他们蹲在树丛中正聚精会神地研究作战部署，忽然枪声大作，鸟飞雀噪。他们被偷袭的敌人发现了，受到包围，情况十分紧急。敌众我寡，不能与敌人交锋。于是他们和随从人员仓促指定集合地点后，立即分散转移。

熟悉地形的贺子珍站了出来，自告奋勇地要求殿后掩护。毛泽东、朱德作了必要的布置后，同意了她的要求。当领导同志悄悄安全转移之后，她飞身上马，向相反的方向奔

驰，并在马上回头向敌人开枪，吸引敌人追赶。她连续射击，偶尔射倒了一、二个追赶的敌人，骑着马一口气跑了四十多里。

追赶的敌人是一伙没有见过大阵势的地主武装保安队，见有人倒毙在地，又看到女红军如此厉害，又怕周围有埋伏，吓得止步咋舌，不敢再追。他们回去后余悸未消，夸大其辞地把“双枪女将”贺子珍的枪法渲染了一通。

于是，贺子珍“双枪女将”的名声便传开了。过了不久，捉拿“双枪女将”贺子珍和贺家三兄妹的通缉令就到处张贴了出来。通缉令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凡捉拿到贺敏学、贺子珍、贺怡三兄妹及其亲属者，有重赏。活的赏洋五万，死的赏洋三万。知情不报者，立地枪决……

女红军贺子珍，早期带有传奇色彩的战斗故事还不光这一个。

早在一九二七年底，毛泽东带领中国工农革命军经过三湾改编，来到了井冈山，开始在茅坪、遂川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开创革命根据地。赣敌朱培德慌忙调集重兵，扑向遂川，同时又派出一营匪军开进新城，同盘踞在新城的伪县长张开扬狼狈为奸，妄图以新城作跳板，步步进逼井冈山，以达到拔掉边界红旗，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目的。

新城位于宁冈砦市的东边，是永新通往宁冈的咽喉，位置十分紧要。毛泽东洞察敌人的罪恶企图之后，当机立断，迅速作出了避实就虚、歼其一路的决策。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宁冈县茅坪村的攀龙书院召开了攻打新城的军事会议。贺子珍和袁文才、王佐、贺敏学、贺怡等人列席了会议。贺子珍在会上听了毛泽东对敌我双方力量的精确分析和精密的作战部署，十分钦佩。她

心中立下誓言，要在这次战斗中多杀敌人，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立功。

二月十八日，贺子珍腰佩手枪，随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二团星夜出发，一个急行军，在天亮前赶到了新城。他们借着黎明前的深沉夜色的掩护，分三路埋伏在新城西门的稻田里，待机歼灭敌人。

新城战斗的总指挥部设在离新城不远的棋山岭上。毛泽东吩咐一团各营分别控制了新城的东门、南门、北门，网开一面，留下西门引诱敌人进入袁文才、王佐的伏击圈。

十八日拂晓，敌人照样在南门外架枪出操，没有任何戒备。当毛泽东从棋山岭发出攻城信号后，埋伏在南门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出敌不意地发起攻势，当场击毙十多名敌军，缴枪三十多支。残敌逃入城内关上城门，企图顽抗。这时，担负主攻东门的毛泽覃，指挥遂川县赤卫大队和一团一营，架梯攻城。敌人惊慌失措地向北门逃窜，又遭我一团一部分队伍的阻击。于是，敌军调转屁股向西门逃窜，进入我军早已张开的布口袋。贺子珍等同志看到敌人象被赶的猪一样，呼哧呼哧地跑过来，拔出手枪，张开了机头。她紧握手枪，屏住呼吸，等待敌人跑近，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敌人进入伏击圈时，袁文才说声“打”，埋伏在洼地里的二团战士，步枪齐发，打得敌人哭爹叫娘，狼狈逃窜。这时，贺子珍跳出掩体，挥枪射击。敌警卫营的一个连长垂死挣扎，用手枪逼令敌军反扑过来，企图凭恃他们手中的优良武器，杀出一条路突围出去。敌连长冲在最前头，凶神恶煞般带领敌人反扑过来。贺子珍眼尖手快，借着稻田里的土砖坯作依托，对着敌连长扣动了扳机。枪声一响，敌连长应声栽倒在稻田里。敌人见连长被打死，顿时乱成一团蚂蚁。一个敌排

长又领着几个敌人从侧面朝贺子珍打冷枪。埋伏在另一侧的贺怡发现了，大声喊道：“珍姐，小心侧面的敌人开枪！”贺子珍听到后，迅速转身又是一枪，击毙了敌排长。残敌看见连、排长被打死了，个个心慌意乱，象无头苍蝇一样在原地团团转。正在敌人惊慌失措时，袁文才指挥全团战士掩杀过来，高呼：“缴枪不杀！”敌人看见前面的工农革命军包围过来，挡住了去路，后面又有工农革命军从城里追杀出来，好象老鼠进了风箱，只好乖乖地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了。

贺子珍挽起袖子，拣起敌连、排长的驳壳枪，插在腰间的皮带上，带领贺怡、谢梅娇几个女红军打扫战场。俘虏看见贺子珍的英姿，惊叹地伸出舌头说：共产党的女兵都这么厉害，腰插双枪，枪法又准，真了不起！

十一、井冈山的灯光

夜已经很深了，井冈山笼罩在如墨的夜幕之中，四周一片静谧。只有茅坪的一座二层楼房的窗口上，透出一片黄色的光亮。谁还没有睡呢？在油灯明亮的光圈里，毛泽东正伏案奋笔疾书，随着笔杆的挥动，一行行遒劲的毛笔字洒落在毛边纸上。桌上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

在八角楼的屋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没有睡，灯光把她忙碌的身影投射到墙壁上，来回晃动。她就是女红军战士贺子珍。

前半夜开会，她搞来一盆炭火，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烤着手脚。开了半夜会，她想到大家肚子一定饿了，又收罗家底，给每人搞了一碗炒面。今天算是亏待战友们了，往日

开会到半夜，她往往给大家搞一碗永新名菜——粉蒸肉，再端上一碗陈酒，让战友们打打牙祭。她对毛泽东的战友们照顾真是无微不至。

现在会散了，夜静了。她又坐到灯下来翻阅和剪贴报纸，一会儿把毛泽东写好的草稿拿过来誊清，一会儿给毛泽东沏茶弄烟。这位年轻能干的女战士，此时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兼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是毛泽东得力的助手。

毛泽东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了伸腰，把油灯拨暗一点，打开窗户，呼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潺潺的茅坪河水掺和着战士酣睡的鼾声，飘进窗来，激起毛泽东的种种思绪。可爱的井冈山，可爱的红军战士！你们可知道笼罩在你们头上的阴云还没有扫除吗？

毛泽东正在起草《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问题决议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这个决议案的一部分。此时，他正写到井冈山八月失败，心情有些沉重。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永新、龙源口大捷之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处于全盛时期，红色区域扩大到永新、宁冈、莲花、遂川、吉安和湖南灵县、茶陵各一部分。

就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势大好的时候，湖南省委派了杜修经从安源来到永新，强令红四军主力立即开到湖南去打城市。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领导同志在永新县城召开红四军军委委员、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永新县委委员联席会议，对湖南省委的错误主张，力持异议，决定红四军继续留在井冈山地区各县分兵发动群众，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是，杜修经利用毛泽东在永新分兵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的机会，鼓动红四军二十九团部分战士想回家的情绪，

把红军大队人马拉到湘南去了。结果损兵折将打了败仗，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优秀共产党员王尔琢同志也不幸被叛徒打死了，造成痛心的井冈山八月失败。毛泽东闻讯，立即率兵赶往湘南，迎回红军，并收复了井冈山的许多失地，形势又开始好转。但是到了十月份，红军中仍有少数人被井冈山八月失败吓破了胆，对坚持井冈山斗争缺乏信心，林彪也到处散布“靠红米、南瓜是守不住井冈山的”悲观论调，怀疑“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下去”。因此，毛泽东和朱德、陈毅、谭震林、陈正人等同志商量，决定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为了开好会议，毛泽东在八角楼住室日夜翻阅各种报纸，搜集材料，起草《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同志在决议案里特别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节，详细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指出“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大意义的。”井冈山“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全国政权的取得”。当前“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毛泽东写到这里，转回头来以商讨的口气征求贺子珍的意见说：“我这样写，是不是符合实际？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党的干部能不能够接受呢？”

贺子珍也停下正在誊写的笔来，思索了一会，认真地答复说：“你的看法是正确的，分析得有道理。这样写既可以

鼓舞大家的信心，提高革命的勇气，又可以消除一小部分人的悲观情绪。”贺子珍讲到这里，双目炯炯地对着毛泽东说：“润芝，你这些论点，立意很高，归纳得很有条理，说出了我们井冈山红军战士心里想要说的话。”

毛泽东的文章里提到永新县的革命斗争，贺子珍便乘毛泽东休息思考的空隙，向他详细介绍了井冈山王佐、袁文才和永新县游击队成长的经历。她说：我们井冈山上大井王佐，井冈山下的茅坪袁文才，和我大哥贺敏学为队长的永新农民自卫军，开始力量不大，枪支很少，从一九二六年以来，敌人进“剿”多少次，也没有消灭我们。相反，我们依靠井冈山的山险，利用熟悉的地形，在井冈山万山丛中和敌人兜圈子，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叫苦连天。我们趁机消灭了不少白狗子，逐渐壮大了自己，人和枪都多起来了。后来，你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朱德、陈毅同志又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队伍和湘南农军上了山，组建了强大的红四军，连续取得了草市坳、五斗江、龙源口三次战斗的胜利，井冈山根据地人多了，军队多了，枪也多了，政权也越来越巩固了，现在的井冈山呀，的确是处于全盛时期呵！在这种大好形势面前，还有人怀疑红色政权能不能够存在下去，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毛泽东听了贺子珍的话，兴奋得站了起来，紧握着贺子珍的手说：“自珍，有你这种想法的人，在红四军是多数吗？”

贺子珍听到“自珍”的亲昵称呼，心里漾起一股幸福的激情。她欢悦地回答道：

“广大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地方干部都是这样想的。昨天，我哥哥到这里讲，永新县赤卫大队的战士们，劲头可

足哩，都嗷嗷叫地吵着要打仗！几个月我没有回永新，形势大变了，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后，区、乡都成立了工农兵政府和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群众都起来了，到处飘扬着红旗……。”

毛泽东边听边记，连连点头说：“你讲得好啊！就把这种思想和情景写进党代表大会决议里面去。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红旗是不会倒的，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毛泽东写得飞快，案头上的稿纸一会儿就堆起了一叠。

井冈山深秋的夜晚是寒冷的。窗外寒风呼啸，贺子珍打了个寒噤。她赶忙从床上拿过一条毯子，裹在身着单衣的毛泽东身上，又用火柴棍把油碗里的那根灯芯往上拨了拨，使光线更明亮一些。她很想再添一根灯芯，但毛泽东有夜晚点灯时只准点一根灯芯的规定，他自己一向严格遵守，只好作罢。贺子珍看见毛泽东的左手往桌上的烟盒子伸过去，可是香烟盒子空了。毛泽东烟瘾很大，一根接一根地抽得很凶，没有烟抽，他的写作思路就会受到影响。她连忙到隔壁袁文才家里要了一点烤烟叶子，用手揉成碎片，然后用废报纸裁成一小条一小条，一颗一颗地细心卷起烟来。

毛泽东拿起一棵喇叭形卷烟，贺子珍划亮一根火柴给点上。毛泽东深情地望了她一眼，再次催促她上床先睡。这些日子她是明显地消瘦了，眼窝都深陷了进去。每天阅读文件，整理和分发材料，抄写和校对文稿，多么繁重的工作啊！她还兼任着苏区妇女团政委的职务，有大量的社会工作要做。毛泽东关心地问：“熬得太晚受不了吧！累了，你就先上床睡觉吧！”贺子珍摇摇头说：“我不困。我替你把文稿抄清楚，天亮后好送给前委朱德、陈毅、谭震林等同志传阅。”说着，便坐在毛泽东的旁边，一张一张地抄起来。

毛泽东写得飞快，贺子珍抄得飞快。井冈山的曙光照进八角楼的时候，一叠誊写清晰的文稿已经摆在案头。他们又奋战了一个通宵，迎来了曙光。

十二、抢精神食粮

黄洋界下的宁冈县茅坪，有一座普通而又不寻常的土砖房，清澈的茅坪河水从它门潺前潺流过，浓荫如盖的两株大枫树是它的绿色屏障，房后是栽着翠竹、青松、月季的庭院，庭院后面就是著名的八角楼。在八角楼的屋子里，办公桌上、床上、地板上，到处摊放着一张张黄褐色的旧报纸。一天的工作忙完之后，贺子珍在油灯下静静地坐下来，在一大堆杂乱的报纸面前忙碌着。她一会儿用双手展开一张报纸，从一版到四版翻阅着，读到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报道、文章，她连忙拿起笔来画个圈。从反动报纸的夹缝里，读到了一些有关社会、人民和革命的真情实况时，她会高兴地用铅笔打上几道杠。她象个细致的侦察兵一样，用敏锐的眼睛搜索着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反面文章正面看，从这些破旧的报纸上找到一些有用的文字，为正在撰写文章的毛泽东提供参考材料。她把象筛子一样滤过一遍的报纸码成整齐的一叠，堆放在桌上的一角，预备给毛泽东随时翻看。又把毛泽东阅读和利用过的报纸，拿过来，摊放在床上，嚓嚓地动起剪子来。她按照毛泽东做的各种记号，把报纸剪下来，分成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动态、人民动向等各种门类，精心地贴在剪报本上，以供毛泽东随时抽阅。

贺子珍那时在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作机要秘书，很大一

部分精力用在为毛泽东抄写文稿、保存文件、整理剪贴报纸上。

井冈山，这块在一片白色包围中的红色根据地，交通阻隘，又没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消息闭塞。纵览山外风云的毛泽东，除了听取前线红军指战员和热心支持红色政权的老百姓的汇报外，还要通过报刊杂志的渠道，来了解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况，作为制定作战部署和决策的一种参考。而当时要得到一点报纸是很不容易的。国民党反动派不但经常进行军事“围剿”，而且在根据地四周，层层布哨，密密罗网，使红区、白区几乎断绝联系，“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有时真是到了极度。”象报纸这样的精神食粮，更是在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之列。当时要弄到点书报，真是困难得很。毛泽东曾经派了几个同志化装老百姓到附近城镇跟小商人联系，请他们代订一些书报。结果花了很多钱，只能买到一点旧的书报。一份《申报》要隔一个多月才能看到。有一次，毛泽东还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去夺取敌人的报纸。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得来而又如此需要的报纸，是多么珍贵啊！

贺子珍手里掂着一张张发黄枯边的报纸，比拿着一块块黄金还要珍惜。她每天晚上都这样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细致认真地一张张、一条条、一行行地翻阅整理着报纸，为正在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的毛泽东提供各种资料，搜集各种信息。

贺子珍不仅充分利用报纸，还冒着危险，参加过抢报纸的战斗行动。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经会昌，向瑞金挺进，进入谢坊时，

瑞金城内守敌吓得连夜逃跑了。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经谢坊、武阳、九堡，向大柏地、宁都方向前进。那时，对尾追的敌人和瑞金城的动向都不清楚，为了了解敌情，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毛委员在武阳时，决定派宋裕和带一个连到瑞金县城去抢报纸，并吩咐抢到报纸后，立即赶上主力部队。

贺子珍听说要派宋裕和去抢报纸，也摩拳擦掌，向军部报告，要求随同宋裕和一起去。得到批准后，她头戴缀着红五星的军帽，身着军装，腰束皮带，佩戴着驳壳枪，英姿飒爽地走在抢报纸的行列里。对于抢报纸，她比谁都手痒。军部没有电台，也没有电话，上海党中央的指示不能及时得到，敌人的情况也若明若暗，毛泽东要指挥部队作战，除派出大批侦察员之外，还要从敌人的报纸上寻找消息，分析敌人的动态，判明情况，所以，每打下一处，她第一件事就是到敌人仓促撤退的司令部里，寻找散乱满地的报纸，象宝贝似的一张张装进挎包里，那心情比亲手抓到几十个俘虏还高兴。现在，她能亲自参加抓精神“俘虏”的战斗，更是格外兴奋。她迈着轻快的步伐，跟在战斗小分队的后面，疾速向瑞金城进发。

到了瑞金城郊，宋裕和指挥红军连的两个排，分两路包围瑞金城，经过一场战斗之后，宋裕和和贺子珍带一个排闯进城去，直扑伪县政府大院。进入伪县政府，他们砸开办公室，撬开保险柜，把敌伪文件、档案装进了麻袋里。贺子珍象久饿的人注视粮食一样，饥渴的眼睛惊喜地扑向那散乱地摆在桌上、地上的《民国日报》、《中央日报》和上海、广东、福建、江西的地方报纸。她把它们搜集拢来，捆成一包，扛在肩上，满载而归。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住在一个祠堂里。卸下门板，上面摊了一些稻草作为床铺，用砖垒起两垛小墙，上面搭上一块板作为办公桌。宋裕和、贺子珍扛着两大捆报纸走进祠堂来。毛泽东高兴地迎上前去，接过报纸，迫不及待地打开看了起来，欢喜地说：“你们辛苦了！抢来那么多精神食粮，收获不小哇！”

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做着各种记号。贺子珍趴在稻草堆上，根据毛泽东的记号，把报纸一篇篇剪下来，叠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夹子的封面用毛笔写上标题，方便毛泽东日后查阅。毛泽东从这些抢来的报纸的夹缝中，印证了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敌人实力、动向和企图，与朱德、陈毅等同志商量，下定决心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与尾追之敌刘士毅部打一仗。

著名的大柏地战斗打响了。经过一天的激战，歼灭了刘士毅部的一部分主力，活捉敌团长钟恒以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战场上的硝烟未散，陈毅就爽朗地对毛泽东、朱德说：“痛快！大柏地一役，是红四军下山以后的首次好仗，打出了红四军的军威啊！”

毛泽东在瑞金期间看的报纸，更多的是依靠傅连璋通过秘密交通线送来。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红军到了汀州，傅连璋同志了解到报纸对毛委员比粮食还重要，就以福音医院院长的身份，订了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广东的《工商日报》、《超然报》，派人送给毛委员。红军走了，白军来了，不便公开送，就通过邮局的地下党员秘密送。每隔两三天，傅连璋把这些报纸用旧报纸卷起来，里面夹上一张便条：“毛委员：送上报纸×份。郑爱群。”“郑爱群”是傅连璋为了送报纸方便起的假名。毛委员收到报纸

后，也经常通过秘密交通站给傅连璋写回信。毛委员提起毛笔，在毛边纸上这样写道：“×月×日，报纸收到。这样做很好。毛泽东。”

贺子珍接到这些卷裹着的报纸，小心翼翼地用剪子划开，在床上用手掌熨平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着报，很有感慨地对贺子珍说：“傅医生办事，比共产党员还认真。他办了件大好事啊，我从井冈山到瑞金以来，苦于不能系统地看到报纸，现在解决了。”

毛委员除了从报纸上得到情报之外，有时在上海的党中央也派交通员送文件和情报来。交通员要通过白军的层层封锁，严密盘查，十分危险。传递情报的办法也很巧妙，有时把一部小说拆开来，将文件用药水写在小说扉页的背面，然后再装订起来。送到瑞金之后，贺子珍和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又把小说拆开来，翻折过来涂上药水，文件内容就显露出来了。有时交通员带来一块手帕，或者是一块红绸子，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盘查，送到瑞金，贺子珍用药水一洗，变魔术似的就出来了重要情报。

阅读和整理报纸，提供各种资料，保管文件，担任记录，誊写文稿，照料生活，在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贺子珍就是这样勤奋而细致地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着，战斗着。

十三、正规部队里的游击生活

深夜，闽赣途中的一座残破的祠堂里。

毛泽东、古柏、贺子珍、曾碧漪，四个人埋头在煤油灯

下，紧张地工作着。

一九三〇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回师江西，打下了赣西重镇——吉安，接着向袁水流域推进。

在行军途中，古柏作为总前委秘书长，一直跟随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进止，有事随时碰头，研究解决。古柏的妻子曾碧漪，同贺子珍一起担任总前委秘书，工作在一起，行军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形影不离，亲密无间。

他们几个人组成了正规部队的首脑机关，过的却是游击生活。

行军宿营，随遇而安，条件好时，警卫员分配毛泽东、古柏各一间房子；房间紧张时，两个人就共住一间房子，办公桌挨着办公桌，床挨着床，一天二十四小时随时都可以商量工作。

这一天宿营，总前委机关（实际上就是一个总前委书记，一个秘书长，两个秘书）选择的是一座祠堂。警卫员实在找不到宽裕的房子，就让毛泽东、古柏两人共住一间厢房。厢房面积很小，借了两块门板放在地下，门板上铺了一些稻草，稻草上垫一床单被，地铺中间摆了一张神案，作为共用的办公桌。

鸡啼头遍，战士们已鼾声如雷。毛泽东仍无倦意，他正聚精会神地起草一份作战命令。操劳了一天的古柏，打了一个哈欠，有点熬不住了。毛泽东抬头看着消瘦疲累的古柏，关心地劝他先躺下休息，说明自己要晚一点睡，古柏的工作已做完不必硬陪了。古柏受了风寒，浑身不舒服，也就不讲什么客气，脱衣睡下去了，一会也响起了鼾声。

曾碧漪做完了手头的工作，却在那里发呆，困倦得直揉眼皮，却不好意思和古柏睡在一个被窝里，只得干坐着。

曾碧漪和古柏结婚已经好几年了，总是行军打仗、戎马倥偬，两夫妻没有安静地睡过一夜好觉。古柏是江西寻乌人，曾碧漪是广东南雄人。他们两个人是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市读工业专科学校时认识的。毕业后，他们都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两人志同道合，感情诚笃。曾碧漪自愿跟古柏回江西寻乌开展革命斗争。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经寻乌时，古柏作为寻乌县党的负责人，对红四军的人力物力作了很多支援，贡献很大。毛泽东很欣赏古柏的忠诚和才干，让他夫妻俩一起到总前委工作，组成一个人员少、效率高的首脑机关。

总前委机关这四个人白天行军，晚上工作，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圇觉。古柏因为今夜不舒服，才破例没到半夜就睡了。曾碧漪有心早点睡，可是又不好意思。

贺子珍这时正在替毛泽东整理资料，还没有睡意。她转过脸来，见曾碧漪枯坐在那里，拇指和食指合拢，直抻着眼皮，就柔声说道：“碧漪，你困了，先睡吧！”

曾碧漪抬起头来，央求道：“子珍，你也早点睡，我俩睡一床吧？”

贺子珍还没有反应过来，直截地说：“我还要抄一点东西，等会再睡，你和古柏同志先睡吧。”

曾碧漪勾下头，有点脸红地说：“还是我俩共一床被子吧，让润芝同志和古柏睡一床好了。”

贺子珍这才明白曾碧漪的“潜台词”，啁啁一乐：“哎呀，革命夫妻嘛，还不好意思呀？你脸皮也太嫩了！在战争环境里，还顾得了那许多。”她看了看眼皮底下打鼾的古柏，说道：“亏你还在广州城市见过世面哩，还这么封建呀！”

曾碧漪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贺子珍把曾碧漪拉到一边，逼她脱衣睡觉。

正在她俩拉扯时，一直潜心写作的毛泽东回过头来问：“你们刚才操什么天（聊天）呀？这么热闹？”

贺子珍机智地接口说：“碧漪是嫌我们办公的马灯太亮，刺眼睛，她躺下睡不着。”

毛泽东“噢”了一声，点点头：“可不是嘛，灯光照得象白天一样，怎么睡得着？好，马上想办法！”他站起身来，拿起一张旧报纸，窝成个拱形，遮住马灯的一边，把辐射的灯光拦拢到自己身边。

这样，曾碧漪才在灯罩的阴影里，背着毛泽东脱掉外衣，一钻一钻钻进古柏的被窝里，把被角拉上遮住了脸。

等曾碧漪睡着后，贺子珍小声小气地告诉毛泽东：“刚才碧漪是看你没睡，亮着灯，不好意思和古柏钻一个被窝。”

毛泽东笑了，停住笔说：“噢，原来是这样！老夫老妻嘛，结婚都好几年了，还那么爱面子呀？革命战争环境里就不讲这些了呵！”

贺子珍说：“是嘛，我也这样对她讲。下次叫警卫员在房间里用草席子拦一拦，多少避讳一点，更睡得踏实！”

“对，对，明天记得嘱咐警卫员，下次宿营时，注意这件事情，还是周到点好。”

灯光伴随着古柏夫妇睡了半夜，灯光伴随着毛泽东和贺子珍又熬了一个通宵。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间，毛泽东派古柏和曾碧漪、彭儒到富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检查第一次反“围剿”的地方支援工作。

彭儒是一九二八年四月随朱德、陈毅从湖南上井冈山的，和当时担任井冈山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的陈正人同志结了婚，这时已有身孕。行前，细心的贺子珍嘱咐曾碧漪在路上多多照顾彭儒。曾碧漪说：“没有问题，彭儒走不动了，我就背嘛，保证不会让她吃苦！”

贺子珍听了，满意地说：“这我就放心了，革命同志就是要互相照顾。”她拉着曾碧漪、彭儒的手说：“你们两个人，一个家在广东，一个家在湖南，对富田的情况不了解。富田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家乡呵，那里山清水秀，是一个出人才的好地方，又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山村，我小时候还专门去参观过哩。”

曾碧漪、彭儒听着贺子珍的介绍，越发想早一点赶到富田去。

这天下午，古柏带着曾碧漪、彭儒从宁都小布的红一方面军总部出发，经阳斋、龙岗、东固等崎岖山路，来到了富田，立即同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在办公室研究工作。曾碧漪、彭儒两人在外边整理文件。

傍晚，村前忽然传来一阵喧嚷：“快，包围省苏政府，活捉古柏、曾山！”

不好！曾碧漪、彭儒立即跑进屋去，告诉古柏、曾山：“快走，出事了，有人抓你们来了！”

曾山跳起身来，带着人从屋后山上跑出去了。

古柏来不及上山，便带着曾碧漪、彭儒隐蔽在苏维埃政府门前的一堆大刺蓬里。

不久，一些被“富田事变”激起的不明真相的人，涌到省苏维埃政府办公室，在里面搜查了一遍，一边出门，一边气咻咻地说：“他妈的，晚了一步，古柏、曾山跑掉了，赶

快上后山去追！”

古柏目睹抓他们的人离开省苏政府办公室，便钻出刺蓬，拉着曾、彭两人的手朝门前小河里跑。河水溅湿了衣服，他们向着搜捕的人相反的方向跑。天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在山上低一脚、高一脚转了一晚，转到了兴国边境，一问这里离富田只有五里路，还是是非之地。听说陈毅在兴国，他们连忙向兴国跑去。正好碰到兴国县苏维埃政府钟主席，以为他们三人是坏人，就吩咐警卫战士把他们捆绑起来，送到县苏政府去审问。

古柏说：“要捆就捆我一个人，她们俩位是女同志，不要捆了。”

曾碧漪、彭儒见县苏维埃钟主席要动手捆绑古柏，急得满头大汗地说：“钟主席，古柏同志是前委秘书长，不是坏人，不能捆呀！”

钟主席摇摇头：“你们身上没有证件，口说无凭！”

古柏很镇静：“不要紧，要捆就捆吧，是好同志，捆了还是好同志，不过先给我们搞一顿饭吃，吃饱了把我们送到小布红一方面军总部去。”

钟主席点了点头，他吩咐炊事员给他们做了一顿饭吃，然后派了二十个赤卫队员押送古柏他们到宁都小布。

贺子珍从小布总部走了出来，远远看见古柏被捆着双手，曾碧漪、彭儒两人全身湿透，大吃一惊。她几步迎了上去，给古柏松开绑，说了声：“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转身走进房里去。眨眼工夫，她拿着一叠衣服出来了，他把毛泽东的衣服送给古柏换上，又把自己的衣服送给曾碧漪、彭儒换。

曾碧漪、彭儒知道贺子珍就三套单衣，说什么也不肯接

她的衣服。贺子珍把衣服硬塞进他们手里，着急地说：“还客气做什么，快进屋换去吧，不要冻着了。”

贺子珍又打来几盆热水，让她们洗脸、洗脚。同志的情谊，使她们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刚才被委屈的情绪平伏下来了。

十四、遇 险 化 夷

贺堂山上一片烟尘。敌机在狂轰滥炸，红军战士分散隐蔽在树丛和稻田里。

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蒋介石纠集了三十万军队，亲自督师出马，采取“长驱直入，三路合击”的作战部署，妄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这时，红军刚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不久，连连苦战，还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部队只剩三万余人，而且在福建建宁和江西南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大兵压境，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率领红军回师赣南。红军主力从建宁出发，经宁化、长汀、瑞金、于都，绕道千里，于七月下旬回到赣南西部的兴国集结。

贺子珍随红军总部也来到了兴国和吉安交界处的东固。

东固地势十分险峻，四面环山，中间是一块盆地。东和宁都接壤，南临兴国，北靠吉安、吉水，西面的白云山下就是泰和县。这一带是红军的主要军事区域之一。

正在这个时候，敌军大举进犯，前锋已进逼到中央苏区的兴国、吉安一带，对兴国崇贤、吉安富田、东固等红军

集结地施行了狂轰滥炸。当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三军由兴国经万安向吉安东固、富田挺进时，被敌人发觉，立即派飞机天天跟踪轰炸，给行进中的部队造成重重困难。

一天，当总部和红三军向东固挺进时，几架敌机忽然从云层里钻出来，向红军俯冲扫射，掀起一股股冲天烟尘。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站在一棵树下，沉着地指挥红军分散伏卧在稻田坎下，躲避敌机的扫射。

黄公略看见身边的贺子珍、曾碧漪两个女红军，很为她们的安全着急，乘敌机轰炸的间隙，便让她们到贺堂的山洼里隐蔽。她俩遵命一前一后，弯腰朝贺堂山跑去。

她们正跑着，飞机又俯冲下来，一阵疯狂的扫射，把正在指挥红军隐蔽的黄公略炸死了，一些红军战士也当场牺牲。敌机又掉过头去，朝贺堂山方向俯冲投弹。

炸弹在贺子珍、曾碧漪身后爆炸，巨大的烟浪把她俩冲倒了，全身溅满了泥土、砂石。敌机飞过去了，她们爬起来吐掉嘴里的沙土，撒开腿又朝山顶上跑去。后面的敌机跟踪过来，投弹扫射。贺子珍、曾碧漪已越过山顶，正朝山那边翻下去，烟浪冲击得她们站不稳脚跟，一个斤斗跌下山去，头部、脸部被荆棘、石块划破了，衣服也被撕烂了。她们晕了过去。

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家家户户的屋顶升起了缕缕炊烟。总部机关所在地的气氛显得肃穆而哀切。毛泽东、朱德等总部首长向黄公略的遗体告别后，心情十分沉重。

在向遗体告别的行列中，没有贺子珍和曾碧漪。总部的同志纷纷关切地议论：贺子珍和曾碧漪怎么还不回来呀？莫非出了什么意外吗？赶紧派人去找呀！

天渐渐黑下来了，大家吃过晚饭，正在洗脸、洗脚，准

备上床休息了。古柏走到毛泽东身边，忧虑地说：“子珍、碧漪这么晚还不见回来，一定出了意外，怎么办？”

毛泽东心里也很着急，但说出来的话却很诙谐：“再不回来，我们就要准备开追悼会啰。”接着他声调严肃起来，“古柏同志，这一带情况复杂，她们又是两个女同志，不能不为她们捏把汗呀。赶快派几个侦察员到贺堂山的方向去寻找，一定要把她们找回来。”

古柏点点头：“好，我立即派人去。”

约莫九点多钟，侦察员出发不久，贺子珍和曾碧漪就风尘仆仆地回到总部来了。贺子珍一进屋，迫不及待地向警卫员吴吉清打听：“总部首长安全吗？今天敌机真疯狂呀！”

吴吉清看见贺子珍安全回来了，心里十分高兴，忙说：“毛委员和朱总司令、古柏秘书长都很好，刚才他们还替你们的安全担心，见你们这么晚没有回来，还派人到贺堂山找你们去了哩。”他说完就要跑进厨房去，为她俩准备晚饭。

贺子珍连忙制止：“你别忙，我们在老俵家里吃过了。”她从文件包里拿出几个熟鸡蛋，这是老俵送的，你快送给总部首长们吧。”

吴吉清接过鸡蛋，高兴得跳了起来：“正好今晚总部首长要开军事会，制订作战计划，我正愁深夜没有东西给首长作夜宵呢。贺大姐，你真关心总部首长呵！”

曾碧漪听到这里，插话道：“贺大姐真勇敢，看到敌机过来，一把把我按到在地上，用身体遮住我。我只听到机枪子弹嗖嗖地从我头上飞过，但一块弹片也没有挨着我。亏了贺大姐，要不我就可能见马克思去了。她还掩护了一个砍柴的小姑娘哩！”

贺子珍听了赞扬，脸上挂不住了，用眼睛射射曾碧漪，示意她不要再讲下去了。可是，吴吉清正听得起劲，缠着非要曾大姐讲下去不可。

原来，敌机向贺堂山顶俯冲时，山上有个小姑娘正在砍柴。她看到一只隆隆吼叫的“黑乌鸦”忽然扑过来，飞得那么低，掀起屁股拉了一堆堆黑“屎”，炸得石飞土溅，不知这是什么怪物，吓得大哭大叫。贺子珍发现惊慌失措的小姑娘，连忙跑过去，抱着她躲在一块大石头底下，用身体掩护她。

敌机走后，贺子珍把这个吓昏了的小姑娘送回家。小姑娘的父母千恩万谢，翘起大拇指夸“红军娘娘好”，说什么也要留她俩吃一顿饭。

总部首长为她俩安全担心时，她俩正坐在老俵家香甜地吃着夜饭哩。

总前委会议正在紧张进行，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面对着敌人急风暴雨式的进攻，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决心给敌人一个回击。

会议快要结束时，派去寻找贺子珍、曾碧漪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贺堂山附近都搜索了一遍，没有发现贺、曾两位同志的踪影。

古柏听了心情沉重，久久不语。毛泽东心里也打了个愣，但他不愿意影响战友们的的情绪，于是用轻松的语调说道：“她们不会出事的，敌机又没有长眼睛，他们看不出这两位娘子军的价值来，不会下本钱老撵着她们跑的……”

毛泽东话音未落，吴吉清一阵风地跑进屋来，大声报告：“贺大姐、曾大姐回来了！”说完，把十多个熟鸡蛋朝桌上一放，“这是两位大姐转送给各位首长吃的。”

听说两位女红军安然归来，大家心上的石头落地了，肚子的饿劲上来了，一人拿起一个鸡蛋。“嘀嘀塌塌”磕开皮吃了起来。

这时，贺子珍和曾碧漪走进屋来，跟大家打招呼。

毛泽东吃完鸡蛋，叼起一支烟，十分高兴地说：“你们回来了就好。我们还担心你们见了马克思，正商量着要给你们开追悼会哩。想不到，马克思嫌你们年轻，不肯收，你们不好意思空着手回来，还给我们开会的同志带来了充饥的夜餐。从你们的福气看来，这一仗看来要打赢罗！”

毛泽东一番风趣的话语，说得大家呵呵大笑起来。

十五、让大老粗变“秀才”

革命战争年代，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警卫员、公务员，不少是刚刚丢下犁耙锄头就穿上军装的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半升。多少年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却变成了秀才，舞文弄墨，著书撰文。他们由大老粗变成秀才，可费了贺大姐不少心血。

早在瑞金的时候，毛泽东就很关心警卫战士学文化，但他工作繁忙，不能天天教战士认字。贺子珍便腾出手来教警卫战士吴吉清，勤务员吴光荣、陈金水学文化。

陈金水是一个十六岁的小红军战士，出生在江西省宁都县一个名叫岭脑村的庄子里。他家里很穷，十一岁死去母亲，父亲靠给地主做长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贫穷使他从小感到世道不平，土豪劣绅的欺榨使他怨恨旧社会，陈金水的心里打小时候起就萌生了一颗反抗的种子。

一九二九年二、三月间，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的红四军，在长岭寨打败了闽西土著郭凤鸣旅，缴枪四千余支。这一消息象晴天霹雳，震动了荒僻闭塞的山乡，穷人们竖起了惊喜的耳朵，听到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消息和悦耳的福音：“搭救穷人的队伍来了，名字叫做‘共产党’、‘红军’！”“红军专门杀富济贫，把地主、土豪的金银财宝撒在街上，让穷人自己拣。”

陈金水被“福音”召唤着，他要去找“杀富济贫”的红军。可是，红军在哪里呢？他到处打听。过了不久，从福建长汀回来的小商小贩，绘声绘色地叙述他们在长汀遇见红军的情景，说那里的穷人分了田，老百姓扬眉吐气了。陈金水听得脚板痒痒的。过了年，他就迫不及待地同村里一个姓温的青年，挑选一个漆黑的夜晚，背着家人悄悄地上路了。走了好几天，在长汀一座大石桥上碰见了“扩红队”。他拉住“扩红”队员的袖子不放，一个劲地恳求要把他“扩”进去。他当红军的愿望实现了，分配在红四军副官处当号兵，后又改当勤务员。一九三〇年三月底，他被分配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当勤务员。

陈金水背起背包，喜孜孜地来到长汀南洋毛泽东住处。这是一栋小楼式的木板房，一共两间，一间是卧房，一间是办公室，卧房里放着一张普普通通的木板床，上面铺着一条粗陋的白洋布被单，空荡荡的屋子里没有一件起眼的摆设。陈金水踏进办公室的门槛，看见毛泽东和朱德、张鼎丞、邓子恢在商量事情，贺子珍在一旁低着头作记录。

领陈金水进来的那个同志，指着坐在椅子上的一个长头发的人说：“那个坐着讲话的就是毛委员，坐在旁边作记录的是贺大姐。她就是前委和毛委员的秘书，你以后有不懂的

事，就问贺秘书吧。”

贺子珍站了起来，把陈金水拉到一边，亲切地打量着他。陈金水向贺子珍举手敬了个礼，然后有些拘谨地垂手站立着，不知说什么好。

贺子珍看着新调来的勤务员稚气粗朴的脸膛，很是喜爱，便问：“你多少岁呀？”

“十六岁。”

“家在哪里？”

“江西宁都。”

“噢，是个小老倌。”她笑了，“你上过学堂吗？会写字看报纸吗？”

陈金水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他听贺大姐一口江西腔，口气那么温和亲切，又没有什么架子，原有的拘谨象被一阵风吹走了，胆子放大了，把家里怎么苦，自己一字不识，是个睁眼瞎子等等情形，详详细细跟贺大姐掏了底。

贺子珍拍着陈金水的肩膀说：“小老倌，到了这里可不能当睁眼瞎子啰，我也不会让你当睁眼瞎子，我读过书，认得字，只要你肯学习，我认得的字都可以慢慢教给你。”

从那以后，女秀才和大老粗之间特殊的师生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贺子珍每天都要抽空教警卫员吴吉清和勤务员吴光荣、陈金水学文化。那时候纸张缺乏，贺子珍就以大地当纸，柴棍子当笔，饭前饭后在地上给他们写“吴吉清”、“吴光荣”、“陈金水”几个字，让他们先跟自己的姓名对上号。接着教他们念、写中央苏区编印的识字课本。他们这些拿惯锄头镰刀、长满老茧的手，拿着小棍子倒很吃力，在地上歪歪扭扭地画着斗大的字，怎么看也不象个字样，愈是性急，

愈是写得象散了架的柴堆。刚写出几个字，额上就渗出了汗珠。贺子珍看着这些小战士那副认真而笨拙的可爱模样，微笑着说：“看你们练字那样，比舞犁耙还难啊！”

小战士们拍着满是泥沙的手，不好意思地回答：“贺大姐，写字比栽禾耘田都难，也没打仗痛快！”

贺子珍乐了，蹲下身来耐心地教他们写字，安慰他们说：“万事开头难，开了头后边就顺利了。我在永新开始读书、写字时，也感到不如绣花纳鞋底快，后来练得顺手了，越写越来瘾头。”

“还是打仗瘾头来得快，对大老粗口味，这练字是秀才的事，总感到跟我们缘份浅。”陈金水打了退堂鼓。

贺子珍抬起头来看了陈金水一眼，引导说：“打仗和学文化，跟革命战士都有缘份哩。你们现在每天站岗放哨做勤务，看起来认不认得字不要紧。可是我们革命者肩上的担子重得很，路也长得很，不但要消灭反动派，推翻旧社会，还要建设新社会。没有文化就挑不起这副担子。睁眼瞎子作田还马马虎虎，打仗也凑凑合合，要搞建设可就呀呀乌了。”

小战士们听着眼睛放亮，拾起棍子又在地上描画起来。

他们认得几个字了，读起《工农识字课本》来领会很快。当贺子珍教他们念到“天地间，人最灵”、“工农兵，最聪明”的句子时，他们点头喊“对”。这些原来以为自己很笨的大老粗，得到鼓舞和力量，增强了攻克文化关的信心。贺子珍亲自用废报纸给他们裁成一本一本的写字本，在战斗间隙给他们布置作业，批改作业，打分数，还进行考试，要求很严格。他们进步很快，到长征前夕他们不但摘掉了文盲帽，还可以阅读《红色中华》报。他们后来也成了“秀才”，吴吉清写了《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陈金水（即

陈易奉)写了《跟随毛主席长征》。他们拿起笔杆子写书的时候,就浮现出当年贺大姐手拿小棍在地上教他们练字的情景,仿佛他们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凝聚着大姐的心血。

黄长娇的文化,也是贺子珍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出来的。

黄长娇,江西赣县田村人,从小因家境贫寒,被卖给富户当童养媳。尽管她对人生充满了幻想,可是在饭都吃不饱的日子里,幻想和愿望都变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一九二九年七月,红四军路经赣县,发动群众,解放妇女,她从罪恶的家庭中挣脱出来,投身革命。由于她的出身对他的影响,她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积极,作风泼辣,从村干部很快提拔为县干部,一九三二年担任了江西省总工会女工部长,后调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工农检查部工作。工作职务的升迁,使她感到光靠阶级感情和工作热情不够了,还得有文化。而“文化”却是她的空白。正在她焦躁不安的时候,贺子珍主动上门当教师,给她眼前推开了一扇明亮的窗子。

黄长娇住在沙洲坝的老茶亭,离贺子珍住处仅隔半里。每天晚上,黄长娇来到贺子珍家里,先复习一遍头天教的功课,然后教一课新内容。由于纸张匮乏,她们常常在地上划拉,弄得地面象麻子的脸。黄长娇的文化基础为零,教起来很吃力,但贺子珍天生有耐心,热心肠,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她读、写,并且讲解其中的道理。很快就教会了黄长娇念《工农三字经》,又结合她的工作,教她学习劳动法、土地法、财政法。魄力和干劲本来就有,现在又有了文化,黄长娇如虎添翼,工作得非常出色。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黄长娇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黄长娇如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

目，一直感谢热心肠的贺子珍。

十六、好秘书好管家

“怎样为毛泽东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呢？”作为秘书的贺子珍，心中老是萦绕着这个问题。

有一天，她把警卫员、勤务员找到一起共同商量这件事。

根据当时的环境和毛泽东的习惯，她提出了一个工作计划：一、毛泽东行军骑马看书时，警卫员牵马要注意安全，不要让马惊叫、打闪、狂奔，保证毛泽东骑马看文件、思考问题能全神贯注，不受干扰；二、到了驻地，第一件事不是铺床，而是借好门板，把桌子搭好，然后把文件、书籍、笔墨纸砚，依次摆好，保证毛泽东一进房子就可以办公；三、部队宿营后，除一人保卫毛泽东安全外，其他勤务员到邮政局去买报纸，或到伪县政府找文件、书籍，给毛泽东看，让他了解敌人的动态，为他制定作战计划提供资料。

警卫员、勤务员都夸这个计划细致周到，分头执行，各尽其责，为毛泽东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

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时，由于环境恶劣，战争频繁，途中艰险，许多重要文件、书籍带不走，贺子珍曾向袁文才的爱人谢梅香借了两只洋铁皮箱子，把一些贵重的文件装进箱子里，交给留守井冈山的王佐保管。谁料一年以后，王佐牺牲了，两箱子文件也杳无踪影，贺子珍非常心痛。她接受这个教训，决定重要文件一定要随身携带，部队转移时决不能交给别人保管，就是最亲密的同

志也不保险，因为战争环境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不保险的。为了携带文件方便，她决定给毛泽东缝一个文件挎包。

“没有布怎么办？”勤务员吴光荣、陈金水两眼望着贺子珍，“贺大姐，我们到总务处去领，可以吧？”

贺子珍回答说：“不必了，把我积蓄的两块钱拿去买一丈粗布来。”

她拿出钱来，随即和吴光荣、陈金水到长汀街上布店里剪了一丈灰色土布，回到驻地开始设计缝制起来。

为了牢固起见，贺子珍把布折成两层，折叠缝合，两边按上布扣子，防止文件掉出。布挎包里面分七层，除一层放笔盒、毛笔、铅笔外，其余各层均依次放置地图、文件、纸张、书籍等，行军时搁在马鞍上，要用时随手可以取出。贺子珍设计好以后，利用每天晚饭休息时间，一针一针地缝制起来。经过几个晚上的辛勤劳动，终于把一个长长的挎包缝制好了。

这个文件挎包伴随毛泽东从汀州到长沙，从长沙到吉安，一直用到一九三二年。挎包成了毛泽东的随身办公室。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泽东率红一军团、红五军团一举攻下龙岩、漳州，住在漳州发电厂附近的天主堂的一幢二层楼里，弄到了两个白铁皮箱子，才不用挎包装文件了。

在长期的艰苦环境中，毛泽东养成了晚上用水洗澡擦背的习惯。据说，擦背可以活血舒筋，是一种消除疲劳的好方法。每天擦黑时分，贺子珍总要叫警卫员打好一桶水，放在房门口，用白毛巾盖住，免得弄脏。毛泽东深夜办完公之后，用这桶水擦澡，他喜欢擦背，可是毛巾短，擦不到，贺子珍上前帮他擦，一直擦到身上发红发热为止。擦完澡，睡一会，一天的疲劳消除了，第二天又能精神饱满地投入战

斗。

一九三〇年十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回师江西，一举占领了吉安市，赶走了敌邓英师，使赣西南广大苏区连成一片。

毛泽东由于长途行军作战，天气炎热，大便干燥，便不下来，又吃不下去，身体逐渐清瘦下来，坚持不住了。

贺子珍闻讯特地从吉安陂头红军随营学校，步行四十余里赶到吉安市。她看到离别四个月的毛泽东身体这样瘦弱，心里很难过。她询问了毛泽东大便秘结的原因之后，心情焦急，又不懂卫生知识，她就用手从肛门内把粪便掏出来，这样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她又向红军医务所的医生请教。那时条件差，医院没有灌肠设备，贺子珍就向医师借了个大便通气管。她把日光肥皂放在温水盆里，象磨墨一样在脸盆四周磨来磨去，把它溶解了。然后她请毛泽东伏在床上，用管子插进肛门，把肥皂水灌两碗进去，几分钟后大便随肥皂水出来了。用这种土办法，把毛泽东的便秘治愈了。贺子珍又到老俵家里买来些空心菜和苋菜，炒菜做汤，增加维生素和纤维素。饮食改善了，毛泽东的便秘也好了。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很感动，称赞道：“贺大姐既是毛委员的好秘书，又是炊事员、卫生员、护理员。”

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了，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宁都的黄陂来到吉安东固。贺子珍随毛泽东住在东固熬上村的一家客栈里。贺子珍和勤务员陈金水借了两块门板给毛泽东搭铺，把文房四宝打开来，摆在一张饭桌上，使毛泽东能立即开始办公。

熬上村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一下子来这么多红军，蔬菜供应不上，总部首长每天只能吃芋荷、擦菜、辣椒。时

间长了怎么受得了？

毛泽东每天要干多少事呀？白天爬山视察地形，钻林跨沟，奔波不停。晚上是一个接一个的会，听取汇报，研究制订作战计划，批阅各军、师送来的报告。他整天工作，体力消耗大，营养差，收支不平衡，象灯油越熬越尽，他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头发更长了，颧骨更突了，这可急坏了贺子珍。

贺子珍把警卫员、勤务员召集拢来，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一定要改善毛泽东的生活。大家憋了半天没有好主意，贺子珍不知怎么的想起了田螺，她说：“旱稻蒔下去了，长势很旺，田里的螺一定也长得很肥。我用纱布做两个兜兜，你们找两根竹子破开，搞个圈圈，把兜撑开扎好，到稻田里或田缺口上捞螺丝、捉鱼虾，用辣椒炒炒，可好下饭咧。毛委员是湖南人，喜爱吃这种口味的菜。”

吴吉清、陈金水听了拍手叫好，立即行动，拿着小网兜，提起裤脚，跑下田去了。

不到两个时辰，他们提着沉甸甸的布兜回来了，田螺拣了三四斤，小鱼小虾也网到了两斤多。

贺子珍接过布兜，掂了掂，夸奖说：“嘻，真不少哩。毛委员吃好了，打胜了仗，有你俩一份功劳咧！”

下午，吴吉清跟毛泽东和总部其他首长到白云山去看地形。贺子珍又提醒吴吉清，白云山上竹笋多，顺便攀折几把竹笋回来炒田螺。

“竹笋炒田螺，太有味道了！”吴吉清从贺子珍手中接过布袋子，跟随毛泽东出发了。

“啧啧，味道好，这两样菜真下饭！”晚餐席上，毛泽东赞不绝口。

贺子珍亲手炒了两样名菜：田螺炒竹笋，竹笋炒鱼虾。两样菜都放了干辣椒，味道又鲜又辣。真开胃口。毛泽东吃上劲了，问道：“永新冬酒吃完了吗？”

“还有一点，留着打胜仗以后再喝吧。”贺子珍回答说，“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象样的下酒菜。”

毛泽东把香喷喷的田螺肉送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兴致很高：“唔，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这就算美味佳肴了！”他兴奋地讲着粉碎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作战部署。

贺子珍生怕他的兴头受到影响，赶紧搬出仅存的半瓶永新冬酒，给毛泽东斟满了一杯：“好，提前喝庆功酒吧！”

可真是庆功酒，红一方面军遵照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先打处于蔡廷锴、郭宇华之间而战斗力最弱的王金钰师，在白云山下与敌激战一昼夜，取得了初战大捷，红军乘胜向西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消灭敌人两万多，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十七、瑞金的朝朝暮暮

瑞金，是一座雄秀而壮丽的古山城。白玉带似的锦江绕郭而过，奔流东去。在瑞金城里的东北面有一座红墙围着的秀丽村庄，那就是叶坪。朝西望，青松翠柏掩映之中的大村庄，是沙洲坝。叶坝和沙洲坝，是毛泽东同志先后居住过的地方。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反革命

“围剿”之后，贺子珍跟随毛泽东来到瑞金，度过了三年紧张繁忙的日子。在血与火交铸的斗争岁月里，那是怎样令人难忘的一千个朝朝暮暮啊！

贺子珍当时的正式职务仍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电报、文件、报纸、书信等雪片似的飞来，落在办公桌上，每天堆起一摞。这些材料，大部分贺子珍都得首先过目，然后呈报毛主席处理。有些事务性的事情，她还得协助处理，每天上午眼睛一抹，就一直忙到日头落下，晚上也不能早睡。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叶坪的一座小楼房，伞盖似的巨大的榕树，把楼房遮盖得黝黑一片，只有木格窗棂里透出的嫩黄灯光，显得那么温暖而有生气。灯光展现着屋子的轮廓和陈设，靠近窗前横摆着一张办公桌，桌上坐着一盏煤油马灯、铜墨盒、毛笔、铅笔、还有文件、地图等东西，很整齐地搁置在恰当的位置上。桌子的一边靠着一张用木板搭起来的床，对面摆着一条长板凳，靠墙放着一对煤油桶改制的文件箱。靠近门边临时支起一张行军床，劳累了一天的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挤睡在行军床上已经发出均匀的鼾声。在煤油灯影里，贺子珍坐在床上，背靠着被子还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翻阅材料，不时地侧耳听听窗外的响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办公室兼卧室，就是这样拥挤和简陋。

嚓嚓嚓，传来了草鞋磨擦楼梯的响声。眨眼工夫，一盏手提马灯闪了进来，立时在墙上映出一个高大的身影。刚开完会回来的毛泽东提高马灯，走近行军床，看看毛泽民夫妇睡得安稳不安稳，挤不挤？他看到夫妇俩睡得很香甜，微笑

了，顺手给他们掖了掖被角。

贺子珍从床上站了起来，迎上前去接过马灯，又端来一盆热水，把一双布鞋轻轻地放在脸盆的两边，请毛泽东浸浸脚。然后，她去厨房热了热晚餐留下的饭菜。今天晚餐算是改善生活，南瓜炒青菜，往日餐餐是辣椒炒酸擦菜。有了好菜，她总是舍不得吃，不是给毛泽东留着，就是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吃。难怪毛泽东不止一次夸奖道：子珍有点东西是看不住的，自己舍不得吃，留给我吃，分给大家吃，她有共产主义风格，不自私。

这是艰苦的战争年代，安宁和舒适是与环境不相适应的奢望，战场上不消说，暂时的和平间隙里也要绷紧战争这根弦。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哒哒哒”、“叭叭叭”，一阵枪声，通讯员来通知，敌人忽然偷袭过来了。贺子珍丢下纸笔赶紧收拾东西，把文件、报纸当作宝贝一样地打进被包里，把衣物用品则一古脑儿地送给老百姓。她背起背包赶紧随部队撤退，摸着黑跌跌撞撞地走了一圈又回来了，原来是演习。

毛泽东走进家门一看，空空落落，东西都叫贺子珍送光了，不禁哈哈大笑。贺子珍埋怨毛泽东不告诉她是在演习，空忙一阵，还把东西送光了。毛泽东笑着夸奖说：“把东西送给老百姓，好嘛！”贺子珍也笑了，解开背包，只要文件、报纸在，她心里就踏实了。

毛泽东洗完脚，吃了点晚餐，就坐在板凳上写起文件来。贺子珍卷好一堆喇叭烟，放在桌子角上，然后又开始例行的工作：抄稿。每天晚上，她总是隔着桌子，面对面地陪伴毛泽东工作着，毛泽东工作到鸡啼，她也工作到鸡啼；毛

泽东工作到天亮，她也工作到天亮。

一九三四年初，毛泽东的住址由叶坪搬到沙洲坝。当时红军中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有的同志对贺子珍也有议论，好象她在毛主席身边不算工作，是当家属。争强好胜的贺子珍，坚决要求出来工作。组织上考虑她身体不好，下乡不方便，安排她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她坚持天天上班，晚上又要兼顾毛泽东身边的的工作，每天的工作量更大了，只要有一点空余时间，她还主动帮助做警卫排和通讯员的工作。有些小鬼刚入伍不久，想家哭鼻子，组织纪律性差，她就组织读书班，给他们上政治课，讲革命道理，教他们学文化，把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逐步引上轨道。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苏区猖獗的时候，排斥毛泽东的领导，攻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战术是“游击主义”。干部、群众想不通，警卫战士也有情绪，毛泽东心情不好，有时不禁吹箫解闷。贺子珍心里也很难受，但她克制着，主动去给战士上课，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具体生动地说明毛泽东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武装，由井冈山的几杆枪，发展到现在几千几万杆枪，中央苏区扩大到二十多个县。如果毛泽东搞的是“游击主义”，后果，只能是丢兵弃枪，能取得这样伟大的发展吗？贺子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知道的事情多，平日又不摆架子，平易近人，讲起话来温声细语，打比方，举例子，通俗生动，警卫战士们都很信服他，容易接受她讲的道理。

贺子珍除了兢兢业业做好中央办公厅和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工作外，还主动协助中央苏区政府直属党支部做好群众工作。当时的群众工作主要项目有扩大红军，提倡妇女解放，

反对缠脚，反对包办婚姻等等。支部书记是钱希钧同志。她经常拉着贺子珍一道去做群众工作，因为贺大姐能讲当地话，与老俵谈得拢，群众听她的。

有一天晚上，从隔壁邻居家忽然传来一阵阵女人的哭泣声，悲悲切切。钱希钧她们走过去一了解，原来是这家老太太，正在强迫童养媳跟她的儿子结婚，说死说活童养媳也不肯“拜堂”。酒席尽管办，喇叭尽管吹，童养媳却只是哭。钱希钧把老太太拉到一边，耐心地讲解婚姻自由的政策，开导她停止包办婚姻，好话说了一箩担，老太太听不进几句。

钱希钧赶忙回来搬“救兵”，把贺子珍请了过来。贺子珍拉着老太太的手，用当地土语跟老太太聊起天来，由远及近，由小到大，一句句说进了老太太的心窝里。毕竟还是这位老妇女部长有能耐，居然不大工夫就把这个有些顽固的老太太说通了，不但停止了正在举办的婚事，还答应让童养媳出去工作。这个童养媳得到解放，被安排在印刷厂搞装订工作。

一九六四年，钱希钧到瑞金去访问，还拜望了叶坪这位老太太，有趣的是老太太已经儿孙满堂，儿子后来找到合意的对象，日子过得很甜美。老太太还直感谢那位“娘子”（指贺子珍），如果不是她劝解得好，捆绑的夫妻哪有现在这样和睦的家庭？

当年扩大红军也是很费唇舌的工作。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党中央提出“扩大一百万铁红军”的口号，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江西壮丁少、土地多、劳力差，中央根据地建立几年，大多数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战争残酷，牺牲的人很多。所以，一讲起扩大红军，群众嘴巴上都拥护，搞到

末了要他家出人时，就皱起眉头不吭声了。这也不能责怪他们落后，因为分来的地要劳力耕种，独子要传宗接代，都关系到切身利益嘛。钱希钧她们做扩红工作，每逢遇到做不通的对象，就把贺子珍请了去。贺子珍有她的路数，大道理也讲，但更多的是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入手进行开导，说明分来的土地要努力种不假，但如果不扩大红军，不粉碎敌人的进攻，让敌人打回来，连土地都抢回去了，还谈得上什么耕种？她如此这般一分析，群众听了觉得实在，也就“送子、送郎”上前线去了。

本职工作和社会工作把贺子珍忙得两脚朝天，只有礼拜六下午才有点喘息时间。中央机关开展共产主义礼拜六活动之后，连这点休息时间也挤掉了。贺子珍象上紧的发条一刻不停地走着，连洗油的时间都没有了。

“共产主义礼拜六”是列宁提出的口号，苏区也风行一时。中央临时政府的工作人员在礼拜六这一天，要为所在地的农民干义务农活。

当时，贺子珍跟随毛泽东驻在瑞金叶坪村。叶坪，地多人少。土地革命后，这个村子的农民分到了土地，革命的热情高涨，为了保卫穷人自己的政府，他们在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男子参了军，因而劳力很紧张。每逢礼拜六，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的同志来到田间，同妇女老幼一块种田。农民老俵都夸这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的事。

在一次抗旱劳动中，毛泽东亲自车水灌田。由于他一心打听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形，注意力分散，不慎被水车叶片碰伤了脚。贺子珍心里一扑腾，连忙上前为他轻轻地揉擦伤口，用烟油在伤口上涂抹消毒，把他扶到田塍口坐好。然后

她轻盈地踩起水车来，叶片在她有节奏的踩动下飞快地旋转，渠水哗哗地流进旱田。农民们惊异地看着她熟练的动作，翘起大拇指夸她是种田里手。

同贺子珍一块度过礼拜六，是妇女们非常愉快的事情。这一天，贺子珍、钱希钧、贺怡三妯娌同农民老俵一样带着饭包，带上农具，踏着灰蒙蒙的晨光来到田里。她们挽起裤腿，跟俵嫂们比赛起来。贺子珍很活跃，用不熟练的瑞金话逗得妇女们咯咯大笑。休息时，她和大家一起吃蓆包饭，她非常乐意和俵嫂换菜吃，田塍一蹲你夹我的菜，我夹你的菜，夹来夹去都是芋荷擦菜，但心里却比吃了鸡鸭鱼肉还香甜。

贺子珍在瑞金的朝朝夕夕，既艰苦又火红，既疲累又甜蜜，她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样重要而有意义的生活。

十八、调 查 研 究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党中央之后排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和一九三二年八月的宁都会议上，先后夺了毛泽东同志的党权和军权。他被迫只管地方工作，有一段处于养病赋闲的境遇。

毛泽东的精力和兴趣转到政府和经济工作方面，为了摸清情况，总结经验，指导苏维埃运动，他于一九三三年十月间请了兴国长冈乡一些乡、村苏维埃干部来沙洲坝开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他系统地了解了长冈乡的扩红、训练、防空、消费、选举、合作社、文化教育、识字、优抚、农业、森林以及群众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用得到的实际材料来批判王明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不从实际出发的唯心估量。

后来写成一篇《长冈乡调查》，登载在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杂志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也凝集了贺子珍不少心血。

那时候，贺子珍仍在毛泽东身边做机要秘书工作。她看见毛泽东请来的客人从大路上走来了，忙着迎出门去，热情谦和地把他们请进屋来。她和警卫员吴吉清一起，端出板凳和椅子，请他们坐下，又是倒水，又是递烟，殷勤地招待下面来的同志。贺子珍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并协助毛泽东记录着每一个人的谈话内容，认真询问人名、地名和具体数字，然后，一项一项细心地整理好，送给毛泽东作为素材。当长冈乡苏维埃主席汇报办社经过时，贺子珍也忍不住插嘴问了一些情况，因为她在《红色中华》报上曾看到介绍这个模范消费合作社的报道，对这个合作社的事迹印象很深。她问得更多的是妇女工作和扩大红军的情况。因为她在永新和瑞金都用很大的精力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对妇女解放的状况既熟悉又关心。座谈会接连开了几天，每天都开到很晚，贺子珍一直陪着毛泽东，手不停地记录着，眼睛都熬红了，手也记酸了。毛泽东劝她先休息，她不肯，总是要等会议开完，把记录整理好，毛泽东休息了，她才休息。

这一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又亲自到长冈乡作实地考察，将在沙洲坝召开的座谈会上整理的材料，进行了校对。贺子珍因为有孩子牵累，又要代毛泽东签收文件，没有随同前往长冈乡。毛泽东从长冈乡带回来大量笔记，她就帮助整理、归类。毛泽东写成《长冈乡调查》草稿，她又一页一页誊写清楚，送给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杂志连续发表了。一九三四年一月，印成小册子，发给参加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长冈乡苏维埃干部介绍的经验和毛泽东在会议上作的结论，推动了中央根据

地各县、区、乡的工作。

在毛泽东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贺子珍的贡献不仅是作记录和整理材料，她也常抽空作些实地调查，提供一些情况和见解。对于调查研究她并不陌生，早在井冈山时期她就随同毛泽东到永新塘边村，认真地从事过调查研究工作，而且颇有成效。

土地革命，是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之一。打土豪分田地，是一项细致复杂的工作。为了开好分田会议，毛泽东动员红军指战员分头深入每一个乡村去作调查，他本人也在永新的夏幽蹲点。贺子珍带着三、四个人的工作组，曾到好几个村子进行调查，她是永新人，会讲“咕啦”

（永新土语“什么”的意思）话，又平易近人，跟妇幼老少，都拉得起家常，所以调查起来方便得很。分田分地，分山分水，学问大得很。开始分田很乱，有的按自然村分，有的按家族姓氏分，有的按山岭划分，引起很多的纠纷和矛盾。政策也很左，曾搞过“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中央批评这样分田没有阶级观点，也不符合土地革命政策。贺子珍下去调查，向老农请教，帮农民量地写分田牌，跟老少座谈，掌握了很多真实材料。这些材料不但提供给毛泽东参考，还提供给何长工参考。何长工经过三个月调查，写出了“分田须知”、“挖窑须知”两个小册子，对怎样分田，怎样解决山林水利纠纷，作了明确合理的规定，写这两本小册子之前，何长工向贺子珍请教了几天几夜。

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召开了分田会议，重新制定了分田政策条文，使土地革命顺利进行。毛泽东感叹地对贺子珍说：“子珍，我们都是书呆子，如果不请教老农民，分田没门！调查工作，你出了不少力啊！”

十九、母子挖井

瑞金沙洲坝的红井旁，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饮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委员。”当时的挖井人中，也有红军战士贺子珍。红井里的幸福水，渗透着毛泽东的汗水，也掺和了贺子珍和其他老红军战士的汗水。

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旬，由于敌机疯狂轰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从叶坪搬到了沙洲坝。沙洲坝是一个严重缺水，十分干旱的地方。毛泽东和贺子珍刚住下来，便听到一首民谣：“有女莫嫁沙洲坝，有河无水洗被帕。”说的是河里存不住水，天一晴，河床露底，没有水喝，也没有水洗衣被。

贺子珍听了这首民谣，蹙紧了眉头。没有水洗衣服还不要紧，没有水喝可怎么行呢？她想了想，对警卫员吴吉清说：“你先到村子四周瞧一瞧，看看有没有水井，赶快挑一担来，烧一壶水给毛委员泡杯茶喝。”

“好，我就去。”吴吉清向隔壁的杨大嫂借了一担水桶就出发了。他挑着一担空桶，左瞄右瞧，走遍了村内村外，也没有发现一口水井，只好扫兴地走回来。他想，毛委员日夜为革命大事操劳，够辛苦的了，搬到这个鬼地方连口水井都没有，挑不到井水心里多过意不去。他垂头丧气地挑着一担空桶返回来，向邻居杨大嫂打听哪里还能找到水。

杨大嫂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妇女，她丈夫是红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经瑞金时参的军，如今在红军一方面军一军团第四军当排长，正在前方作战。她身边只有一个

两岁的小孩名叫杨石发生子，后来毛泽东给取名叫“大毛”。母子两人经常得到政府的慰问和救济，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当她听到毛委员的警卫员挑不到水时，也挺着急，没有别的招待毛委员，连口水也喝不着，不是太亏待恩人了吗？她便抱着孩子热情地把吴吉清领到村口大樟树附近的水塘旁边，指着伸向塘里的半截木桥说：“红军同志哥，水有的是呀！你就站在这木桥上，把桶放到塘里去舀吧！不要紧的，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喝这口塘里的水。”

吴吉清看见塘里的水很浑浊，塘岸边石墩上有不少妇女在那里捶衣服、洗菜。塘中间有两条水牛在那儿呼哧呼哧地洗澡。塘坎上边还有一座土砖砌的厕所，这样的水怎能挑给毛委员吃呢？吴吉清又只好无精打采地挑一担空桶回来，向毛委员、贺子珍一五一十地作了叙述。

贺子珍听罢，放下怀里抱着的小毛，连忙同吴吉清一道走出房门，来到村口塘边。她看塘水不仅浑浊，而且还有沙虫，便问杨大嫂：“杨大嫂，村子里再没有别的水井了吗？塘里的水这么脏，吃不得的！”

杨大嫂有点难为情地回答：“塘水是脏，可是村子里没有一口水井，没有办法！”

贺子珍耐心地跟杨大嫂解释：“吃水和用水要分开，吃了沙虫会得病的！”说完，她转头同警卫员去找干净水。他们走了很远的路，在石头缝里才找到一点干净的水，挑回来给毛泽东烧茶吃，并把村子里的群众吃不到干净水的情形，详细地告诉了毛泽东。

过了几天，毛泽东抽点空闲，便和贺子珍领着总务厅的同志和警卫员，沿着沙洲坝河步行而上，去找水塘。他们一

直寻到离村子四、五里远的鹅公岭山腰上，才找到一股山泉。看着汨汨冒着的山泉，贺子珍十分高兴，舀了一壶清甜的泉水回来，烧开了，沏了一杯浓浓的茶，送给毛泽东喝。毛泽东一边喝着茶，一边说：“好，水有味！要想办法把这股泉水引下山来，让大家都能喝到它。”

他们一起商量了一个办法。于是，第二天，毛泽东便发动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到山上去砍毛竹。贺子珍手拿柴刀，跟大家一起，从十几里远的山上砍回毛竹，打通竹节，一根一根连接起来，一头接住山泉，一头接在屋后大树下的大木桶里。泉水清冽冽地流过来，激起一小朵一小朵雪白的浪花，经过大木桶里的木炭、沙石过滤，清澈的山涧泉水又注入下面的另一个木桶内。

贺子珍高兴得满脸春风，挨家挨户告诉群众：“老倭倭嫂，泉水下山了，大家来挑去吃吧，再莫喝塘里的水罗！”

群众听到这消息，个个笑逐颜开，挑着水桶出来了，从大桶里舀满一担山泉水挑回家去。这样，一百多群众和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人员的吃水、用水困难，暂时得到解决。

但是泉眼太小，一到冬天雨量减小，水源枯竭，水涧里的泉水也越来越少，不能满足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和沙洲坝群众的需要，吃水又一天一天地紧张起来。有的群众没办法，又只好到塘里去挑脏水吃。

吃水问题，又在毛泽东脑子里转了起来，有一天晚饭后，毛泽东抱着他心爱的孩子小毛，和贺子珍坐在门前大树底下休息。他叫警卫员把沙洲坝耕田队长杨大爷和村代表请来，用商量的口气问大家，能不能在村子附近打水井。

“好啊！我们早就盼望能挖口井，就是没有钱，没有人敢牵头哇。”大家一听挖水井，喜出望外，异口同声地说：

“过去土豪劣绅骑在人民头上，压迫剥削我们，大家连饭都吃不上，挖井的事想也不敢想，只有吃塘里脏水，连命都难保得，还顾得病不病。”

毛泽东鼓励大家说：“今天共产党来了，打倒了土豪劣绅，穷人当家作了主人，过去办不到的事情，今天就要办到它。挖口井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大家齐心合力，不要说挖口水井，就是村后的鹅公嶺也能移走啊！”

毛泽东说完，贺子珍又补充一句：“人心齐，泰山移嘛！”

大家点头称是，挖井的事就这样决定了。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叫警卫员把乡、村干部和农民代表请来，一起选择挖井地点。地点就选择在沙洲坝列宁小学前面，离毛泽东、贺子珍的住处只有三、四百米。地点确定之后，毛泽东挽起衣袖和裤腿，从耕田队长手中接过锄头，在地上划了一个圆圈，问大家井圈这么大小行不行？

“好，好！不大不小，这样正好。”杨大爷笑着称赞道。

毛泽东解开衣扣，敞开衣襟，举起锄头带头挖起来。老俵、红军战士和临时中央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挖的挖，铲的铲，挑的挑，干得热火朝天。

贺子珍带着天真活泼的小毛，在一旁捡砖，拾鹅卵石砌井墙。小毛和大毛一边捡，一边打闹着，在大人们中间钻来钻去，拿着他们挑来的五彩斑斓的鹅卵石，在人们面前炫耀着，把大人们逗得哈哈大笑。毛泽东有时也停下锄头，有趣地望着这两个小孩嬉闹。

砌井墙的鹅卵石，还有小毛捡的哩。

毛泽东挖了一阵子，汗水把衬衫都湿透了，紧贴在脊

梁背上。在一旁低头弯腰捡砖的贺子珍抬头发现后，连忙心疼地给毛泽东递上湿毛巾揩汗。

当井身挖到两丈多深，喷出大股泉水来时，大家看着银柱似的泉水，高兴得张开嘴巴伸过去喝，喝口甜泉水，更加奋力干了。毛泽东也很高兴，他不顾头天晚上发一夜的高烧，带病下到井底，同红军战士、机关干部一起铺沙子，垫木炭，搞过滤设施。警卫员劝毛泽东不要下到井底去，毛泽东哪里肯听，坐进箩筐里就滑到了井底，吴吉清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抬头一看，忽然看见小毛、大毛在河滩上追逐嬉闹，他连忙跑过去，找到正在俯身捡鹅卵石的贺子珍，告诉她毛泽东带病下井的情况。

贺子珍也很着急，昨天晚上毛泽东发高烧，她一夜没睡，给他端水喝，敷冷毛巾，喂药，本希望他多休息会，早点退烧，没想到她前脚刚出门，他后脚就到了井口，如今又下到了阴凉的井底，再着凉了，烧又上去怎么办？她望了望井口，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对着警卫员的耳朵如此这般低声说了几句。警卫员连连点头，飞快地跑进毛泽东的办公室。不一会，毛泽东的秘书匆匆地走近井旁，叫毛泽东去接“紧急电话”，这才把他从井底叫了上来。

毛泽东大步走进办公室，贺子珍正在那里等着他，给他打好水，让毛泽东擦汗洗脸。毛泽东问秘书谁来的电话，贺子珍笑着接过去说：“我打的！”她见毛泽东不解地望着她，又解释说：“没有什么电话，是警卫员怕你身体不好，跑来向我说，我们一起想了这个催你出井的办法！”

毛泽东一边擦着脸，一边笑着说：“你们合伙谎报军情呀！”他收敛了笑容，略带几分责备地说，“你们要我上来的心意是好的，但在这关键时刻，我怎么休息得安落呢？”

说完，他又朝井口走去。

挖了几夭，一口两丈多深的井终于挖成了。井身全部用鹅卵石砌得整齐结实，两边用三合土粉得很平，井上面用了几块大青石板垫脚，又简便又美观。

井水清澈甜美，人们欢呼着，急着要喝口红井水。老长工杨家注手端一碗井水，喝一口，望一眼毛泽东，喝一口望一眼贺子珍，激动地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毛委员呀，您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牵着小毛手的贺子珍，喝了一口红井水，笑着说：“以后恐怕有女争嫁沙洲坝，不愁没水喝，不愁没水洗被帕罗！”

说完，簇拥在红井旁周围的老倭、倭嫂都哈哈笑了，毛泽东、贺子珍也呵呵笑了。这畅快的笑声，恐怕今天沙洲坝的老人也还记得吧！

二十、长汀漫步

一九三二年八月，毛泽东同志从南城前线被通知回宁都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在宁都会议上，一些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较深的同志，肆意指责毛泽东右倾，要毛泽东交出军权。会上，王稼祥等同志曾持反对态度，但由于多数人坚持，毛泽东同志被解除了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回瑞金叶坪专门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工作了。

毛泽东离开宁都前夕，对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说，前线需要我回来，打个电话给我，我就立即回来，指挥战斗。毛泽东同志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心事重重地离开了前

线，离开了宁都，去瑞金稍事休息之后，经叶坪、古城，翻过牛岭寨的牛岭，到长汀县红军医院附属医院养病来了。

附属医院设在一座大庙里，设备是很简陋的。正好这时贺子珍在长汀辛耕别墅医院生孩子。贺子珍住的地方离毛泽东养病的大庙有一段路，白天她抱着孩子小毛来看望毛泽东，帮毛泽东搞一些吃的，晚上又抱着孩子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贺子珍考虑来往路远，照顾毛泽东不方便，向领导请示同意后，带着孩子小毛一起搬到大庙里，和毛泽东住在一起。毛泽东看到小毛长得天真活泼可爱，一种失意的心情顿时而消，脸上出现了愉快的笑容。设在大庙的附属医院条件较差，十个人住一个房间，生活没人管，买青菜、豆腐没有钱，生活很艰苦。贺子珍只好把自己生孩子的一份营养品，如猪肝、鸡蛋、猪下水等，煮好之后送给毛泽东吃，以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另外，贺子珍认得邓子恢，通过他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要一点东西给毛泽东吃，也解决了一些困难。凡此种种，贺子珍对邓子恢，对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都表示了感激之情。

供给部门知道毛泽东被撤了职，不管事了，这次是到后方来休息的。所以毛泽东的勤务员们去总务处领东西受到冷遇，供给标准也降低了，引起了勤务员们的极端不满，甚至和总务处的同志顶撞起来。贺子珍发现后，连忙制止勤务员的吵架行为，并叫他们到毛泽东那里千万不要嚷出来，以免惊动毛泽东，引起他的不快，干扰他看书思考大事。“以后遇到什么事情直接找我好了，由我出面联系解决，懂吗？”

勤务员怪不好意思地说：“你刚生完小孩，正在坐月子，身体又不好，我们过意不去。”

贺子珍严肃地说：“我的身体不要紧。毛委员的身体更

要紧。他要考虑的大事情很多，我们要尽一切办法使他身体好，所以不要和总务处的同志吵，不要干扰他，再重复一遍，以后有事找我好了。”

勤务员吴光荣、陈昌奉听了连连说：“贺大姐，你说的对，我们不吵，不让毛委员知道这种不合理的事，一定保证毛委员休息好。不过，总务处有人这样做实在不象样子。”

贺子珍说：“好，等下我向总务处反映去。”贺子珍说罢便找到了总务处副处长傅公侠，说明了事情经过情况，提出按以前的供给标准领东西。傅处长表示同意，并对有关同志作了交代，贺子珍才高兴地回来了。

贺子珍回来对勤务员吴光荣、陈昌奉说：“这事已经解决，总务处傅处长已答应按照供应标准给泽东发东西，你们下次领就方便多了，千万不要发牢骚，不要影响毛委员的情绪。”

勤务员回答说：“我们一定尊重贺大姐的意见。不过总务处有人再狗眼看人，就不要怪我们提意见了。”

贺子珍听了告诉勤务员，当前国民党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物资是比较紧张的，对总务处的困难要体谅，我们尽可能自己动手，上山打点野味，下河捞点小鱼，给毛泽东改善一下生活，使他尽快地恢复健康。贺子珍语调更为诚恳地说，“毛委员在后方休息，心情不好，你们的勤务工作更要做好一些，千万不要惹他生气。”

勤务员吴光荣、陈昌奉两人准备了两支鸟铳上山打野鸡、斑鸠。树林较密，目标不好选择，虽然打到了几只，吴光荣的一个手指头却被打断了，疼得要命。后来他们又到汀州河捞到好几条鱼。贺子珍亲自动手红烧给毛泽东吃。贺子珍和傅连璋的女婿陈炳辉关系很好，她还从陈炳辉家里弄

到了一些福建冬酒和豆腐干，这样才逐步改善了毛泽东的生活。

毛泽东被撤掉军职后，心情不愉快，整天躺在病房里看书。一间病房住十个人，有的病号患的是肺病。贺子珍发现这种情况，便对毛泽东说：“到外面走走吧，散散心嘛，不要老闷在房子里看书。再说他们有些病号是肺病，接触多了也易感染呵！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多好啊！”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籍，高兴地同贺子珍一起出来，沿着汀州河畔散步。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从宁冈河畔散步开始，后来发展到东固熬上茶林散步，在宁都黄陂木梓树底下散步，回忆过去的事，真是有趣得很呵。”

贺子珍望了一眼毛泽东，回忆起在宁都县小布河畔散步时，教小孩做“打老蒋”的游戏，逗得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深情地对着贺子珍说：“对，对，对，我还记起了我们两人拣薄石片往河里削的事哩。”

贺子珍说：“对，你的力气大，一挥手把薄石片向河中削去，水面上立即漾了许多弧形的圈圈，圈圈由小而大伸向彼岸，好看极了。我却没有你的力气大，薄石片削不远，弧形圈圈不多，伸不到彼岸。”贺子珍兴致勃勃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贺子珍说：“润芝，你当时还问我：子弹，为什么打得远？主要是冲击力大，你削得不远，弧形圈圈少，主要是你的冲击力不足，平时缺少锻炼之故呵。”贺子珍讲到这里，引得毛泽东哈哈大笑。这时毛泽东心情舒畅，脸上的愁云顿时消失。

贺子珍就是这样体贴毛泽东，把散步当成休息，当成消除苦恼的良药。从井冈山到茅坪——瑞金，从东固——黄陂——小布——长汀，几年来，她和毛泽东在傍晚时分总是肩

并肩地散着步，走了一程又一程，给毛泽东减轻了疲劳，减少了烦恼，获得不少安慰。

在毛泽东心情好一些的时候，贺子珍就陪同他到汀州市街上找工会、商会、农会干部作调查，了解汀州市各项工作情况，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这就是以后毛泽东撰写《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基础。

二十一、母子离情

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广昌失守之后，中央苏区的形势一天紧似一天。敌机向沙洲坝一带狂轰滥炸。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沙洲坝，已无法办公，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机关搬到瑞金以西的梅坑云石山上一座寺庙里居住，贺子珍携带爱子小毛随同前往。毛泽东在云石山的庙里办了几天公，党中央便派他到于都县指导赣南省委的工作。临行前的一个早晨，贺子珍为毛泽东准备了随身穿的衣服和有关文件，还准备了一点途中吃的东西。吃过早饭之后，她抱着小毛给毛泽东送行。她沿着云石山青枝绿叶掩映着的羊肠小道，一步一步地走下山来，边走边殷殷嘱咐毛泽东要注意身体，夜晚办公不要熬得太晚。毛泽东点着头，深情地笑了笑。到了大路上，毛泽东亲了亲小毛，往脑后掠了掠浓黑的长头发，向贺子珍道了声“保重”，便疾速地跃身上马。

小毛从贺子珍手里挣脱出来，撒开腿撵了上去，嫩声嫩气地叫道：“爸爸，你慢点走，带我一起骑马走，我要跟爸爸一块走！”

坐在马背上的毛泽东回首一望，见小毛跑来了，急忙勒

住缰绳，停下来亲切地凝望着心爱的小宝贝。贺子珍连忙抱起小毛，送到毛泽东怀里，毛泽东抱着小毛在马背上坐了一会，耐心地哄着：“爸爸到好远的地方去，那里有任务，过几天我就会回来的，乖乖，听话噢？”毛泽东吻了吻小毛的脸蛋，然后让贺子珍把小毛接过去，又嘱咐了几句，便同警卫员吴吉清等同志扬鞭跃马走了。

贺子珍赶紧叫小毛向毛泽东摆手再见。小毛摆着肥胖的小手，大声说道：“爸爸再见！”毛泽东再次回头说声再见，便掉过头去策马奔驰起来。马渐渐的远去了，拐了一个弯，消失在视线之外了。贺子珍牵着小毛返回了云石山。

不到半个月，吴吉清从于都返回瑞金梅坑，专程为毛泽东给博古送信。送完信，又特地到云石山看望了贺子珍和小毛，告诉她毛泽东同志在于都患了恶性疟疾，高烧到四十一度，幸亏傅连璋院长赶到于都给治好了，现在饮食正常。可是，毛泽东病一好，就忙着工作，一干起来又是通宵达旦不休息。贺子珍听后埋怨地说：“他就是这个脾气，工作起来就忘了自己，从来不考虑自己的身体。”贺子珍关切地对吴吉清说，“你在他身边，要多多提醒他，晚上不要熬得太晚了，要劝他注意休息。”这时，正好贺子珍接到了毛泽东的信，通知她到于都去。贺子珍看完便高兴地回屋准备去了。

不久，贺子珍听了福建清流、连城失守的消息，接着敌人又以三个纵队向宁都、石城进逼，情况十分严重。可是左倾机会主义者还不采取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有效措施，仍旧单纯地命令红一军团在东线闽西抵抗，红三军团在西线抵抗，红五军团在广昌、宁都之间设防，红八军团在兴国古龙岗抵抗，与进逼的敌人展开“短促突击”、“节节

抗击”。敌人兵多武器精，我军伤亡日渐增加，不几天宁都、石城、广昌相继失守，瑞金更加吃紧了。贺子珍带着小毛在云石山，毛泽东又不在身边，心里十分焦急。她收拾行装正要带着小毛到于都去找毛泽东，可是情况骤然起了变化。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中央作出决定，全军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博古等同志为中央一队，王稼祥等同志为中央二队，毛泽东等同志出发时为中央三队，分别从瑞金、于都出发。红军和中央政府系统设立了两个司令部：红军系统属于“红星司令部”（简称“红星”），指挥作战；政府系统属于“红章司令部”（简称“红章”）。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同志随“红星”一起行进。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贺子珍忽然接到通知，要她上午九点赶到九堡集中开会。会上由罗迈同志作报告，讲了五次反“围剿”的情况，说到红军主力马上要离开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决定把中央机关的女同志挑出来，参加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担任工作组员或政治战士，随军转涉，任务是了解敌情，扩大红军，筹粮筹款，寻找和巩固伕子，照料伤病员和老同志。当时挑选了三十个女同志，条件还很严格，一要身体好，能跑路；二要有点文化，能独立工作；三要党员，能做政治思想工作。贺子珍虽因怀孕，身体虚弱，也分配到干部休养连，与二十多个女红军和中央的老同志一道前进。

上午九点开会，第二天下午三点就要出发，时间紧迫，贺子珍要做的工作却有一大堆。她要清理和销毁文件，携带书籍和文稿，准备干粮，帮助老同志和伤病员作好行军准备。这一切她都手脚麻利地做好了，现在她坐下来，稳一稳

神，等待毛泽覃、贺怡的到来，商量安置一直在身边跳来蹦去的小毛和年迈的爸爸、妈妈。她昨天就接到要大撤退的通知，思忖了许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克制住了人皆有之的儿女之情，决定在瑞金辞母托子。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和自己的胞妹贺怡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为了轻装前进，减轻毛泽东的负担，她决定把年迈的爸爸、妈妈和自己的孩子小毛委托给毛泽覃、贺怡二人照管。这时，毛泽覃担任独立师师长，正要带部队撤到武夷山下去隐蔽集结，准备与进攻瑞金的敌人进行浴血奋战。

毛泽覃和贺怡接到贺子珍带去的口信，连夜骑马，风驰电掣地从沙洲坝赶到了云石山。

贺子珍见他们俩来后，来不及寒暄就心情沉重地说：“润芝来信了，他在于都等着我，叫我赶快到于都去找他。部队要撤退，情况很严重。”贺子珍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十分不舍地说：“爸爸、妈妈和小毛我带不动了，就委托泽覃弟、贺怡妹你们二人了，我走后，你们要多照顾二老一小，日后我们胜利归来再见面。”贺子珍哽咽了，眼泪刷刷地流了出来。

“珍嫂，您到于都见到我哥哥时，告诉他，家中一切大小之事，我作为弟弟的一定尽力照顾，请他放心。”毛泽覃这时还不到三十岁，身体魁梧，气宇轩昂，是一位有勇有智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办事一贯热情、慎重、老练。贺子珍听了他的话也就放心了。不过她转眼看到贺怡的身子也不灵便，便关心地问：“怡妹，身孕几个月了？在山区打游击跑来跑去怕不方便吧？”

贺怡含羞地说：“珍姐，我已有喜半年了，这几个月在

农村做扩大红军的宣传工作，整天一道山、一道沟、挨村串户地跑来跑去，也没把它当回事，我看不要紧吧。听说组织上已替我作了安排，你就放心吧，见到姐夫替我问个好，请他多保重！”说完抱起小毛亲了亲。

毛泽覃接着说：“珍嫂，昨天我向中央分局和中央办事处的负责人陈毅同志如实反映了这个问题。陈毅同志讲，已和有关同志研究了，决定派贺怡到赣县去当县委副书记，那里是个半红半白的区域，容易长期隐蔽下来，形势好一些就开展革命活动，形势紧张时就隐蔽。陈毅同志还说，瑞金是赤色首都，目标大，清剿严，敌人疯狂吼叫什么到瑞金后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所以留在瑞金是不合适的。党组织考虑得十分周到，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中央苦力委员会的委员长王中仁同志不随军走了，改回原籍赣县当县委书记，他是本地人，情况熟悉，语言又方便，为了更好地坚持斗争，经过我们商量，在途中贺怡可和王中仁装扮成夫妻，反正王中仁在家乡没结过婚，他们俩人回赣县老家，村里人不会怀疑的。这个主意是刘伯坚同志出的，他对我们一家很关心。因为他和王中仁同是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一起开过会，两人很熟悉，他动员王中仁留在中央苏区，改由苦力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随部队出发。现在一切问题都安排好了，他们准备坐船到于都，再由于都坐船到赣州，到了赣县湖边后，就把爸爸、妈妈和小安毛顿在王中仁家里居住，我就一心去武夷山区和敌人周旋去。”

贺子珍听了毛泽覃的话，宽心多了，又思忖了一会，毅然决然地说：“泽覃弟，怡妹，组织上安排得很周到，就这么办吧！小毛就交给你们了，后会有期。”贺子珍说到这里

把小毛抱起来吻了吻，然后双手送给贺怡，声音有些低沉地说：“小毛，妈妈马上要到于都去，乖乖，你就跟着婶婶玩吧！”

贺子珍心里很不好受。小毛是在战火中诞生的。一九三二年春夏，贺子珍住进了福音医院。不久她生了一个男孩，是傅连璋接的生。傅连璋把喜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兴冲冲地跑到医院去看望，看着襁褓中的小娃娃，非常喜爱，便取名毛毛。如今，小毛已经三岁了，长得很天真、聪明、活泼，毛泽东最喜欢他。在沙洲坝居住的日子里，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经常到中央苏区各省、各县去检查工作，每逢回到瑞金时，贺子珍总要领着小毛在门前樟树下面迎接他。小毛眼睛尖，打老远就看见爸爸骑在马背上朝大樟树驰来，他欢乐起来，“伊伊呀呀”地叫着从贺子珍怀里挣脱出来，象小鸟一样飞出去。毛泽东看见小毛跑来了，连忙翻身下马，俯下身子，张着两只臂膊迎接爱子。小毛一下子扑到他怀里，亲昵地叫着“爸爸”，同时把小脸贴过去，毛泽东高兴地把小毛抱紧，在他苹果似的小脸蛋上亲了又亲，然后高举起来，赞赏地看着贺子珍用她的旧灰色军装给小毛改的小军装，和缀有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的八角军帽，大声逗着：“看，我们勇敢的小红军！”接着把小毛放下来，一边和贺子珍愉快地谈话，问寒问暖，一边每人拉着小毛的一只手，慢慢地朝屋里走去。

下午，毛泽东办公累了，就把小毛叫过来，教他写字，还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在院子里奔跑。吃过晚饭，他和贺子珍两人领着小毛到门口散步，看看水井，坐在大樟树底下的石凳上，给小毛画些小人像或讲点有趣的故事，逗得小毛摇头晃脑、鼓掌、拍手，张开小嘴咯咯地大笑。小毛笑，

毛泽东和贺子珍也笑，这愉快欢乐的笑，顿时驱散了疲劳。毛泽东要办公了，就对小毛说：“毛毛，跟叔叔玩去吧，爸爸要办公了，好乖乖。”小毛很懂事，虽有点不情愿，还是跟警卫员叔叔玩去了。

小毛有个同年的好朋友，是隔壁邻居杨大爷的孙子，名叫杨石发生子。他父亲参加红军上前线打仗去了。傍晚杨大爷也带着孙子到门口乘凉，杨石发生子一出来，小毛就跑上去了，拉着他的手一起做“家家”玩。毛泽东看见这一对小毛朋友，就连忙走近前去，抱起杨大爷的小孙子亲亲，问他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杨石发生子都回答得很清爽。毛泽东和贺子珍都夸奖这孩子聪明、可爱。毛泽东和贺子珍叫小毛和杨石发生子站在一起比一比，看谁长得高？结果小杨石发生子高出一小手指头，毛泽东便高兴地说：“杨石发生子，你的名字太拗口啦，一个名字五个字，不好叫呀，我给你起一个名字好不好呀？”

杨石发生子拍着小手乐呵呵地回答：“好，好！”

毛泽东俯下身去抱起他，亲切地说：“你和小毛同年，又是好朋友，你长得比小毛高一点点，你就叫大毛吧，好不好呀？”

杨石发生子一个劲地说着“好”，蹦蹦跳跳地进门去，把杨大爷和妈妈叫了出来，喜滋滋地说：“毛伯伯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呵！叫大毛，我叫杨大毛啦！”杨大爷和他妈听说毛泽东给孩子起了名字，都高兴得连连点头感谢毛主席和贺子珍。从此，小毛和大毛这两个可爱的小娃娃，就在沙洲坝追逐玩耍，给毛泽东和贺子珍带来了不少的欢乐和情趣。

贺子珍在瑞金托子的一刹那间，毛泽东喜爱小毛的往事一幕幕地呈现在眼前，这更叫她肝肠寸断。贺子珍含着眼泪

说：“小毛，你在叔叔婶婶身边要听话啊，我不久就会回来的，给你带很多吃的、玩的东西回来，你可要乖，不要哭啊！”说着自己的眼泪却刷刷地流了下来。

小毛从贺怡怀里使劲挣脱说：“妈妈，不嘛，我要跟你一起去，我要找爸爸去！”

贺子珍再次亲了亲小毛，忍着眼泪，一再地哄劝着小毛。

毛泽覃、贺怡要上前线去了，瑞金也还要坚守一段时间，贺子珍又和毛泽覃、贺怡商量，先把小毛托付给覃连陞的妻子刘赐福看一段。刘赐福来把小毛领走了。贺子珍送走了爱子，揩了一下眼角，在云石山下愣怔了一会，便转回身去收拾行装；匆匆赶到于都去追赶毛泽东。

二十二、踏上二万五千里程途

贺子珍头戴八角军帽，身穿灰布军装，腰里系着皮带，佩戴着红绸子包的驳壳枪，左手臂上搭着一件夹衣，风尘仆仆地朝信丰新田圩毛泽东的住处走来了。

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迎上去，握着手问候她：“贺大姐赶来啦，一路辛苦啦！”

贺子珍含笑说：“你们辛苦，毛泽东同志在屋里吗？”

毛泽东在屋子里听到贺子珍的声音，连忙高兴地走出房门，看见贺子珍一身武装，虽然显得消瘦而疲乏，但却是英姿勃勃。他微笑着招呼道：“子珍，你们走得不慢呀！你身体好吗？同志们都好吗？”

贺子珍跑前几步，双眸上下打量着毛泽东，看见他瘦弱

多了，心里一阵难过。她随着毛泽东走进屋去，喝了一口他递过来的茶水，然后心情沉重地把沿途看到的情景向他一一作了汇报，她说，“在云石山的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都全部出发了，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几位老同志也都来了。只是问题不少，电台印刷机都带出来了，总务厅还把一些坛坛罐罐都请民伕挑着走。银行连印钞票的机器也搬来了，真好象大搬家似的，罗罗呵呵，臃肿得很，秩序很乱，组织得不够好。”

毛泽东听罢紧锁双眉，笑容顿时消失了，焦虑地说，“怎么不轻装一下，打起仗来怎么办呢？”

贺子珍也神情黯然地说：“这次出发十分匆促，事先又没有动员，后来也没有做细致安排。我也是头一天才接到通知，让我到总部休养连去的。”贺子珍停了一下又继续说，

“我一接到通知，就连忙捎口信叫泽覃、贺怡来了一趟，泽覃弟和贺怡妹中央决定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不让跟我们来了。我考虑在转战途中，天天行军打仗，十分不方便，就决定把爸爸、妈妈和小毛托付给泽贺弟和贺怡妹代管了。那天送小毛时，小家伙大哭一场，喊着闹着要跟我来找爸爸。”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眼圈发红，泪水快要噙不住了。便安慰说：“子珍，你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小毛还是留在弟、妹身边好，过几天他就会习惯的。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再回去接他。现在是战争环境，天天行军作战，小娃娃是没法带的。”毛泽东说着从贺子珍手里接过她给自己带来的夹衣，一起走去吃饭。

在场的警卫战士听了这场谈话，感情上起了波澜。他们听到小毛留在瑞金，心里很难过，掉过头去用手掌擦着眼泪。他们曾同小毛朝夕相处，背着他玩，帮他做木枪，带他

上山采杨梅。小毛很懂事，采得杨梅多了，就用他的小帽子装着，举得高高的，欢快地喊着：“妈妈爱吃杨梅，拿回去给妈妈吃。”警卫战士还带着小毛到附近的田塍边去放鹅、放鸭。现在，小毛却要与他们分别，这一离开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而且能不能见面都很难说，怎么能不叫他们心里难过呢？有的战士打算立即骑马去瑞金，把小毛接来，但被贺子珍发现制止了。

不久，毛泽东随着“红星司令部”出发了。贺子珍跟随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队伍，踏上了艰难的征程。

二十三、克己为人热心肠

贺子珍瑞金托母托子踏上征程的时候，身上怀着孕，身体瘦弱，脸色苍白，行走艰难。组织上为了照顾她，没有让她当政治战士，有一段时间还分配给她一匹骡子。但是，她很少骑，经常把骡子让给伤病员，自己却咬着牙跟着队伍行走。到了宿营地，别的同志在休息，贺子珍稍微喘息一会，就开始找工作做，她给民伕端菜送饭，打热水烫脚。民工休息了，她就和战友们轮流值班，看护民工和伤员。这一切做完，她将自己背着的皮包垫在膝盖上，帮毛主席抄写材料，整理文件，或是缝补衣服。

行军途中，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有一次她生病，总卫生部医生要给她开点药，她拒绝了。因为当时药品奇缺，伤病员又多，她请医生把这些药用在伤病员身上。粮食紧张的时候，她连仅存的一碗炒米也尽先让给伤病员，自己宁愿吃草根、树皮，有时干脆就饿着肚子。过草地的时候，整个部

队都闹粮荒，休养连带的一点干粮，也都吃光了。没有粮食就吃草。有些草有毒，有人误吃丧失了生命，只有一种圆叶子草可以吃，但这种草也不够大家吃，饥饿严重地威胁着大家的生命。经过草地的七天七夜，大家没有吃到一点盐和油。领导上考虑贺子珍的身体状况，有一次分给她一点酥油，她却不肯吃一口，切成一小块一小块，送给了同行的女战士吃。

贺子珍对休养连的老同志是很尊敬和照顾的，有什么东西总要让老同志多吃一点。部队到了毛儿盖，没有粮食了，吃野菜和青稞。前方部队在深山里打到一头牦牛，送给中央纵队的领导同志吃，毛主席让把牛皮剥下来煮苦菜吃，把肉送给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和伤病员。干部休养连为了照顾负了重伤和怀孕的贺子珍，多分了一、二斤肉给她。她知道后，心里很不安，认为老同志应该多分一点，自己年轻应该少吃一点。她把想法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非常赞成她的想法，并叮嘱要给老同志增加一些肉，一直到司务长把中央纵队里仅有的一点肉增补给了老同志，贺子珍才安心。解放后，跟随干部休养连长征的谢觉哉还多次提起这件小事，赞赏贺子珍的风格和为人。

有一个时期，为了照顾干部休养连一些老同志的健康，有几个警卫战士编到这个连来了。贺子珍对这些年轻战士更是关怀备至。在行军中，贺大姐为他们补衣服，做鞋子，还给他们讲井冈山和瑞金的革命故事，鼓励他们战胜困难。他们都是共青团员。贺子珍很关心他们的进步，以老大姐的身份常与他们谈心。

有一次，吴吉清对贺大姐说：“贺大姐，这样艰苦的行军生活，我们男同志都觉得吃不消，可怎么一点也看不出你

觉得苦呢？”

贺子珍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小吴，长征中，行军作战的确困难很多，眼下确实很苦。但是，我们只要想到革命，想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那么面前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现在流血流汗来克服困难，靠坚强的意志、革命的信念和铁的组织纪律组成的钢铁集体，就一定能够完成北上抗日的重任。”贺子珍讲到这里加重了语气，

“我们吃苦，是为了赢得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子孙后代造福，吴吉清同志，我们今天吃点苦，不正是为了这个光明的未来吗？”

吴吉清听了这席话，深受感动，要求自己更严格，进步也更快了。

贺子珍和邓颖超一起，培养、介绍吴吉清等同志入了党。她也关心他们的文化学习。吴吉清、陈昌奉刚参军时没有文化，连邮局是干什么的都不晓得，更不要说提笔写信了，是贺子珍手把手教他们认字的。吴吉清、陈昌奉后来说，他们的文化是毛主席、贺子珍一点一点教出来的。

长征途中，她常常牵挂着毛泽东。毛泽东指挥部队走在前面，她跟随干部休养连走在后面，见面的机会不多。偶尔碰到一起，她就放弃休息时间，抓紧为毛泽东拆洗缝补衣服，整理抄写文件。弄到一点点好吃的东西，她尝几口就留起来，装进饭盒里，送给毛泽东吃。有一次，她怕毛泽东吃不饱，把自己碗里的饭菜悄悄地拨到了他碗里。毛泽东一边埋头看文件，一边心不在焉地扒饭，没有注意贺子珍的动作。他总扒碗里总有，就纳闷地抬起头来说：“子珍，我的碗是个宝咧，怎么碗里的饭越吃越多呀？哪里变出来的？”

贺子珍笑而不语。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戎马倥偬，但只要一有间隙，他就手不释卷。有一天下大雨，他随身带的小被包淋湿了。贺子珍到隔壁邻居家借了个火炉烘烤一床绒毯。贺子珍要出去为毛泽东弄一点吃的，临出门时对毛泽东说：“润芝，你光顾一下烘着的毯子，我出去一下。”

毛泽东口里“嗯嗯”着，眼睛只在书本上，耳朵里却没听清贺子珍说什么。

过了一会，贺子珍端着一碗饭走进来，鼻孔里钻进一股焦糊味。她抬头一看，满屋子烟，毯子烧了一个洞。她哭笑不得地埋怨：“哎呀，毯子都烧着了，你真是……”

毛泽东这才抬起头来嘿嘿乐了。

后来，毛泽东就盖着这条开了“窗户”的毯子，挡风御寒到了延安。

贺子珍在征途中生过一个孩子，又在猪场受伤，留下十多处伤痕，还有弹片未取出来，她受的苦和罪是可以想见的。但她的精神状态怎样呢？即休养连的连长侯政说：贺大姐羞涩文雅，不多言不多语，一路上总是笑，见面先笑，讲话带笑。很能体贴人，要求自己严格，总是谅解我们的难处，处处以普通战士的姿态出现，协助我们工作。

二十四、光荣负伤

一九三五年三月的一天傍晚，贺子珍所在的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队伍，到达了贵州盘县猪场五里排。离宿营地只有十多里路了，大家已走得疲累不堪，连长侯有成看到日头已落西山，估计敌机不会再来捣乱，就下了休息的命令，让队

伍靠着树林旁的高坎下休息，派了几个人去找宿营的房子。大家把马和担架上的伪装物去掉，把头上的伪装圈摘下来，说说笑笑，松松快快地休息起来。

忽然象蚊子叫一样的嗡嗡声由山背传来，大家举目一望，一架小型飞机钻过山谷，飞到头顶上了。连长和指导员忙着照顾几个老同志和生病的大姐。靠在高坎旁休息着的贺子珍，也站起来，招呼大家分散隐蔽。

敌机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随着震耳的隆隆声，从云缝里钻出来的敌机，张开黑乌鸦似的翅膀向着红军休养连隐蔽的地方俯冲过来。一阵疯狂的机关枪扫射，紧接着投下了一枚炸弹。炸弹、机关枪把高坎炸得坎崩泥溅，一塌糊涂。掀起的气浪从贺子珍的头顶、脊背、胸前冲去，弥漫开来的巨大烟尘把她淹没了。

贺子珍摇摇摆摆地站起来，晃了几晃，又栽倒在地下。警卫员吴吉清跑过去一看，贺大姐却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顺着头顶、身上、腿上流下来，染红了衣服。满身烟硝和尘土，贺子珍躺在血污之中，昏迷不醒。

吴吉清双手颤抖着，背起处于昏迷状态的贺子珍，去寻找担架。

敌机溜走了。在烟雾中，红军干部战士跑过来，看望躺在担架上的贺大姐，只见她的脸象一张白纸，渗出来的鲜血把她的军装都染透了。

吴吉清骑马赶到总卫生部，请来了医师李芝。经过详细检查，发现贺子珍从头部、上身到四肢，十七处中了弹片，血流不止。有一块弹片从她的右背部一直划到右胳膊上，撕开了长长的一条大口子。李医师先给贺子珍注射止血针，服了几粒止痛片。当时没有麻醉药，几个同志狠了狠心，按住贺

子珍用镊子把弹片一块一块取出来，嵌得深的弹片取不出来，一直留在她身上。李医师在伤口上敷上碘酒纱布，进行简单包扎。每天到了宿营地，李芝医生就去给她换纱布。旧的棉花、纱布沾满了血，从伤口上揭下来，没有热水，只有用冷水洗干净伤口，再换上新的纱布，连消炎药粉都没有。

据健在的其他在场的同志回忆，贺子珍是因为卧倒的地势稍高一点，炸弹爆炸后，飞起的弹片把她击中了，他们并没有看到贺子珍掩护、抢救担架上的师政委的场景。但他们都认为贺子珍的确是光荣负伤，受伤后表现得很顽强，不愧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坚强女红军。

贺子珍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后，部队很快就要出发了。她思忖自己的伤势这样严重，得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行走，需要人抬着，干部休息连的担架和马匹这样少，老同志和伤病员这样多，要是继续跟着部队行进，对部队的拖累太大，因此，她主动向组织上提出请求，把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钱希钧知道贺子珍的意见后，很着急，她认为把子珍留在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容易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搜查又紧，凶多吉少。她赶紧找到毛泽民，要他把贺子珍的伤势和她本人的要求转告给毛泽东，由毛泽东决定她的去留。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银行行长毛泽民得知贺子珍的伤情后，马上赶到干部休养连驻地。他和钱希钧在担架旁，焦急地呼唤着贺大姐。他们的热泪淌在贺子珍的脸上。同志们也都围拢过来，轻轻地呼喊：“贺大姐！”

贺子珍慢慢地睁开眼睛，深情地望着毛泽民和钱希钧，缓慢而坚毅地说：“泽民弟、希钧妹，我大概不能和你们一道北上抗日了。”她停顿了一下。大家看得出来，她脸上表情十分难过。她克制住自己，又十分平静而坚定地说，

“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润芝。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老百姓家里，把我留下吧，不要拖累大家，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

毛泽民安慰她说：“大嫂，我们已经电告大哥，部队一会儿就要出发，请你放心，只要我们在，就一定把您带走！”

这时，毛泽东随同总部已经走到前面的宿营地，离这里有十多里路程。他接到毛泽民的报告之后，立即同傅连璋医生和三个警卫员提着两盏马灯漏夜赶来了。

两盏马灯走进了院门，灯影里，一个高大的身影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连长侯有成发问：“下午飞机轰炸有几个负伤的？炸死几个？重伤员在哪里？贺子珍在哪里？”

侯有成一看是毛主席，吃了一惊，没想到他赶十多里路这么快就到了跟前，他把下午遭受敌机轰炸的经过和受损失情况详细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随他走进屋里，一个一个看望受伤的同志。看完伤员，他坚定有力地对侯有成说：“敌人是时刻不会忘记我们的，但他们是永远阻止不了革命队伍前进的！”说着一只有力的大手向前面一指。这种坚定的声调和有力的手势，给侯有成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提着马灯走近贺子珍躺着的担架，他俯下身去，抚摸贺子珍微弱的脉搏，轻轻地问着：“子珍，怎么样？”

贺子珍被这熟悉的声音唤醒，异常激动。她亲切地温柔地注视了一阵毛泽东，声音微弱而沙哑地说：“润芝，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

毛泽东很感动，他只说了一句：“我和同志们都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然后他背过脸去。

贺子珍又昏迷过去了。傅连璋摸了摸她的脉搏，对医生作了些交待。毛泽东指示医生要尽力抢救，同时用坚定的语气对毛泽民说：“就是抬，也要把她抬到目的地！”

毛泽东连夜赶回宿营地，处理完军机大事之后，贺子珍负伤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拿起红铅笔给担架班长丁良祥写了个便条：

老丁同志：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昨天傍晚敌机轰炸，她受了伤，带了十几处花，不能走路。

毛泽东即日

第二天早上，警卫员吴吉清把便条交给了丁良祥。身高体壮的丁良祥看过便条之后，犹豫起来。他是负责抬毛泽东这副担架的，因为毛泽东身体瘦弱，又喜欢晚上工作，早上起来骑在马上行军，容易打瞌睡跌下马来，所以，配备了一副带有篷子的担架给他。现在要丁良祥带着担架去抬贺子珍，那么毛泽东自己怎么办呢？他拿着便条去找毛泽东。

“主席，我把担架抬走了，你怎么走？”丁良祥问道。

毛泽东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自己走，休养连的担架少，你去抬子珍吧。请你转告余达木同志，把那匹小黄马也牵去，等她好一点，你们抬累了，就让她骑马。”

丁良祥接受任务之后，同毛泽东的马伕余达木一起，带着毛泽东对贺子珍的关怀和体贴，抬着担架和牵着马在路口等着贺子珍。

贺子珍的担架来到后，便由吴吉清把她背起来，放到毛泽东乘坐的担架上，把那副担架空出来抬其他伤员。

丁良祥等四人轮换抬着贺子珍，吴吉清随行照料。他们随着部队走了三天，来到贵州盘县与云南富源县交界的山下，已近黄昏时分。贺子珍躺在担架上、伤口的剧烈疼痛

使她头上渗出一层层的汗珠，吴吉清不时地用毛巾给她擦去头上的汗珠。贺子珍用顽强的毅力和疼痛作着斗争，没有呻吟过一声，只是使劲地咬着嘴唇，把嘴唇都咬破了，吴吉清和丁良祥都劝她说：

“贺大姐，你痛得厉害，就喊两声吧，这样会减轻点痛苦。”

但是，贺子珍始终没有哼过一声，她咬紧着牙关，由于顽强地克制，她常常昏迷过去。

毛泽民此时赶来告诉吴吉清他们说：“总部从这里路过，毛主席要来，你们停下来等一会儿吧。”

他们在山上停下来休息，警卫员黄立堂和丁良祥等人吃饭去了。贺子珍从昏迷中醒过来，忍痛微笑着对吴吉清说：

“小吴同志，自从邓颖超同志和我介绍你入党后，你进步很快，我们都很高兴。希望你今后多照顾主席。”

停顿了一下，一丝痛苦的阴影掠过她的脸上，她皱了皱眉头，又接下去说：“前面的道路是曲折漫长的，但胜利一定会来，很可惜，我大概不能和你们继续前进了，因为那样会拖累你们，会影响主席。把我寄放在这里的老百姓家里吧，不要再抬着走了。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再见面吧。如果我为革命牺牲了，有一件事情托付给你。前几天，我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毛泽覃同志被反动派杀害了。我妹妹贺怡和小毛，现在也不知下落。革命胜利后，你要想办法把小毛他们找到。你是知道的，主席特别喜欢小毛。如果将来小毛找到了，你告诉他：他的妈妈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在长征道路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要小毛继承妈妈的遗愿，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

这时，毛泽东快步走过来了，他向迎上来的吴吉清问了

问贺子珍的伤情，然后慢慢地走到担架边，给贺子珍把被子掖好，温和地安慰着她。贺子珍十分激动要坐起来，但毛泽东阻止了她，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一会儿，部队出发了，担架员走过来，慢慢抬起贺子珍，向前走去。毛泽东陪着贺子珍走了一大段路，就忙着和总部的首长指挥作战去了。

在贺子珍躺在担架上的二、三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不知道多少次漏夜打着马灯，同警卫员赶了很远的路程，前来探望贺子珍，询问她的身体情况，给她带来一点自己节省下来的食品。战友的深重关怀，减轻了她的伤痛，温暖了她的心。干部休养连的同志在担架员太累的时候，也轮流抬过她。爬山时，在担架抬不上去的地方，女战友还背着她走。伤势刚好一点，贺子珍就不肯让战友抬了，她走下担架，用双脚走完最后的也是最艰难的路程。

二十五、红绸背心暖人心

一件不伦不类、粗陋不堪的红绸毛背心，在现实生活中早已消失了。但，它却长留在一个红军女战士的记忆里。

红军翻过雪山之后，在毛儿盖停留了二十多天，筹备粮食和御寒衣物。毛儿盖是藏族地区附近数百里最大的一个村落，在它前面是纵横数百里、人烟稀少的大草地。贺子珍从毛泽东那里知道，草地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晴雨莫测，寒冷刺骨，因此，她特别关心女伴的行装。

贺子珍的伤口虽然还没有全愈，却热心地去一个一个检查女伴过草地的准备情况，女红军钟月林衣着单薄，又没有

材料缝制御寒衣服，问她怎么办？她说：“就身上穿的这也能闯过草地。”

贺子珍捏着她的手臂说：“不行，草地太冷，你这样单薄的衣服，还不把你冻成冰块。”

“我能走过去！”钟月林执拗地说，“我身体好，没有负伤，贺大姐，你身上还有敌人的弹纯，身体又亏，你多准备衣服就行了。”

贺子珍看着这个十九岁的女战士摇了摇头。

钟月林原来是个农村姑娘，很小就参加了革命，当过于都县的妇女部长，一九二三年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长征前夕，在瑞金苏维埃学校学习文化。原来身体很结实，哪知临出发时拉肚子，她急于上前线，检查身体时隐瞒了生病的事。可是，晚上老上厕所，被班长发现了，汇报上去，让中央工作团团长董必武知道了，怕路上急行军时她赶不上队伍，劝她留下。但是，她不願意，坚决地说：“我死也要死在路上，留下不行。我走一天算一天，走一步算一步，绝不给组织上添麻烦。”董老见她这样坚决，便给了她一包西药，因为她从来未吃过药，一包吃下去病便好了。她跟着队伍行军，从未掉过队。

钟月林是个很能吃苦、很要强的女战士，衣单褥薄也要闯过草地。比她大五岁的贺大姐却不能眼看着小妹妹冻僵在草地上。她决心为钟月林缝一件羊毛背心。可是到哪里去弄布和羊毛呢？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每个战士只发两件单衣，经过湖南省，转战贵州，四渡赤水，过凉山，飞渡大渡河，爬雪山，历时十个多月，行程一万多里，大家的衣服都磨破了，哪还有多余的布呢？

“有了”，贺子珍的手无意中碰了一下腰间的驳壳枪，

紫红色的枪托布在眼前一闪，她的眼睛一亮，敏捷地从枪套子里把那块紫红绸子布拉出来，又叫警卫员吴吉清和其他战士把他们的包枪布也贡献出来。搜搜寻寻，拼拼凑凑，总算够用了。然后，她又从毛泽东那里弄到了一点羊毛。一切备齐，她在灯下亲自动手剪裁，一针针，一线线，给钟月林缝了一件紫红色羊毛背心。

红绸背心缝就，贺子珍又关心起钟月林的吃食来，劝她吃好一点，积蓄一点热量。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要说吃好的，连吃个半饱都不可能啊。刚好贺子珍从毛主席那里弄到一点酥油。就让钟月林和其他女同志一起吃。贺子珍大姐身体那样差，酥油又那么少，钟月林哪里肯吃。可是，吃饭时贺子珍乘钟月林不注意，就挖一勺放到钟月林碗里，让她非吃下去不可。

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和伤病员们互相搀着进入了草地。草地的情景真使人触目惊心。举目一望，是无边无垠的长草，在长草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人到了草地上，不辨东南西北。草皮底下，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出令人恶心的腐臭气息。广阔无垠的泽国里，根本看不到路的痕迹。脚下是草茎和腐草织成的泥潭，人踩上去脚下是软乎乎的，身子上下晃动，用力过猛，就会直陷下去，淹没了头顶。天气变化无常，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更是难熬。天，整日下着雨。战士们身上湿塌塌的，使人从头顶凉到脚心。夜晚只能找块较为高突干燥的地方围成一圈，背靠着背取暖。因为没有房子，雨一来，还没有干的单衣又湿透了。大家打着哆嗦，在风雨中战战兢兢地盼着天明。

进入阴冷的草地，穿着那件紫红背心还冷得发抖的钟月

林，尝到了草地严寒的滋味。在无遮无拦的风雨泽国里，她和贺大姐等女战士，坐在倒扣于地上的脸盆上，头藏在撑起的油布里，雨水顺着脊梁往脚下流去。她穿着毛背心的身体，紧贴着贺大姐，感到多么温暖啊。就靠着这件毛背心，钟月林才从风雨饥寒的草地挺了过来。这件用深厚的阶级情谊缝制起来的背心，深深地嵌印进了钟月林的记忆里。直到今天，她想起这件背心，还感慨地说：“要不是贺大姐缝制的这件背心，我的命早丢在草地上了。贺大姐给战友的温暖，是永不消逝的温暖。”

贺大姐给制的这件背心，并没有到此而止。红军到达陕北以后，钟月林和宋任穷同志结了婚。不久，怀了孕。眼看临盆期快到了。她什么东西都没有，可着急了。打仗，吃苦，她眼睛都不眨一下。可是，生孩子这件事，她一点经验也没有，紧张得很。部队里女同志很少，连帮她准备一些婴儿衣物和接生的人都没有。她本想找贺大姐请教，可是，贺子珍这时又不同她在一起。

正在她作难的时候，贺大姐及时雨一样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喜孜孜地交给她一个布包。钟月林打开一看，里边放着婴儿的衣物和用品，这真是雪里送炭啊。贺大姐坐下来，详详细细地向她介绍生孩子的经验和注意事项，安慰钟月林，要她不必紧张。贺大姐一阵阵话儿，象一阵阵春风，温暖着将要作母亲的钟月林的心。

二十六、心头伤疤

贺子珍光荣负伤，身上留下十七处伤疤。她心头的伤疤

有多少，有谁数过吗？

受伤不久的贺子珍，一天随部队急行军八十多里，晚上九点钟才到达宿营地，住在老百姓的茅草屋里。天黑得象锅底，狭窄的山沟里萧条冷僻，贺子珍忽然肚子阵痛起来，干部休养连的女红军七手八脚地为她准备生孩子的东西，当时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警卫员吴吉清背着一个脸盆，是一物多用的宝贝，洗脸、洗脚、打饭、装菜、遮雨，轮番使用它。脸盆现在摊上了第六种用处。贺子珍十一点钟左右生下了孩子，女同志就用这个脸盆给她洗孩子。第二天早上，用这个脸盆去打饭时，盆沿上还有血斑哩。没有现成的小孩衣服，就用旧的洗脸手巾把婴儿包起来。

婴儿哇哇啼哭，虚弱的母亲却犯了愁，明天早上五点钟要出发，上级有命令不准带孩子，在这样危险的征途中，实际上也不可能带孩子，怎么处理呢？孩子的爸爸离这里还有四十里路，来不及同他商量了。贺子珍当机立断，找来连长侯有成和钱希钧、吴吉清同志，请他们把刚出生的孩子托给当地老乡。她声音略有哽咽地说：“不能怪我们不喜欢后代，实在是没法带。他是革命的后代，就让他留在人民当中吧。这个孩子要是革命呢，我们就是同志，将来也有可能重逢；要是他不参加革命，就做个老百姓，不也很好吗？孩子大了要是当了反革命，他不会找我们，我们也不要他了。”

贺子珍讲得这样通达透彻，钱希钧感动了，领着吴吉清去找老乡。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老百姓都上山躲起来了。在茫茫黑夜中，从这个山头跌跌撞撞地摸到那个山头，找了许久也没有寻到一个人家。他们爬到一个山坡上，远远地看见闪闪烁烁的一点灯火，便悄悄摸进那个茅房，推门进去，原来住着一个瞎眼的老太太。他们问长问短，说了

半天好话，又宣传了一通红军的宗旨和政策，才转到正题上。

“大娘，我们现在要出发打压迫穷人的坏蛋王家烈去，有一个刚生下的娃娃，带着不方便，送给你做孙女吧。你把她养大，将来有个帮手，也可以照顾你。”

“我没有奶喂她，年纪大了，体格也差，没法养活她。”老太太推托着。

“没关系，做点米汤先喂她，村子里的人回来了，讨点奶，好养活的！”钱希钧一个劲地说好话。

就这样，把一条破毛巾包裹的婴儿，强送给了荒山僻岭里的瞎眼老太太。给这个瞎眼老太太留下三十块光洋，四碗鸦片烟土，作为养育费。这个苦命的孩子就消失在荒僻野岭之间了。

钱希钧把寄养婴儿的情况向贺子珍作了汇报，她听了平静地点点头。她的心却在痛苦、滴血，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疤。

孩子是母亲心头的肉啊！贺子珍的心头已落下四块伤疤了。

一九二九年，贺子珍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红一军团挺进赣南、闽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扩大革命根据地，部队行军作战，频繁转涉。生活本来就很艰苦，贺子珍还比一般战士多一层困难。她已经怀了孕，挺着个肚子，在陡峭险峻的山间小路上，吃力地行走着。晚上住在祠堂庙宇里，门板一搭，稻草一铺，不管凉热就躺下了。

一路上含辛茹苦，当部队打下龙岩后，她分娩了。为了跟随部队继续前进，她把自己生下不久的心爱女儿托给了当地老乡。当从她怀里抱走哇哇啼哭的婴儿时，她眼里噙着眼

泪，这是她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啊！一九三一年，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来到中央苏区，想到龙岩把侄女接来。贺子珍也日夜想念着自己的女儿，但为了革命，她忍痛拒绝了。她音调低沉但却坚定地说：“现在环境不允许把孩子带在身边。孩子是革命后代，应该让他们在人民中成长，不要让他们拖累部队！”

一九三二年，贺子珍在瑞金生下小毛。二、三年里，这个可爱的孩子曾给贺子珍带来了多么大的愉快和乐趣。但是，长征前夕，她不得不忍痛割爱，以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毅力克服母爱，在风雨如磐的瑞金离母别子。

一九三三年，贺子珍又在沙洲坝生了第三个孩子，由于工作劳累和营养不足，这怀胎七个月的孩子刚生下来，活了三天就夭折了。伤心的母亲以加倍的精力投入工作，没有满月就回到了军委机要科，协助刚调来的见习参谋黄有峰同志搞好机要工作，在忙碌中冲淡了失子的悲痛。

不知为什么，她在荒山野岭间失去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小毛的音容笑貌却清晰地出现在她眼前。贺子珍揪心地想念小毛。

小毛，小毛，你在哪里？

小毛在江西赣南山区的荒村野店，崇山峻岭间辗转迁涉。

瑞金被敌人占领后，傅连璋的妻子刘赐福领着小毛和她自己的三个孩子，怀里揣着十几块银元，从瑞金化妆成农村妇女，跑到乡下，她逃难前，毛泽覃曾经来看过小毛。五、六岁的小毛，牵着他的衣襟哭叫着“叔叔，我要妈妈，我要爸爸！”

毛泽覃蹲下身子，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亲着他的小脸蛋

说：“毛毛，好乖乖，爸爸妈妈打白狗子去了。等消灭了白狗子，爸爸妈妈一定回来接你。噢，毛毛不哭，毛毛乖！”

“叔叔，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呢？”毛毛仰起天真的小脸，腮边挂着几粒晶莹的泪珠。

“快了，很快就会回来的！”毛泽覃哄着小毛，又亲了亲他，嘱咐说：“毛毛，现在到处是白狗子，你跟刘阿姨去，可要听话，啊！”

“我晓得！”小毛懂事地点点头，又扑进刘赐福的怀里，“我是刘阿姨的小五，对么？妈妈！”

站在一旁的刘赐福一直揩眼泪，听了这话，连忙答应说：“对，对！毛毛，你是妈妈心尖上的肉蛋！”

毛泽覃叮嘱刘赐福一些话，就出发打游击去了。刘赐福领着四个孩子，专挑荒僻小路逃走。他们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躲了十几天，敌人来搜剿，她又带上一点米，领着孩子和群众一起上山，躲进匆匆搭成的草棚里。

冷风冷雨，星月无光，无遮无拦的草棚，在风雨中抖索。狼吼虎啸，更增添了山夜的恐怖。孩子们没有被子盖，只好钻进草堆去睡。小毛紧紧偎在刘赐福的身旁，冷得直抖。

躲了些日子，米快吃光了，青菜和水煮，放上几粒米，又没有盐，很难吞咽。刘赐福把野菜往自己孩子碗里盛，把米粒往小毛碗里盛。小毛懂事了，看到自己碗里米粒多，野菜少，就要往“妈妈”碗里拨一些。刘赐福笑看哄他说：“妈妈碗底下全是米，看看，”她拿筷子故意挑起一些米粒让小毛看，“吃吧，毛毛，米多着呢。”

后来，她不得不领着孩子下山，在敌人的刺刀缝里钻来钻去，遭逢几次危险，差点被敌人抓住。

她在穷乡僻野间奔逃迁涉，有一次恰巧遇见了毛泽覃。毛泽覃握着刘赐福的手说：“叫我好找哪。你们还好吧？”

刘赐福凄然一笑：“活着就是了！”

这时，毛东覃已经给小毛找了一户人家，他感谢刘赐福之后，便把毛毛接走了。

当时为了保密，毛泽覃没有把毛毛的去处告诉刘赐福。一九三五年，毛泽覃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小毛也杳无踪影了。

战争和苦难夺去了贺子珍的心头肉，作为母亲，她的心是可怜悲苦的。有时候想起子女，真叫她肝肠寸断哪！但作为一个久经磨练的革命者，她倔强地忍受了这些打击和折磨，革命意志克制儿女之情。

二十七、新的起点

长征结束，革命开始了新的起点。贺子珍工作的新起点是在马圈里开始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经过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陕北的瓦窑堡。这样众多的红军战士和中央机关人员，简直把小小的瓦窑堡挤破了。中央苏区银行没有找到房子，只好在一个马圈里办公。

这是怎样的一个马圈啊！简陋破败。门口堆积的马粪足有几寸厚。铲啊，扫啊，搞了好几天才露出黄土地面，又挑来一担担清水，把里外地面冲刷干净，把马粪味冲洗掉。

在清扫马粪，冲刷地面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志干得格外起劲，这就是贺子珍。

毛泽东在直罗镇指挥作战，贺子珍先来到瓦窑堡。她因为负伤体弱，又快要生孩子了，组织上没有给她分配工作。但她是个闲不住的人，自己到处找事做。她发现银行人手少，事情多，便主动增援来了。她对银行行长曹菊如同志说：“给点事情做吧！”

曹菊如非常高兴地欢迎她。他正忙得焦头烂额呢。从瑞金出发时，银行家大业大，有一百多副挑子，十三、四个干部，可是，到了瓦窑堡只剩二、三个人了，有的在路上牺牲了，有的调到别处工作去了。可是，分配贺子珍做点什么呢？他感到为难，眼前最需要的是清点钞票，能让她干这种琐碎费神的工作吗？

可是，贺子珍眼里有活，手脚勤快，她帮助清扫完马粪之后，抓到什么做什么，先找来一些砖头，垒起两个垛来，上面摊一块板，高一点的当办公桌，低一点的当凳子。后来发现大堆钞票没人管，便主动要求搞出纳。她在凳子上坐下来，把布做的钞票放在桌子上，一张一张地认真数起来，为了数得顺畅，还不时地用手指在嘴唇上沾着口水。

这个长征中的女英雄，带了几个当地招来的徒弟，几个月的时间就坐在马圈里数票子，管票子。工作之余则管闲事，象母亲对待孩子一样关心体贴新来的干部，帮助他们熟悉业务，给光棍汉介绍对象。见到什么工作就抢着做，公事私事都热心地过问。后来她当了银行的副科长，银行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布厂，她去管这个厂子，热心地张罗各种杂务事。

毛泽东指挥完直罗镇战役之后，来到瓦窑堡，也住在马圈改成的银行里，总结长征，提出新的战略任务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就是在银行里写成的。毛泽东抽着

烟，日以继夜地写着，贺子珍则坐在一边誊写。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这句承前启后，气势磅礴的话，给了贺子珍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她准备为这个新局面的到来而奋斗。

延安南门外的中央机关合作社里，每天人进人出，熙熙攘攘，特别热闹。

中央机关从瓦窑堡搬到延安之后，警卫员吴吉清离开毛泽东，调到中央机关合作社去当主任。为了活跃中央机关职工的经济生活和福利事业，合作社经营了三种业务，卖日用百货，办食堂，开旅馆。

毛泽东当时住在凤凰山北边一家老乡的窑洞里，离机关合作社只有一里半路之隔，工作之余，他常常散步走进机关合作社，对合作社的工作作些指示，在机关食堂里吃一顿饭，同职工谈谈心。

有一次，毛主席吃过吴吉清给他做的饭菜之后，抹抹嘴对吴吉清说：

“吉清，明天是星期日，我请你到我家去吃甜酒，好不好？”

“吃甜酒还有不好的，”吴吉清高兴地答应，“好！我一定去。”

“甜酒”，就是江西、湖南家家户户常吃的“酒酿”，四川和陕西人叫做“捞糟”，是毛泽东最爱吃的东西。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吴吉清、陈昌奉他们经常做酒酿给毛泽东吃，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在乌江边上过新年时，吴吉清还搞到糯米给毛泽东做过一次呢。至今两年了，吴吉清也很想尝尝毛泽东、贺子珍亲手做的酒酿，更主要的是去看望贺大姐。

他听说贺大姐在红军大学学习时，晕倒在厕所里，现在家里养病，他出差到定边回来不久，还一直没有捞到机会去看看贺大姐呢。

星期天一早，吴吉清洗漱完毕，兴冲冲地朝凤凰山毛泽东的窑洞走去。

毛泽东听见院里的脚步声，便走出窑洞迎接吴吉清。贺大姐抱着刚生下几个月的娇娇，也迎了出来。

进了窑洞，毛泽东请吴吉清坐下，欢喜地对他说：“今天请你来，主要是叫你尝尝我和子珍做的甜酒。”

吴吉清没有坐，急着走到隔壁的伙房里去看甜酒，只见毛泽东和贺子珍做好的甜酒，正摆在锅台上。做法和瑞金的一样，只是在瑞金用的是瓷盆，这里用的是陕北的瓦盆。

吴吉清见甜酒已经做好，就忙着帮助炊事员煮饭菜。毛泽东亲自动手，一会儿烧火，一会儿剥葱。贺子珍哄着娇娇，一边在厨房里忙碌着。

吴吉清见毛泽东那样忙乎，劝说道：“主席，你歇一会儿吧，我们自己来！”

毛泽东笑着风趣地说：“今天是我请你嘛！烧火剥葱，也算一功呀！”

饭菜上桌之后，毛泽东、贺子珍和吴吉清围桌而坐。毛泽东抱着娇娇，给吴吉清夹着菜。贺子珍先给吴吉清满满地斟了一碗甜酒，放在他面前，然后又给毛泽东斟满一碗。

毛泽东给吴吉清碗里夹了一筷子菜，说：“你今天要吃得好好的，饱饱的，你可不能客气呀！”

吴吉清喝着酒，笑着说：“到主席和贺大姐这里，我不会客气的。”

贺大姐高兴地说：“那太好啦！”说罢，她先啜了一口

酒，笑着说，“怎么样，还有点我们家乡的味道吧？”

吴吉清连忙端起碗来尝了尝，赞美道：“真甜，真味道！”

毛泽东和贺子珍听了，都高兴地笑了。毛泽东吃着饭，讲着长征路上的笑话，关心着机关合作社的工作。当他了解到有的服务员不安心合作社工作时，说道：

“这可不对呵。革命工作不象吃饭，可以挑肥拣瘦。我们都是服务员，干什么事情都是为人民服务。子珍刚刚到瓦窑堡的时候，还在银行里数了几个月钞票哩。谁也不能轻视一架算盘，一本流水帐。国家和人民的钱，都经你们的手周转，这种工作光荣得很呢！”

毛泽东还半开玩笑地问吴吉清：“老乡们说，‘三年学会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会个庄稼人’。你这个买卖人学得怎样啦？”

吴吉清说：“说是三年，实际上也得一辈子。”

听到这里，贺子珍很有感慨地说：“学习也是一件艰难的任务啊！这个任务我没有完成好，打了个败仗！”

提起这事，吴吉清问了问贺大姐最近的身体情况之后，便详细打听贺大姐在红罗大学学习时晕倒在厢所里的事情。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为了迎接新的局面，贺子珍急于要求工作。她当时的心情很苦闷，由于受伤和生孩子，弄得身体很衰弱。

组织上为了照顾她养病，没有给她分配工作。她在家带孩子，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当“家庭妇女”。她是个好强的女红军，闲不住，不甘心当家庭妇女。为了能跟上形势，胜任艰苦的工作，她决定首先得学习，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和科学知识。在新的形势面前，她是明显地感到落后了。所以，

在娇娇生下三个月后，她就托付给机关合作社的张秀英代为照看，她带着伤残的身体和一颗渴望提高的心，进了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班。

贺子珍跟长征过来的几位大姐编为一个小组，过军事化生活，每天的安排都非常紧张，早起下操，上午听课，下午学习和讨论，还有搞军事训练，参加劳动。身体好的同志都感到吃力，贺子珍身体虚弱，更是吃不消。但她很倔强，不但刻苦学习，还抢着干杂活，什么事情都不甘心落后。学校打扫卫生、擦玻璃，人家照顾她，劝她休息，但她不接受照顾，也爬上窗台跟大家一起擦玻璃，处处以普通学员要求自己。

头部、背部的伤痕和嵌入体内的弹片，时时折磨着她。每天学习下来，她头晕脑胀，四肢无力，浑身的骨头架都象散了一样。但她一直秘而不宣，咬紧牙关忍受着病痛，振作精神，坚持学习。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发现不见了贺子珍，到处去喊也没人应。女同志找遍了红军大学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她的踪影。最后在厕所里发现了她。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忍耐超过了限度，她竟然晕倒在厕所里。当女同志找到她时，她仍然躺在厕所里昏迷不醒。大家很难过，有的女同志流出了眼泪。大伙把她抬出厕所，送往医务所，进行抢救，许久才醒过来。

她还想坚持学习，但组织上和同志们都建议她休息治疗。倔强好学的贺子珍，终于含着眼泪离开了红军大学。

二十八、延安托女

一九三六年的冬天，贺子珍住在保安的一个窑洞里。有

一天早上，天还没有亮，贺子珍就大声叫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清华，清华，快起来！”

住在隔壁窑洞的贺清华，睡眼朦胧地走过去问：“贺大姐，叫我做什么事？”

贺子珍有气无力地说：“我要生了，快给我找间房子吧！”

贺清华手忙脚乱地去找房子，找到担架班空出的一间小屋子，窄得很，只能住两个人，连门都没有。贺清华忙把屋子打扫打扫，转身去找傅连暉来接生。屋子里扫起的灰尘还没有落下，婴儿就呱呱落地了。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就是娇娇。毛泽东听到婴儿的啼哭，走过来风趣地说：“哟，就生了？真快呀，象鸡下蛋一样，一滑溜就下来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贺子珍也幸福地笑了。

当时条件很差，什么吃的都没有，只是从大灶给贺子珍打饭来吃，烧了点豆角、土豆，就是对产妇的优待了。她也没有过多的奢望，只想吃点杏，警卫员们找了点杏，把核去掉，熬成汁，贺子珍香甜地喝着，当时这就算享受。

长征途中得到贺子珍多方面照顾的钟月林来探望，她想劝贺大姐乘生孩子这个机会，好好休息调养一下。出乎她的意料，贺大姐一见到钟月林，就恳切地对她说：“月林，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想把娇娇托给老乡照管，我要学习，要工作，没有工夫照料她。你就帮大姐一个忙吧，越快越好！”

钟月林知道贺大姐的脾气，只好点头答应她的嘱托。

贺子珍负伤时流血过多，身体一直没有复元，因为条件艰苦，生孩子得不到什么补养，身体极为虚弱，一点奶水都没有。中央机关的同志了解到红四方面军里面，有位从四川长征过来的年轻女战士张秀英，刚刚生了孩子。孩子夭折

了，她有足够的奶水，于是把她从洗衣队调到机关合作社同她爱人焦桂林一道工作，并请她给娇娇喂奶。那时物资困难，组织上只能每月发给张秀英一斗小米。

国民党乘红军立脚未稳，对延安实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想把红军困死。红军战士的日常生活十分匮乏，一个信封，一块肥皂都不容易买到。合作社里虽然东西不多，却都是每个人日常生活必需的，加上又在街上，所以，每天来合作社的人还不少。毛主席也时常到合作社来，有时是调查了解经济工作，有时是陪同外国朋友。

毛泽东每次上街都要来合作社看看娇娇，从张秀英怀里抱过孩子，亲亲她的脸蛋，或者让孩子躺在摇篮里，拉着她的小手逗着玩一会。每次离开之前，总要询问一下孩子的生活情况，并对张秀英表示谢意。他经常说：“让你辛苦劳累了。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让她们知道，为了她们，前辈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贺子珍身体稍好些就常来看孩子。延安的气候常常很干燥，有时北风夹着长城外的黄土遮天蔽日，有时白天炎热夜里却很冷。贺子珍怕孩子容易受冻感冒，时常带去一些鹌鹑菜，请张秀英煮给孩子吃。她说：“这种东西很好，孩子常吃点不容易闹病。”碰到合作社能买到点饼干，糖果什么的，她就买点留给孩子。

孩子大一些了，贺子珍久蓄心头的愿望萌动了，她向党中央提出去外地治病的要求。经毛泽东、张闻天同志批准，一九三七年底贺子珍要动身到上海去取出身上的弹片。离开延安前夕，她来到合作社看望娇娇。

这一天，她穿着一件半新旧的军衣，没戴军帽，手里拎着一袋东西，都是给小孩预备的换洗衣服。她怀着沉重的心

情走进合作社，把一袋东西交给张秀英，拉着孩子手说：

“秀英，孩子就托给你了，多费心。孩子有什么毛病，就请你抱到毛主席那边去。”

孩子“咿咿呀呀”，似乎在向妈妈打招呼。贺子珍赶紧走近摇篮，抱起娇娇，摇晃着，絮语着：“宝宝，妈妈要走了，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要很久以后才回来看你。要乖乖的啊，听张妈妈的话……”孩子似懂非懂地一个劲摇着手，对着妈妈甜甜地笑着。

贺子珍擦了一下眼泪，亲了亲孩子，转过身缓缓地离去了。

贺子珍刚走几步，孩子便大声哭了。哭声揪着贺子珍的心。

二十九、苦难的异国十年

贺子珍一九三七年十月离开延安，这年冬天出了国门，一九四七年夏从苏联回到东北，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十年。这漫长的十年给她留下的是什麼记忆呢？她回国后对人说的头一句话是：“哎，真是做了一场恶梦哪！”

再恶的梦也容易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可不是一场恶梦能概括得了的。所以，她对更知己的人又说：“我又经历了一次长征，它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苦哇！”

这是一次令人心酸的“长征”。它的第一步，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从延安迈出的。嵌入体内的弹片，时时折磨着她，每逢风雪阴冷，她身体各处都象刀剐针扎一样，疼痛难忍。她要工作、学习，都必须首先把体内这些隐患清除。延安的

医疗条件非常简陋，她早就有心到外地去医治创伤了。刚好邓大姐要到重庆去做统战工作，要乘车从延安出发途经西安。贺子珍把女儿娇娇寄养在中央机关合作社，就同邓大姐等同志出发到了西安。

她本来想到上海去治病，可是刚从上海撤到西安的钱希钧告诉她，上海已经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贺子珍去上海的路堵塞了，在西安滞留下来。恰在这时，毛泽东托人给她捎来一床毯子，还带给她一封亲笔信。信中落词恳切，殷殷相劝，热切地盼望她回到延安来，以后有机会再去治病。为了将来能更好地为党工作，贺子珍固执地要去治病，拒绝了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劝阻。

这时候刘英同志得了肺病，要到苏联去治疗。同行的有在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贺子珍瞅准这个机会，给延安写了一封信，要求到苏联去治病。毛泽东同志跟洛甫同志商量之后，给西安办事处拍电报同意第一批去苏联治病的行列里，增加贺子珍一个名字。

毛泽东心里是多么不愿意让怀着孕的贺子珍远行啊！他接连又给西安办事处、兰州办事处和新疆办事处写信和拍电报，希望办事处的同志劝阻贺子珍。但是，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多少同志费尽唇舌，都没有能劝阻住贺子珍这一次苦难的“长征”。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从西安动身，贺子珍历经坎坷，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份到达莫斯科，在苏联的东方大学一边学习，一边治病。最初的日子是充实而有意义的。

莫斯科是全世界无产者向往的地方，共产国际在这里办了很多训练班。当时，我们党一方面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一方面把大批年轻的优秀干部送往莫斯科学习。

贺子珍分在政治班学习。

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课目很多，有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世界革命史等。贺子珍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养成了晚上工作的习惯，在莫斯科学习的日子里，仍然爱在晚上看书学习，熬到深夜。由于身体不好，加上有身孕，早上起不来，要到第二节课才到课堂。比她后一些到莫斯科的王佑（方志纯）同志先在军事班，后来转到政治班，是贺子珍的班长。他知道贺子珍晚上不能很好休息，每天要到快天亮才能入睡，因此对她的学习很关心，每天把第一节课的内容给她补上。

贺子珍到莫斯科以后，毛泽东十分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多次给她写信，还寄去不少哲学书籍。收到毛泽东的信，贺子珍心情异常激动，兴奋得不能入睡。有一次她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要利用在莫斯科的有利条件，多看些书。她给自己制定了几个“五年计划”，打算在学习班打持久战，用知识武装起来，回国后更好地为党工作。

在莫斯科的生活，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贺子珍一直不能忘怀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在学习之外，女同志每天还要织袜子，支援在前线作战的苏联红军女战士。当时，国民党在莫斯科还驻有大使馆，个人单独活动是不允许的。有时学生们组织起来集体去参观，他们去过格鲁吉亚、列宁格勒，工厂去得更多。每当参观工厂时，贺子珍总是十分认真仔细，想多看一些，多学一些，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每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学生们还被邀请出席红场的庆祝活动。他们和苏联的劳动英雄和有功人员一起在观礼台上观看莫斯科的市民游行及阅兵式。使贺子珍尤其难忘的是她亲眼看到过斯大林同志。听过他的录音报告。有一次，学

校听录音报告，那是斯大林论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报告。贺子珍尽管身体不好，还是坚持着仔细听，认真地做着笔记。听了斯大林的报告，她象过节一样的高兴。她坚信，苏联人民一定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人类最美好的国家。

好景不长。当莫斯科暖融融的阳光很快从她头上移了过去，阴影朝她的头上笼罩过来，令人伤心难受的日子开始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贺子珍生下第六个孩子。这是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哇哇的哭声，给在异国他乡、孤独烦闷的贺子珍，增添了多少欢乐和慰藉啊！小宝贝虽然还不会说话，但是在贺子珍的耳朵里，哇哇的哭声，呵呵的叫唤，咯咯的笑声，都是最动听的语言，比呜噜呜噜的俄语亲切中听。每天学习回来，她就高兴地跟儿子对话，沉浸在母子交融的崇高情感里。

天有不测风云。幼弱的婴儿得了一场重病。母亲没有奶水，孩子日见消瘦，疾病拖延着，同学们都催促她快把孩子送进医院。

这是贺子珍始终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之一——因为她缺乏对莫斯科医院的了解和信任，她没把孩子送进医院，而是一味地给孩子服用自己从国内带去的药物。一则是时间长了，有些药已没有多大效力，二来那到底不是对症的妙药，孩子病势不见好转，反而日渐恶化。

贺子珍的心揪紧了，她紧紧地抱着孩子，轻抚着，拍打着他小小的脊背。孩子安然地睡着了。

清澈见底的潭水往往莫测浅深，风平浪静的水面时时潜伏着暗流，谁能想到孩子会这样无声地、悄然地离去呢？沉

睡的孩子再也不肯醒来。

贺子珍失声痛哭，无声地抽泣，长久地呜咽。

啊！她不能没有孩子，她不能没有这个男孩。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已经融进了她的生命，失去了他，生命也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光彩。她的痛苦是别人难以理解的。

贺子珍神情麻木地抱着已经断气的儿子，亲着吻着，怎么也不肯撒手。她不相信这样活泼的小生命，她这样需要的亲人，会无声无息地离开她，离开这样孤苦悲楚的母亲！

她把儿子——她相依为命的亲人，埋在学校的一个公园里。她把欢乐和希望也埋进了那个小小的土堆，从黄昏到黄昏，她痴痴呆呆，无言无语地坐在坟堆旁边的凳子上，愣怔怔地仰头望着星空，低头瞅着草地。星星同情她，也忧然伤神，变得那样黯然无光；月亮可怜她，躲进了云堆里，不忍心看这辛酸的情景。

还在贺子珍失子伤神的时候，李六如同志的夫人王美兰同志也来苏联治病了，同贺大姐同住一个房间。她刚到时，衣服没有发下来，贺大姐就慷慨地把自己仅有的一套换洗衣服给了王美兰，还教她一些日常的俄语会话。对人仍然那样热情的贺子珍，自己却心灰意冷。她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晚上辗转反侧，唉声叹气，蒙着被子哭，怎么也不能入睡。白天学习也打不起精神，显得消沉慵懒。

王美兰看着消瘦憔悴的贺大姐，也很难过，早上给她打来饭菜，关心和宽慰着悲痛的贺子珍。每天早上一起来，王美兰都看到贺子珍盖着的那条粉红色被子上，有一块碗口大的湿痕。贺子珍指给她看，凄楚地说：“孩子死了，这是我流的眼泪水！”

一块包裹孩子的小毯子，上面印满了婴儿的尿渍，贺子

珍一直保存到现在，上面的尿渍还舍不得洗去。

她心灵的创伤有多么深？被子上的泪痕和孩子的尿渍是一把尺子。

王美兰从苏联回延安后，去看望毛泽东同志，毛主席跟她开玩笑说：“你出洋了，洋包子回来了！”

寒暄之后，毛泽东详细询问到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问她身体怎样？苏联对她如何？当王美兰说起被子上的泪痕和毯子上的尿渍时，毛泽东认真倾听着，难过地沉默了，眼圈也红了。王美兰赶紧告辞。王美兰走了之后，虽然天色尚早，毛泽东也破例地躺下睡觉了。

为了安慰孤独的贺子珍，毛泽东托一个从延安回国的苏联人将娇娇带到莫斯科去。这个苏联同志将娇娇送到中国同志的住处后，没有详细交待就走了。中国同志问三岁的娇娇：你妈妈是谁？娇娇清楚地回答：妈妈是贺子珍，在苏联。这是最有力的“介绍信”，同志们赶紧将这喜讯告诉了在楼上的贺子珍。

贺子珍飞快地跑下楼来，端详了娇娇一眼，向她扑了过去，把她抱起来亲个没完，眼泪滴在惊慌的娇娇脸上。

苏德战争爆发了。残酷的战争又把刚刚陶醉在与女儿团聚的欢乐里的贺子珍，打入了灾难的深渊。贺子珍带着女儿，撤退到伊万诺夫城。

伊万诺夫是苏联一个中小城市，距莫斯科几百公里。那里气候寒冷，物资匮乏。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里，没有暖气，没有劈柴生炉子，甚至连火柴都紧张。每天只发几两黑面包，她让女儿吃个半饱，自己则经常饿得肚子咕咕叫，用手使劲按着肚子，才稍微好受一点。

没有工资收入，没有生活保障。贺子珍就靠给人家织毛

衣、毛袜子，挣一点钱维持低劣的生活，还要挤出钱来照顾毛岸英、毛岸青兄弟。

苏联国际保育院就设在伊万诺夫城。这所保育院专门收容各国送来的孤儿，也接待一些兄弟党领导人的孩子。毛岸青和娇娇也在保育院读书，兄妹俩相处很融洽，互相帮助，互相体贴。

贺子珍每天织袜筒子挣钱，娇娇帮忙卷线。一天能织好几对袜筒子，织好后送到厂里去换卢布。换来的卢布给毛岸青买铅笔、纸张和笔记本。那时，毛岸青经常丢书、丢本子，贺子珍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他买，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也教育娇娇把他当做自己的亲哥哥。岸青来看娇娇时，娇娇陪他到食堂去吃饭。贺子珍和娇娇每天的定量是三十克郎的面包。岸青来了，贺子珍就饿一顿，把定量让给岸青。娇娇问妈妈为什么不同她和岸青一起上食堂吃饭？贺子珍推辞说：“妈不饿，你们去吃吧。”

贺子珍吃惯了苦，生活的艰难她不在乎，精神上的一再打击，却使她不堪忍受。

五岁的娇娇，在严寒和饥饿的袭击下，得了曾夺去弟弟生命的肺炎，奄奄一息，被无情的保育院长送进了太平间旁边的那间屋子，等待死亡。

接到通知的贺子珍，象五雷轰顶，一阵晕眩，她趑趄趑趄地赶到太平间，把呼吸微弱的娇娇抱了回来。她把身边仅有的一切东西都拍卖了，买了冰糖，搅和着牛奶，放进女儿的嘴里，看着生命濒危的女儿自然吞咽。

在母亲温存的怀抱里，娇娇挣脱了死神的拉扯，哭出了沉默了几天后的第一声。把女儿救活之后，贺子珍对保育院失去信任，不肯把女儿全托在那里，白天送，晚上坚持接回

来。凶悍地保育院长，粗暴地干涉贺子珍晚上接女儿。双方激烈地争吵起来，吵过几次，保育院长便诬说贺子珍是“疯子”。上级不察真伪，强行把贺子珍关进了“疯人院”。

从此，贺子珍戴着强加在她身上的“疯子”的帽子，过了几年与世隔绝的禁锢生活，已很脆弱的神经一度被轰毁。

三十、悲喜交集进国门

一九四六年秋天，一个中年妇女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步履迟缓地走进莫斯科大街柳克斯旅馆。中年妇女穿着新换的衬衫和布拉基裙子，又黑又瘦，眼神呆滞，神色不安。她站在街道上，眨了眨眼睛，仿佛不习惯耀眼的阳光。

她就是刚从疯人院放出来的贺子珍。

她领着娇娇犹犹豫豫地走进一个套间。等在里头的王稼祥、朱仲丽夫妇赶忙迎上前去，同贺子珍握手、问候、让坐。

“贺大姐，您身体好吗？”朱仲丽热情地问道。

“还好！”贺子珍点点头，嘴唇翕动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表情仍然显得拘谨，许久没有与自己的同志说过话，语言也发生严重障碍。

“贺子珍同志，你这几年受苦了，我代表国内的同志问候您！”前来莫斯科治病，并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工作的王稼祥同志，再次问候贺子珍。

“你们是从国内来的吗？”贺子珍呆板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是的，刚来的！”朱仲丽说着，拿出巧克力糖请她们

母女吃。贺子珍不肯吃，娇娇拿起一块放进嘴里。娇娇不很活泼，一口俄语，已经听不懂家乡语了。

王稼祥夫妇来到莫斯科后，就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求，要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接出来。第一次没有答应，说贺子珍是“疯子”。王稼祥又第二次提出要求，也遭拒绝。这时候朱仲丽以医生的身份出来说话：“我是大夫，贺子珍同志是不是疯子，带出来我看看嘛！”

没有理由再拒绝了，于是，贺子珍来到了这个房间。

朱仲丽一边与贺大姐亲切交谈，一边注意观察，发现贺子珍虽然郁郁不乐，有点呆痴，但是安安静静，不躁不闹，神经明显是受到挫伤，但绝不是疯子。苏联的联络员亲眼看到，也不得不说贺子珍果真不是“疯子”。王稼祥夫妇给她讲国内的形势，告诉她日本侵略军投降了，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告诉她出来休养休养，检查一下身体，争取回国内去。贺子珍见他们亲切，又听说可以回国，脸上渐渐有了笑容，话也多起来了。与王稼祥夫妇吃过饭之后，就到皇宫医院治病去了。

后来，王稼祥同志给毛泽东同志拍了个电报，汇报贺子珍的情况，建议把她带回国内。毛泽东同志立即回电，表示同意。

过了些日子，贺子珍母女再次来到柳克斯旅馆，就换了一个样子，贺子珍脸上开朗了，有说有笑。娇娇也活泼了。不久，她领着毛岸青和娇娇，提着简单的行李，跟随王稼祥夫妇踏上了回国的途程。

坐在火车上的贺子珍，神色淡漠冷峻地看着车窗外面的一切。她满怀希望来苏联治伤，弹片仍旧留在体内，却增添了重重的心灵创伤，一次多么令人痛心的“长征”啊！

三十一、仍有豪情似旧时

一九四七年夏，贺子珍踏进了祖国的北大门，来到了哈尔滨。

祖国的东北已经解放，红旗飘拂着，从东北飘到海南岛。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了，玫瑰花开遍了祖国各地。

可是，迎接贺子珍的却不全是玫瑰花。旧的创伤未愈，新的创伤又在她心里出现。

她的妹妹贺怡南下回到家乡——江西吉安地区，担任地委组织部部长，以极大的精力和热忱到处奔走，寻找革命烈士的家属和子女。她在前往赣南寻找小毛的路途中，翻车牺牲。亲妹妹的不幸遭遇，使贺子珍的心灵蒙受了重大打击。

悬念着的儿子小毛——最大的安慰和希望，杳无音讯，传闻已经夭折，这对她不啻是个晴天霹雳，几乎轰毁了她的精神支柱。

一九四九年夏初，贺子珍从东北南下到达天津，在北京的门槛上等待进京通知。可是，她等来的却是不许进北京的通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献出了青春和热血的战士，却不能到天安门广场上去走一走，不能在五星红旗下站一站，她不禁有些伤心。

在重重打击下，贺子珍没有趴下。

她一路奔波劳累，兴奋和忧郁交替刺激，刚回到哈尔滨就病倒了。但她稍事休息治疗，就挺了起来，急切地向党组织要求工作。组织上分配她到沈阳某财政部门工作，她欣然

应命，以瓦窑堡数钞票的工作精神，努力工作。一九四九年，她又奉命调到浙江省杭州市妇联任主任。她接到任命的当天就到任上班了。她振作精神，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她每天工作到深夜，临睡前还要翻翻她喜欢的古典诗词，轻声吟诵几首，以排遣夤夜袭上心来的枯寂和愁苦。

后来，贺子珍调到上海，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这个长征老干部抖擞精神，决心把她三十年前学过的数理化捡起来，重新开始复习。她领着外甥贺麓成、外甥女贺海峰到新华书店，买了全套大、中学校数理化课本，接着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从头开始一页一页地看下去。中学的数理化，她毕竟是学过的，印象也深，一看就懂了。大学的数理化课程可把她难住了。好在外甥贺麓成这时已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四年级，各门功课都是优秀，自然成为了贺子珍的学习秘书。

贺麓成看着姨妈贺子珍戴着老花镜，刻苦攻读数理化的情景，好几次笑话她：“姨妈，您四十多岁，身体又不太好，您这样白天黑夜的钻研大学课程做什么呀，难道您要当大学教师吗？”

贺子珍意味深长地说：“麓成，我不是同你讲过，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告诉我们要尽快熟悉自己过去不熟悉的东西，去迎接经济建设的高潮吗？我参加革命过去是为了推倒三座大山，三座大山推倒了，我们这些老同志今天就应该站在经济建设前列，不懂科学知识，怎么领导经济建设呢？”

贺麓成对倔强好胜的姨妈是了解的，他没有再说什么，便把自己在大学学到的东西告诉贺子珍，这样就加快了贺子珍学习大学课程的进度。经过几年努力，她终于自学完了大

学功课，掌握了一定的科学知识。

她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战争年代没有收音机，她养成了看报的习惯，解放后有了收音机，她养成了收听每日新闻广播的习惯。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开始的时候，贺子珍天天守住收音机，认真听取会议进展情况。会议第一天，从收音机里传来了毛泽东宏亮的声音。这是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听着这熟悉的湖南口音，贺子珍心里很不平静。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忙大声喊叫：“海峰，快来听呀，毛主席讲话了！”

这时，正在厨房里洗碗的外甥女贺海峰连忙来到收音机旁。她看见姨妈歪着头，右耳贴着收音机在倾听着，越听越激动，脸上露出了难于抑制的笑容。贺海峰不懂贺子珍复杂的心理，问道：“姨妈，你干吗把耳朵贴得那样近，你耳朵又不聋，收音机声音这么大，还听不清楚呀？”

贺子珍抬头盯了贺海峰一眼，怪罪道：“死丫头，快坐下来听，毛主席正在讲话，内容好重要啊！”

贺海峰哪里知道，姨妈自从一九三七年冬天离开延安以后，除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贺子珍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外，已经有十八个年头没有听过毛主席的讲话了。所以这次贺子珍不但贪婪地听，而且逐句逐字地记下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顺利进行着。贺子珍当晚守候在收音机旁，只要全国联播节目一开始，她就屏住呼吸，仔细

倾听。刘少奇同志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她同样听得入神。她一边听一边对贺海峰讲，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了，这是经过三十四年流血奋斗的结晶啊！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制定井冈山土地法时就讲过，今后要制定人民自己的宪法，今天果然实现了。

五月二十八日晚上，当她听到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委员长，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消息时，心情十分兴奋。她点着了一支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烟雾缭绕中，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一座座历史的浮雕似乎在她眼前掠过，她无限感慨地说：

“这些都是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啊，有他们掌舵，我们国家大有希望！”

这一晚她睡得香甜、踏实。

三十二、与国与民同忧戚

在十年动乱中，贺子珍经常是睡不安宁的。她本来就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有时整宵睡不着觉，哪禁得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兴风作浪的扰乱，国不安宁，她也与民同忧戚。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招待处的同志向贺子珍作了传达。贺子珍听了又惊又喜，连连拍掌叫好：“报应！报应！”接着，贺子珍向她的亲属控诉了林彪伙同王明在苏联迫害她的罪行。

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到苏联治病，遇到了先期在

苏联治疗的贺子珍。贺子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认识这个当连长的林彪的，那时候，小小林彪对贺子珍毕恭毕敬，别说上茅坪八角楼不容易，就连进红四军前委江报工作，碰面他还向贺子珍举手敬礼。在瑞金时，林彪到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开会，碰到贺子珍也是客客气气的。

这情景过去才几年，林彪在莫斯科碰到贺子珍却趾高气扬，不仅不理睬，甚至讲一些不三不四的讽刺话，完全没有老同志的感情。林彪在苏联一住就是几年，平时和王明勾勾搭搭，对贺子珍进行人身攻击。王明和林彪对贺子珍在医院的一些合理要求也不予以解决，还污蔑贺子珍有精神病，并串通苏联医生将贺子珍送进了精神病院，剃去了头发，残忍地折磨和污辱。林彪这样一个品质恶劣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副统帅”，贺子珍怎么也想不通。现在听说他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仓皇逃跑摔死在温都尔汉，贺子珍透了一口大气说：“好！林彪这个大坏蛋终于完蛋了，这块大石头被搬掉了！”

可是，贺子珍也十分清楚，在当时的党中央里不只林彪这一个大坏蛋，在人民前进的大路上也不只林彪这一块大石头。林彪跨台了，她喘了一口气，但她的心还是不得安宁。

解放初期，贺子珍曾忧虑地对她的侄子谈起江青：“这个人很危险，她在毛主席身边更危险！危险呐！”“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贺子珍看见江青接见造反派，到处煽风点火，整老干部，她十分不满，她不只有一次地对亲属讲：这个江妖婆就是阿根廷的庇隆夫人，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

贺子珍冲破种种限制，叫贺海峰陪她上街看大字报。当她看到街上贴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就愤愤不平地说：刘少奇是好同志，邓小平是好同志。我们在瑞金沙

洲坝时住得很近，常常见面的，他们对革命是忠诚的。那时邓小平同志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工作是很出色的，是支持毛主席的。贺子珍激动地对贺海峰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王明是坏人，江青是妖婆，要向党中央报告！”

贺子珍再往前走，发现街上又贴了打倒彭德怀的大字报。她拉住贺海峰的手说：彭德怀怎么能打倒呢？他做了什么坏事？彭老总在井冈山有战功呀！在中央苏区有战功呀！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有战功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战功呀！……贺子珍愤愤不平地讲下去，贺海峰深怕有人听到，惹来麻烦，便小声地说道：“姨妈，街上太乱，我们回家去吧。”

贺子珍愤气难平：“怕什么！我们再看看。”她一边走一边说，“海峰呀，你赶快去北京一趟，向毛主席说，这样把老干部打倒不好，老干部个个都有功。江青是个坏东西，张春桥也不是好人，他们有野心呀……”

后来挨整的老同志越来越多，贺子珍为老同志的命运忧戚，为国家的前途担心。她非常气愤地对侄子说：“一些老同志有多大问题嘛，就这样死整人家。”当她听到曾山、陈正人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时，立即晕了过去。

贺子珍特别注意看报纸，她先看《人民日报》登的消息，然后看参考消息，两种报纸对照起来看，看看外电是怎样报道的，从中找出问题来。

她看了《参考消息》上报道了阿根廷政变的消息，悟出一个道理：“海峰，你看过报纸吧，阿根廷总统不是被庇隆夫人杀掉的吗？你要关心阿根廷政局，一个妇女竟把总统杀掉了，这不是身边大老虎吗？你再看看江青这个大妖婆，她多象庇隆夫人，毛主席真危险啊！”

她在上海的住时，经常当着看护人员的面，大骂江青、

张春桥这些害人的奸贼，吓得看护人员吐着舌头走开。她因病住院，高烧昏迷，当她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就惊恐不安地高声叫喊：“快！快去救毛主席，江青要害他！”守护着她的贺海峰，吓得赶紧去关门窗。

江青当然也不会忘记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布置她在上海的党羽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进一步剥夺贺子珍的行动自由，不准她外出会客，也不准外人包括家里人、老战友去看她，使她过着形同软禁的生活。凡是去看过贺子珍的人，回来后一个一个进行审查。她的一位亲属刘子毅从南昌专程到上海看望贺子珍，被江青及其爪牙发现，结果在批斗时被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丧命。

何长工同志是贺子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战友，我军的高级将领，就连他来上海看望贺子珍，也暗中被人盯梢，不能深谈。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代表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江青一伙成了囚犯，贺子珍才获得彻底的自由。

三十三、质本洁来还洁去

战士自有战士的本色，风雨不蚀，磨难不衰。

贺子珍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本色。在杭州工作的时候，她只有两套“列宁式”衣服，平常穿那套旧的青色衣服，另一套新一点的深绿色衣服总是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抽屉里，等到节日集会，或者会见外宾当翻译时才肯穿上，回到宿舍马上又换下来。她后来调到上海军管会工作，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也仍然只有这两套衣服。

她在上海工作不久，就奉命“休息养病”。从此被失去了工作的权利。工作是美丽的，一切愁苦都会被冲淡忘掉。贺子珍失掉了工作的幸福，长期过幽居的生活，她的精神几乎崩溃。

但是，她的劳动人民善良、纯朴的本色仍然没有变。

她在江西南昌生活了很长一段期间，主要是养病。她很爱到外面走动，有时在护士小卢的陪同下步行到很远的郊区一带。新辟的人民公园，幽静的青山湖畔，更是她爱去的地方。虽然给她备了小汽车，她却很少坐。有时走远了，走累了，回来就喊一辆三轮车。

护士要给她叫小汽车，她说：“坐小汽车惹人注意，挺碍眼的，还是三轮车随便。”

每次坐完车，她都是两倍三倍的给钱，她很体贴一般工人群众的疾苦。

有一次贺子珍在院子里看见一个小孩穿得很单薄，裤子都破了，她就走上去问道：“小朋友，你是哪家的？”小孩见是生人，没敢吱声。她摸着孩子的头说：“快说呀，我给你买糖吃。”孩子趁她没注意，一转身从女贞树丛中穿过去跑了。

后来贺子珍打听到这是看大门的赵大伯家的孩子，在发工资的当天，她就领了小卢上街去买了一大堆小孩穿的衣服给赵大伯送去。她对赵大伯说：“老伯伯，你家小孩冬天的衣服不够哇，这些衣服是送给他的。”赵大伯不知道说什么好，感激的眼泪在眼眶里打闪。

这样的事情差不多月月发生。同乡、亲戚有困难也时常有人找上门来，她也是十几元几十元地接济他们，身边的工人同志更是经常得到她的照顾和帮助。她外出一趟，回来一

定给身边工作的同志和接近的人每人买一份礼物。谁病了，她会想方设法去弄药，还要送一些钱。江西老家的亲人来上海看她，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的侄子来看她，她了解到他子女多，生活困难，一次就给了他一百五十元钱，并嘱咐他在上海买些穿的，吃的，带回家给孩子们。因为她帮助别人时根本不去考虑自己的钱够不够用，所以，在下一次发工资之前往往就没钱了。她经常向护士借钱用。每逢这时，她就风趣地说：“小卢，还是你阔气，是个小银行，先借点钱给我对付几天，发了工资还你。”

她时常说，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不能见了人民的痛苦不闻不问。看见别人生活苦无动于衷，久而久之就会忘记人民，革命者的本色丢掉。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贺子珍同志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她去了，本是洁来还洁去。她留下了什么呢？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指着堆放在上海东湖宾馆308号贺子珍灵堂旁边的两个破箱子和少数衣物说：“妈妈把一切献给了党，她没有自己的家，常年住在医院和招待所，她没有一件家具，最后只留下这两个破箱子和几件不值钱的东西。这两个破箱子还是她从苏联带回来的，这几条军毯和闹钟、茶罐还是从井冈山带来的。”

根据贺子珍的意愿，女儿、女婿把贺子珍在战争年代用过的茶罐、闹钟、眼镜、手杖、帆布小凳，以及临终前她喜欢穿的衣服和布鞋等遗物，送给了江西省博物馆，给江西人民作纪念。

这些不值钱又价值连城的遗物，是贺子珍革命一生，

艰苦奋斗一生的象征。睹物思人，不仅江西人民见了这些遗物会感念贺大姐，就是全国人民见了这些遗物，也会怀念贺大姐的。她毕竟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人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初稿

一九八四年五月删改于北京

后 记

一九七九年之前，贺子珍，这个名字在我们脑海里闪现的还是朦胧的神秘和传奇色彩，我们除了偶尔听到一些经过渲染和夸大的口头传说，在《西行漫记》里看到一点零碎记载，对这位长征女红军的生平、经历、事迹毫无真切了解。

一九七九年，贺子珍的名字以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再次出现之后，我们怀着好奇和浓厚的兴趣，采访一切能找到的接触过她的同志，搜集一切关于她的文字记载（尽管是凤毛麟角），我们终于揭开了脑子里的神秘色彩，代之以一个有血有肉，亲切和善、平凡而又令人尊敬的中共优秀党员，女长征干部的形象。于是，我们想写她，也片片断断发表了几篇东西，引起一些读者的注意。

当然，要写这样一位早期有声有色，中期坎坷不平，晚期长年卧病的老大姐，我们不无顾虑：我们访问了不少同志，他们对贺子珍同志的有些经历和事迹的细节，说法不太一致，我们亦无从辨别和确认：她毕竟不是一般的人，有些人物关系亦不好处理，难于把握分寸。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曾经失去写完《贺子珍》的勇气。在这些年里，我们陆续有机会接触几位与贺子珍同志共过事的老大姐，她们简略介绍了贺子珍在井冈山、瑞金和长征的经历后，说：贺子珍同志入党很早，对革命有贡献，也吃了很多苦，后半生遭遇坎坷，宣传她的事迹，是完全应该的。只是要实事求是，不要缩小，不要夸大。这些很原则的话，由于中肯和切实，使我们得到很大启示，增强了我们写完《贺子珍》的信心。当

然，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仍然碰到难于处理的环节，读者们看到这些地方也会理解的。

我们采用的是质朴的纪实风格，细节未敢渲染夸张，文字也不事修饰，侧重于介绍贺子珍同志的生平事迹，追求真实性和史料价值。

我们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在北京三〇一医院和一九八二年十月、一九八三年在上海华东医院和贺子珍同志的住处，与贺子珍同志进行了多次交谈，较系统地了解了贺子珍的身世和生平。我们先后访问过的同志有：康克清、刘英、钱希钧、彭儒、邓六金、钟月林、王定国、谢飞、朱仲丽、曾碧漪、王美兰；何长工、刘型、曹菊如、侯政、魏国禄、黄有峰、赖观水、丁良祥、陈昌奉、吴吉清、贺清华、周家良以及子珍的亲属贺敏学、李敏、孔令华、贺麓成、周剑霞、贺海峰等同志。参考过杨之江、王行娟、贺珍等同志写的有关文章。

我们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希望了解贺子珍的同志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教，使此书有再版机会时，我们能更正事实，充实内容。

作者

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

访问贺子珍

最近，我们访问了一位人们关切而又一直难于见到的人，她就是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三十名女战士之一——贺子珍同志。

关于她，美国记者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曾有美好的描写。他的夫人韦尔斯撰写的《续西行漫记》，把贺子珍列为在延安所见到的“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用了“窈窕柔弱”、“面貌娟秀、风度文雅”的词句来形容她。法国女作家王安娜也曾在延安同贺子珍会过面。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贺子珍随毛主席参加长征，她身上有十几处被榴霰弹片所致的伤痕……在她那表情丰富的脸上，还留下长征时倍尝苦辛的痕迹。贺子珍的健康欠佳，脸上没有什么血色。这个身材纤细、性格温和的女子的健康，因为在长征中妊娠的缘故，受到很大的损害。”“其他与红军一起行动的女性，和贺子珍一样，是红军战士的伙伴和战友。她们和丈夫一起作战，历尽艰难困苦，这些勇敢的女战士，受到全军、全党的信赖和尊敬。”

外国朋友的记述，是对一个在含血带泪的革命途程中，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的红军女战士的恰当评价。

对于贺子珍，革命的老一辈和井冈山、赣南、闽西、延安等老根据地有一把年纪的群众，比外国朋友有更深切的了解和尊敬，有更公正、更客观的评价。贺子珍作为一个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一直活跃在他们心中。在建国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们虽然几乎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叙叙阔别之情，但

是，在艰苦的年月里建立起来的同志情谊是隔不断的，他们深切地怀念着她。

一九七九年六月，《人民日报》刊登了贺子珍在五届政协二次会议上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接着又刊登了贺子珍和外孙女在一起笑容满面的照片之后，引起了国内外那么强烈的反响。这则新闻，象插了翅膀一样飞遍井冈山、赣南、闽西、延安等革命老根据地；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游击队员看到贺子珍含笑的近影，唤起了多少亲切的回忆和思念的激情。仿佛五十多年前穿灰布衣、头戴八角帽，传说中手持双枪，飒爽英姿的女战士贺子珍，又回到了他们的身边。他们在高兴之余，不禁捧着照片热烈地议论和猜测起来。

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她是怎样度过的？现在的身体和生活怎样？对于这位老红军战士的过去和现在，有过种种传说和猜测，甚至以为她不在人世了。人们多么盼望了解一点她的真实情况啊！

带着这种心情，在一个冬阳温煦的下午，我们到北京一所高级医院，访问了贺子珍。

踏着宽敞的外室的绿色地毯，我们轻轻进了病房。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在藤椅上，穿着粗糙的开身毛衣，露着慈祥的笑容，眼睛专注地望着我们，嘴巴不很自然地张合着，发出喃喃的不很清晰的声音。比起在延安拍摄的那张身着军装，腰束皮带，军容整肃的照片来，她是胖了，也似乎矮了一些，清秀俏丽的瓜子脸也变成了端庄开朗的长圆形脸盘。不过，从她矍铄文雅的神采和深邃专注的眼神里，我们立即认出，她就是那戎马倥偬的年代跟着毛泽东同志爬山涉水、披一身风尘和硝烟的红军女英雄贺子珍。无情的时光虽

然使她苍老了，但昔日的风姿仍然存留在眉宇之间。

握过手之后，她主动用那不很清晰却很响亮的语音亲切问候着：“你们都好吗？”

“都好，贺大姐，你身体好些吗？”

“好多了，好多了，谢谢！”她高兴地说着，竟出乎意料地和我们一一扳起手来，要比比谁的力气大。直到我们这些年轻人认输，说她的力气大，她才满意地松开手，象孩子似的笑了。说实在的，虽然我们故意让了她，但她的手劲还是不小的。

她呵呵地笑着，眼睛亲切地凝视着我们。我们介绍了各自的工作岗位，然后告诉她我们几个都是江西老俵。老人侧着耳朵，听到“江西”两字很高兴，兴致勃勃地询问起我们是江西什么地方人。江西不仅是她的家乡，也是她早年献身革命的地方。江西的山山水水，有她多少坚实的脚印啊！

她的话题从江西开头，语音带着浓重的永新乡音：

“江西的井冈山你们去过吧？现在建设得很好了。那个时候可困难啦！井冈山斗争是艰苦的，要不是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是很难坚持的。毛泽东同志在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国红色政权可以存在下去并能发展壮大，形成燎原之势……”贺子珍从井冈山开始，断断续续地向我们回述了她认识毛泽东同志的经过，同毛泽东同志一起生活、战斗的十年，以及她在这以前和以后的一些战斗和生活情形。谈起这些，她不但记忆清晰，语言也很利索。不过，她经常停顿，脸上的表情是丰富复杂的。她充溢着对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情厚谊，流露了对昔日斗争生活的怀恋。

我们一边听着她的回述，一边注视着她那双饱经磨练、

爬满蚯蚓似的青筋、今日虽然孱弱但仍然有力的手，引起了许多联想。

就是这双手，土地革命的时候，在永新县城操场的讲坛上，有力地挥动着，滔滔不绝地作着讲演，号召妇女和儿童们起来革命。这个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十六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短头发，穿着大襟上衣，黑色长裙，精神抖擞，是永新县城有名的美人，也是出名的女秀才。她带领学生们剪辮子，打菩萨，闹“共产”，又组织了一支十多人参加的妇女宣传队，到乡下去唤醒妇女的觉悟，她成了全城瞩目的女共产党员，在永新暴动之后，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十七岁的贺子珍背着一支步枪，带领梭标队守卫永新南门，梭标队员大多数年龄都比她大，却都尊敬和服从这位精明强干的女指挥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形势发生了逆转。愤怒的人群聚集在永新县城体育场的大操坪上，义愤填膺地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贺子珍的演说最为激烈。她慷慨激昂地历数了蒋介石的罪状之后，大声疾呼地喊出了“杀蒋介石头”的响亮口号，还举出一个木头做的蒋介石模拟头像，用手使劲地劈去。她那革命的英雄气概，给在场的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就是这双手，在一九二八年三战永新和宁冈新城战斗中，持着驳壳枪，冲锋在前，英勇杀敌。这年夏秋之交，毛泽东、朱德同志深入敌区观测地形，了解敌情，在一次同少数干部研究作战部署时，被敌人发现，受到了包围。当时敌众我寡，情况危急，只得分散转移。贺子珍熟悉地形，自告奋勇要求殿后掩护。在领导同志安全转移后，她飞身上马，在马上回头鸣枪，牵引敌人。她射倒了几个追赶的敌人，一口气驰马跑了四十多里路，把尾追的敌人甩脱了。后来，敌

人曾下令通缉“双枪女将”贺子珍。于是，贺子珍双手打枪的名声便广泛传开了。当我们把听到的这个故事讲给她听的时候，她却摇了摇头，谦虚地说：“太夸大了！我枪是会打，是逼出来的，但打得不好。说是双枪将，传得太神了。”

就是这双手，多少个夜晚伏在茅坪八角楼的灯下和井冈山茨坪的简陋瓦房里，给毛泽东同志整理抄写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和《井冈山的斗争》。

这个在吉安福音学校毕业的学生，一九二六年入党之后，曾经当过共产党永新县委妇委书记、共青团县委副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的机要秘书。她办过县委的小报，练就一手十分工整的字。她经常为毛主席整理抄写文稿、调查报告、党的决议。一天晚上，她正在誊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节时，看到桌上的香烟吸完了，而毛泽东同志的手正伸向空盒子，她连忙披上衣服走到隔壁袁文才家里，要了一点烤烟叶子回来，用手揉碎，然后把一张毛边纸撕成一小条一小条，卷成一支支喇叭形卷烟，放在桌子上。在频繁动荡的战争年代里，她还为毛泽东同志整理报纸、保管文件、沏茶热饭。

一九三三年，中央军委从叶坪搬到了沙洲坝。沙洲坝是个严重缺水，十分干旱的地方，当地有一首民谣：“有女莫嫁沙洲坝，有河无水洗被帕”，说的是河里存不住水，天一晴，河床露底，没有水喝，也没有水洗衣服。当地群众喝的是浑浊而有沙虫的污水，时刻把群众生活挂在心头的毛主席，决定在村子附近打井。打井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挥汗如雨地挖土，贺子珍汗流浹背地拣砖头和鹅卵石，一担一担把砖头挑到井边垒井墙。后来，群众在红井旁立着一块碑，上

面刻着：“饮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思念毛主席”。如今瑞金人民喝着红井的甜水，怀念着逝世的毛主席，也思念活着的贺子珍。

就是这双手，曾经在革命征途中给许多战友送去温暖和友情。红军女战士钟月林谈起往事，曾激情满怀地说：“长征中贺大姐给予我和同志们的温暖，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在长征途中，为了抵御草地的严寒，贺子珍收集了几块保护驳壳枪的紫红绸布，从毛主席那里要了点羊毛，为钟月林缝制过一件毛背心，使这位女战友胜利地走过了茫茫的草地。钟月林没有被子，晚上蜷缩而卧，冷得发抖，贺子珍总是把她拉进自己的被子里，在广漠的寒夜里，共同分享那一点点难得的温暖。贺子珍有一块油布，仅仅能遮住一张单人床。她负伤以后躺在担架上，晚上落雨时，就叫警卫员吴吉清把油布撑开，挂在树上，把同行的钟月林、钱希钧拉在一起，抱成一团，躲避草地上说来就来的暴雨的袭击。在长征的路途中，只要一休息下来， she 就把皮包垫在膝盖上，佝偻着腰身，为毛泽东同志抄写文稿，为他和他的警卫员补衣裳。过草地时，没有吃的，休养连领导考虑到她怀孕和负伤，身体亏损，额外给了她一点酥油，她尝都不尝一点，转手就分给了红军战士。到了毛儿盖，没有一粒粮食，战士们都吃野菜、青稞。前方部队在深山里打到一头牦牛，送给中央队的领导同志。毛泽东同志不让独吃，吩咐要分给休养连的伤员和老同志。休养连稍微多分了一点给面无血色的贺子珍，而她却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自己年轻应该少分一点，老同志应该多分一点。谢觉哉同志直到解放后还记得这件小事，夸贺子珍关心老人，注意影响，严格要求自己。

前些日子，长征时的休养连连长侯政同志去看望贺子

珍，两位老战友回忆往事，越谈越兴奋，戒烟多时的贺大姐竟不顾护士的劝阻，向侯政要了一支烟抽。侯政同志对我们介绍说，贺大姐在长征中不管怎么困难，总是面带笑容。长征本来很苦，她又怀着孕，身体十分孱弱，后来又受了重伤，真是倍尝苦辛，而她一路上却总是挂着笑容，从不叫苦。

在长征途中，她挨炸负伤，落下一身伤疤。据吴吉清同志回忆，一九三五年三月的一天，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到达贵州盘县羊场，大家正准备宿营，坐在路旁树下休息，云端忽然响起敌机的嗡嗡声，刹那间，几架敌机从云缝里钻出来，向着休养连隐蔽的地方俯冲。这时，已经隐蔽在路坎下沟里的贺子珍，发现有些伤病员还未隐蔽利索，又跃身而起，敏捷地跑到前面开阔地上，不顾头上敌机的威胁，指挥担架队隐蔽。敌机疯狂地扫射，投炸弹，烟尘把她淹没了。她发现离她不远的一个担架员已被炸死了，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呻吟着、挣扎着要从担架上爬起来，——这个伤员是红一方面军的一位师政委，是攻打娄山关和遵义城的猛将，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断了一条腿——贺子珍目睹这位在担架上挣扎的师政委，焦急万分，不顾气浪冲击造成的全身剧痛，扑向担架。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贺子珍摇摇摆摆地站了起来，晃了几晃，又栽倒地下。吴吉清跑过去一看，伤员得救了，贺子珍却被炸得多处受伤，鲜血染红了军服，昏迷不醒。（作者注：在后来的采访中，多数当时在场的老同志说，没有看到贺子珍掩护别人的细节）医师李治骑马赶来，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贺子珍从头部、上身到四肢，十七处中了弹片，有块弹片从她的右背部直划到右胳膊上，撕开了长长的一条大口子。因为当时医疗条件所限，体内的弹

片取不出来，医师只好先给贺子珍注射止血针，服了几粒止痛片，对伤口进行了包扎。至今，她身上还有未取出的弹片。

贺子珍身上的累累伤痕和多处弹片，是一个红军女战士的光荣，也是她舍己为人的献身精神的崇高体现。

建国以后，贺子珍虽然被迫养病，束缚了手脚，也还在尽其所能地为人民做着好事。永新县一个小孩来上海治癞痢头，她不但包了医疗费，还亲自给这小孩洗头。长征途中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的女儿怀孕，到上海去看贺子珍。贺子珍送给她二百元钱，觉得不够，又送了一百，还觉得不够，又从别人那里借了点钱送给她，这才安心。她要是到外地疗养一趟，总得倾囊而出，给身边的同志每人买一份东西。谁生活有什么困难，她马上就解囊相助；如果有人得了什么病，她比谁都着急去弄药。她虽然拿着比较高的工资，但生活很俭朴，不追求物质享受，也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在她上海的“家”里，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只有几件旧衣服，一、二个又土又破的箱子，她的工资中相当的一部分总是用在别人身上。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贺子珍在上海得了脑血栓偏瘫，左上肢、左下肢不能活动，在上海治疗一段之后，根据她本人的意愿转到了北京治疗。

秋风拂去了历史的尘埃，沐浴着秋阳的首都，第一次接待了这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奋斗过的女战士。她的共过患难的老战友康克清等同志到首都机场迎接了她。她是多么激动啊！

医护人员在介绍这位她们尊敬的病员时，告诉我们一种“反常现象”：贺子珍过去身体好，脑子有时不清楚；粉碎

“四人帮”之后，身体虽然不太好，脑子倒特别清楚了。她现在的远记忆很清晰，近记忆也不错，辨别能力很强，相隔几十年的老战友来看望她，她能惊喜地一下子叫出名字来。有一天，宋任穷、钟月林夫妇来看望她。一见老熟人，宋任穷同志问她：“你看看，我是谁呀？”贺子珍愣怔了一下，便立即说出了三十年没有见过面的战友的名字：“宋宋，宋任穷，宋任穷！”她高兴地紧紧握着他们夫妇的手，张开的嘴巴转瞬又闭紧了。她想起了一段辛酸的往事：一九四九年，她从东北到了天津，以为立即可以进入翘首可望的北京。当时，宋任穷夫妇正要出发征战西南，她便主动要求宋任穷夫妇把孩子留下，由她带到北京去抚养。这位好心肠的贺大姐，没有想到，她到北京的愿望却未能实现。

记忆中沉重的一页翻过去了，她脸上又浮现出开朗的笑容。粉碎了“四人帮”，她总算能在首都的医院安静地躺下来，医治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几位参加过长征的大姐又来看她，她兴奋呀，高兴呀，竟“小麻雀”，“小麻雀”什么的叫起人家的小名来。

亲爱的读者！这种亲朋、战友欢聚、逗笑的事，在生活中是经常发生的。可是，几十年来，在贺子珍身边，这样愉快的会面和谈笑却极为罕见。

自从一九三七年冬离开延安到苏联治伤之后，她的心情就没有轻松过。她曾说，在苏联的十年象是进行了另一次长征，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苦得多。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生活十分困难，她是靠织毛衣毛袜子维持生活的。生活的艰苦她倒不在乎，最可恼的是精神上所受的损伤。王明和那个所谓的理论权威，在苏联整她，使她的神经受了重重的一击。她生过三男三女，除了女儿娇娇，其余都是生下就死

了，或是寄养在老百姓家中不知踪迹，唯一的一个小男孩本来是她的安慰和希望。但刚生下八个月便得病夭折了，母亲的心口又挨了一刀。她抱着已经断气的婴儿怎么也不肯放下，埋在她学习的学校草坪之后，她每天黄昏坐在儿子的小坟堆旁，半夜半夜地愣怔着，不肯回来。后来女儿娇娇又得了病，她精神受到更大的刺激。国际儿童保育院的院长坚持要把娇娇送医院，她怕女儿又会失去，死也不肯，两人争执起来。她用刚学会的几句俄语夹着中文与院长吵，把凶悍的女院长触怒了，便诬陷她神经失常。她被蛮横地送进了疯人院，一关几年。至今，一提到王明，她还会颤栗。一九四七年从苏联回来，她在东北和天津逗留了一段，又在浙江省妇联当了几个月主任，就到了上海。起初闲住在一个里弄居民楼里，在家照顾亲戚的孩子。陈毅同志在上海当市长时，对她很关心，经常看望和问候她，有时还把这位老战友接到家去叙谈。战斗的友谊、同志的关心，使她得到一些慰藉。一九六〇年她搬进陈毅同志住过的一幢小楼，从此就一直“幽居”在这里，基本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从战斗的硝烟里闯过来的人，在解放后要停下手脚来，什么事都不做，精神上是很难耐的。她渴望工作、战斗，但江青及其一伙冷酷地剥夺了她继续革命的权力，使她本来就受了挫伤的神经，更受到长期的慢性刺激。在幽居的日子里，除了女儿、近亲能见见面之外，连过去的红军战友来访，都被挡在大门之外。江青的阴影不时笼罩在她头上，她的心情怎能不忧郁气闷！江青对贺子珍抱有很深的敌意，一有机会就贬低她，诽谤她。“文化大革命”中，在青岛追查一封匿名信，她也不忘了旁敲侧击一下贺子珍。一九七二年，江青擅自多次会见一个外国女人，也不忘攻击贺子珍，以泄私愤。在江青、张春

桥一伙的授意下，一段时间她在上海由“幽居”变成了软禁。这样的遭遇，怎么能叫她精神清爽呢？现在，度过了严冬，驱除了阴影，她晒到了晴朗的阳光，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见到了许多老战友，又当上了政协委员，幸福和欢乐温暖了她枯寂的心，使她受到挫伤的精神恢复得很快。你如站在她房门外，时常能听到这位老人与医护人员的逗乐声。我们跟她拍了一下午照片，她一直精神饱满，乐呵呵的，一会把这个拉过来照，一会握着那个的手面对着镁光灯。

随着精神的复苏，她的身体也有所好转。她主动活动患肢，费力地曲起活动发生障碍的左臂，常常弄得出一身冷汗，也不肯辍止。她还常唤护士帮助她做广播操。医护人员每天对她施行推拿、针灸、电针治疗，进行患肢功能恢复锻炼。护士扶着她，沿着里外屋地毯边沿，上下午各走一圈，锻炼左下肢。医护人员反映说，贺子珍在治疗过程中，有毅力，有信心，配合得很好，是个模范病员。贺子珍同志却谦虚地说：“不，我是个麻烦病人！”习惯于关心他人的人，对于需要别人护理，总有一种负疚心情。护士高兴地告诉我们，这位七十岁的老人，满怀信心地表示要尽快恢复健康，在新长征中做一个战士，尽最大的力量，最后的力量为四化做贡献。她很关心时事，关心四化建设，经常要护士给她读报，她自己也常拿起报来，戴着老花镜，在报上圈圈点点，画杠画线，还与女儿、亲戚讨论国际形势。前不久，她的侄儿和侄媳来看她，问她想到哪里去看看时，她习惯地回答说：“听从组织安排！”她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组织怎么安排，她就怎么服从。给她必要的、一般性的照顾，她也会觉得特殊，不愿意接受，你只有用这是组织安排来说服她，她才勉强接受。

当然，贺子珍现在的心境也并不都是平静的，对老战友毛泽东同志的怀念时时撞击她的心扉。一九三七年冬，她执意要离开延安到苏联去学习和治伤。到了西安、兰州和新疆，毛泽东同志都写信、打电报，殷殷劝阻，要她回来，以后再去治病。刚到苏联，也曾接到毛泽东同志热情问候的信。林伯渠、谢觉哉、刘英、钱希钧、王定国同志，都曾反复劝她回到延安。但是，倔强的她，没有接受这些善意的劝解。过了多少年之后，她才后悔自己的任性和固执。建国之后，毛泽东同志同她通过子女传递过不少次书信和问候，贺子珍通过女儿给毛泽东同志捎过芥菜、太古菜、盖菜、苦瓜、冬笋等他爱吃的食物，毛泽东同志也常要女儿带点水果、食品给贺子珍。贺子珍经常向子女问起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和安全，担心他身边有坏人。除了轻蔑地提起江青外，还不时忧虑地问起王明和那个“理论家”，对他们的阴险和狠毒，她是深有所感啊！一九五七年，毛泽东、贺子珍两位老战友在庐山有过一次激动的会面，当时，贺子珍流出了幸福的眼泪。

在革命战争年月里建立起来的战友和同志的深厚感情，好似长长的流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她多次提出要来北京治病，主要目的就是要瞻仰毛泽东同志的遗容。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

临去毛主席纪念堂的前一天晚上，虽然医护人员怕她激动，没有告诉她，但她从听到的片言只语中，敏感地知道了她盼望许久的时刻来了，她一晚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临出发之前，她要护士给她准备好两块手帕。年青的护士疏忽了，匆促间给她塞了一块粉红色的手绢。她从兜里拿出来，严肃地说：“这块不好，这块不能用！”最后给她换了一块色调

庄重的，她才满意。九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她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在给毛泽东同志送的花圈面前，伫立许久。花圈摆在大厅毛泽东同志坐像下，上书：“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然后由女儿、女婿推着轮椅，向遗容陈列室走去。女儿、女婿轻轻地推着轮椅，围着毛泽东同志的灵柩慢慢地转了两圈。她专注地凝视着安然长睡的老战友，情绪悲切。尽管医护人员不断在耳畔叨咕：“姨妈，不要难过，不要哭！”她也止不住悲伤和思念的眼泪。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医护人员把她推进了休息室。她面对着挂有毛主席《长征》诗的铁字，长久地凝望着，默诵着，胸中涌起了多少思绪！

隔了一、两个星期，她去参观人民大会堂，医护人员疏忽了，以为她能控制感情，没有在耳畔唠叨。参观了宴会厅、大会场和上海、北京、江西、湖南厅之后，忽然走进一间小屋子，看见一张床，当她知道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休息室时，不禁万感交集，伤心大恸……

我们在病房与贺大姐欢愉地度过了一个下午。暮霭沉沉的时候，为了贺子珍同志的健康，医护人员干涉我们的采访了。我们依然不舍地握着这位红军老战士的手，祝她保重，向她告别。好象为了显示力量和信心，她紧紧握住我们的手，又用力扳过去。